

جوڭگو ن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

چۇڭخۇا خەلق جۇمھۇرىيىتى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六月

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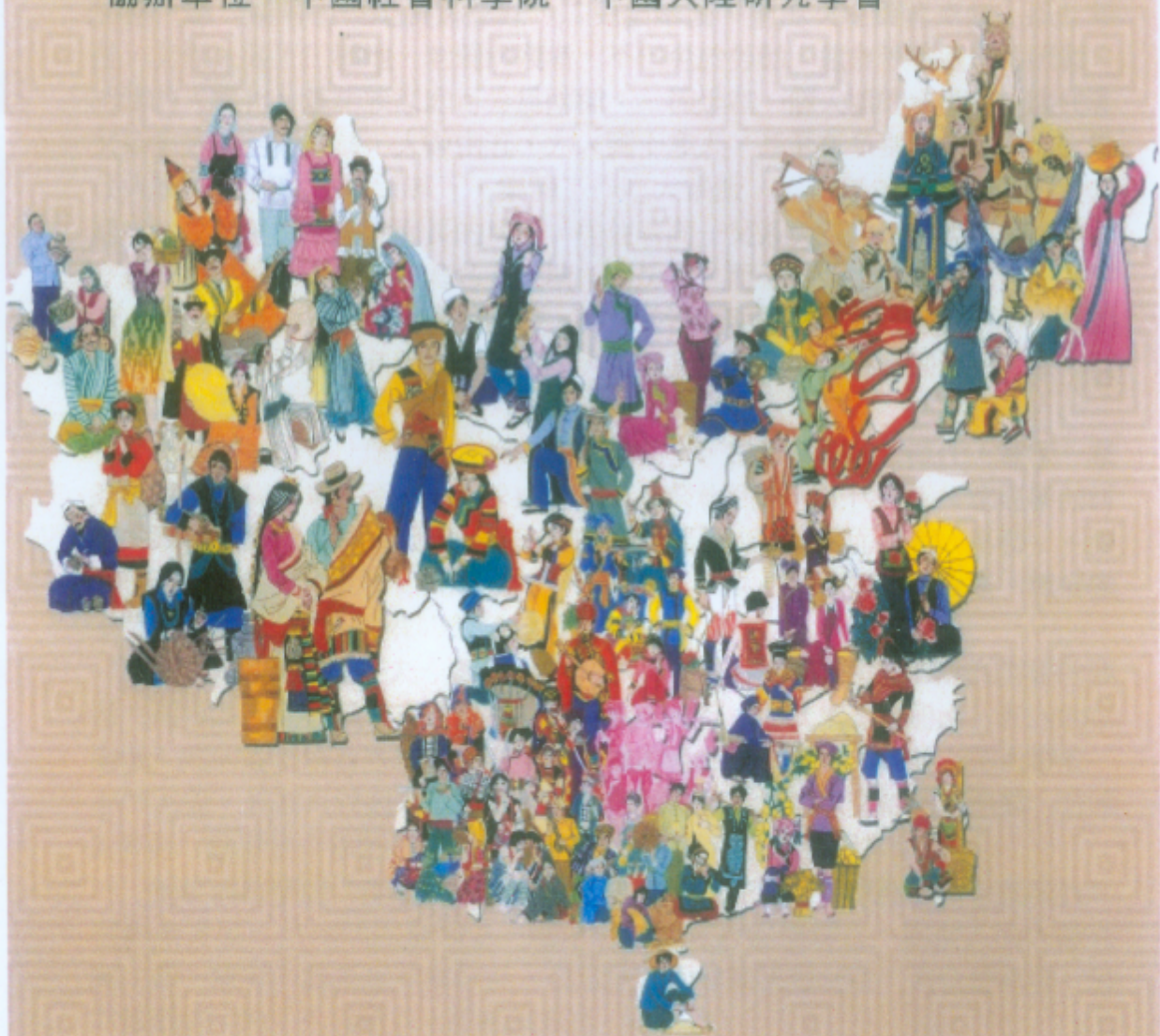
兩岸「少數民族現代化」 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8年4月21日（星期六）、22日（星期日）

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J616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國邊政協會、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大陸研究學會



目 錄

| | | |
|--------------------------------|-----|-----|
| 2018 年兩岸「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記述..... | 林遙鵬 | 1 |
| 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 | 孟 鴻 | 15 |
| 五代時期回鶻..... | 劉學鈔 | 55 |
| 略述唐代之胡樂與胡舞..... | 章維淳 | 97 |
| 《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 | 張華克 | 125 |
|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 | 華 華 | 167 |
| 稿 約..... | | 173 |

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鈔教授（蒙藏委員會前委員兼主任秘書）新著《台灣的邊政研究 70 年》一書已由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出版，電話 02-2949-0172。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多民族所共建而成，基此，邊疆地區各少數民族的歷史、語文、地理、習俗、宗教信仰、傳統政治制度……無一不是中國歷史、政治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臺近七十年，有關臺灣的邊政研究及蒙藏委員會之重要措施與裁撤始末，極有必要加以「盤點」。作者將此書分上、下兩卷，上卷敘述近七十年來臺灣的邊政研究，包括研究人員及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民族、蒙古族、藏族來臺同胞，政府及民間研究機構以及研究成果。下卷則專述蒙藏委員會，包括設立意義與沿革、播遷來台初期措施、歷任委員長任內重要措施、裁撤之經過，與鮮為人知之事件，供後人了解七十年來，臺灣在邊政研究與邊政措施並未缺席。



2018 年兩岸「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記述

林遙鵬
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

壹、研討會主題確立

2017 年 8 月 22-23 日，中國邊政協會 10 餘位成員在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主辦，秦皇島燕山大學文法學院所承辦的「海峽兩岸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與路徑」學術研討會時，楊開煌理事提議 2018 年應舉辦學術研討會並將主題訂為「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劉學鈔秘書長也表示贊同，指示於理監事會議時提出討論。

本年二月三日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二屆第四次理監會，秘書處將楊開煌理事提議研討會「少數民族現代化」主題，提案討論獲參會者一致通過，理事長責成秘書處籌備本次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本次學術研討會議將由中國邊政協會與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貳、籌備事宜

一、籌組會務工作小組

本會秘書處在理事長與秘書長指導下，又召集了協會張華克常務監事協助，與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的同仁，共同籌辦此次「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經多次會面協商後會議雛行漸現，終至砥定。

二、確立與會者的研究領域與參會人數

- (一)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郝時遠先生，除將親臨與會並推選了七位大陸知名學者，學者族籍涵蓋漢、蒙、維等族，研究專業均在各邊疆、民族間之學術，政治、經濟、宗教、文化、語言學等，屬大方向大範疇領域。
- (二) 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研究所所長邢廣程先生親率四位學者與會，研

究領域為邊疆、邊陲地帶之政府施政政策推動與分析。

(三) 中央民族大學吳楚克教授帶其博士生張嘉馨與會，張嘉馨為研究兩岸岩畫之學者，曾多次來台進行調研與會議並將於下半年至中研院訪學六個月。

(四) 台灣方面則由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楊克誠先生，著名學者楊開煌、劉學鈔、趙竹成、藍美華、羅忠展與楊仁煌等研究邊疆民族學術專家，共同與會進行交流、討論。

(五) 開放社會大眾參加。

三、確認會議地點

本次學術研討會議是由中國邊政協會與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會議安排與會務的操作由楊開煌教授帶領其團隊負責，會議地點為銘傳大學基河校區之國際會議廳；7、8 樓即為住宿之安排，銘傳大學基河校區交通極為便利並集會議、住宿、餐飲於一處，著實方便，也省卻了相當繁瑣的辦會難度。

四、規劃在台期間調研行程

會議期間，路程往返二天、學術研討會二天，尚有一天需做安排，經與對接窗口陳建樾老師會商後，決定在南台灣展開三天調研。此次參會為大陸學者，規劃台南地區孔廟、安平古堡與赤崁樓為調研地；屏東地區則為瑪家鄉原住民文化園區；同時安排高雄大樹鄉佛陀紀念館。隨即展開安排聯繫工作，呈報內政部移民署核准後，陸續接到台北市、嘉義縣、台南市與高雄市警局及調查局、移民署南部分區關切電話，一方面應是查核行程；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為了大陸學者的人身安全，畢竟近年來台灣藍綠對峙，政治氛圍鬼魅不明，深怕數年前張德銘先生訪台南受到人身攻擊事件重演。

參、學術研討會會議記述

四月二十日（星期五）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郝時遠先生長所率領與會學者 13 人，依原預定時間 11：35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受理事長與秘書長指派前往接機，並於

七天在台期間全程陪同，此次參會老師多數是第一次到台灣，沿著國道一號進入台北市銘傳大學基河校區稍做安頓後，許多學者已迫不及待聯絡在台好友或外敘舊或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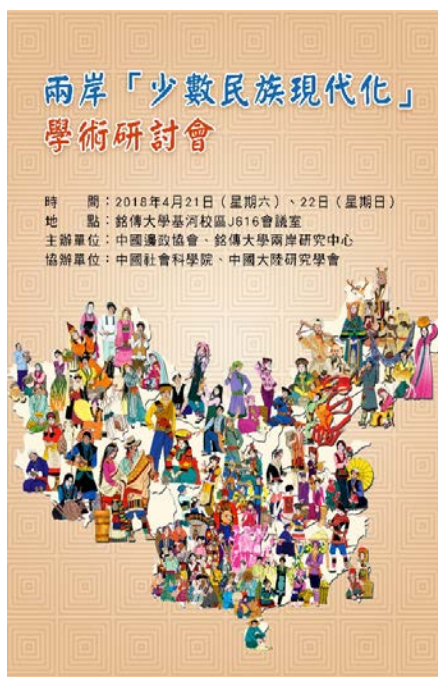
今天適逢中國邊政協會召開 107 年會員大會，為歡迎參加「少數民族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學者，假台南海鮮，舉辦歡迎晚宴，大陸學者對能到台灣參與學術研討會表示內心的欣喜與雀躍，代理主席娥舟文茂常務理事也重申歡迎之意，賓主盡歡後晚宴正式結束。



主席娥舟文茂歡迎晚宴致詞



學部委員郝時遠歡迎晚宴致詞



資料來源：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

[illegible]

| 兩岸「少數民族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議程 | | | |
|--|--|---|--|
| <p>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 時間：2010 年 4 月 23 日（星期五）22 日（星期日） 地點：湖南省長沙市馬坡寺 338 號 湖南大學 中國社會學研究所 133 號會議室</p> <p>2010 年 4 月 22 日 歡迎蒞臨</p> | | | |
| 時 間 | 內 容 | | |
| | <p>主 持 人：吐爾克江（浙江師範大學教授）</p> | | |
| | 嘉 賓 1 | 嘉 賓 2 | |
| 0930-1200 | <p>趙竹村（南京大學民族學系教授）</p> <p>周錫銘（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理論研究室副主任）</p> | <p>關於「少數民族現代化」議題的幾個問題——以緬甸傣族為例的討論</p> <p>邊疆獨特民族發展現代化管見——以黑龍江省開河鄉的赫哲族為例的個案</p> | |
| | <p>楊仁德（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民族學系教授）</p> | <p>關於民族的異質文化——以阿昌族的半犁耕種制度為例</p> | |
| 1330-1500 | <p>嘉 賓 1：吐爾克江（浙江師範大學教授）</p> <p>嘉 賓（李連江）</p> <p>賓 可 應：陳亞麗（女）</p> | | |
| | <p>主 持 人：陳維綱（暨南大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p> | | |
| | 嘉 賓 人 | 議 題 提 綱 | |
| 1550-1700 | <p>劉 野（四川大學漢語學院民族學與西南民族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中心主任）</p> <p>方素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中心）教授）</p> | <p>民族發展：傳統模式與民族現代化的關係</p> <p>西藏民族發展與民族地區現代化：基於藏南江古拉康寺古拉康的個案考察</p> | |
| 1750-1800 | <p>研 究 人：陳維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理論研究室主任）</p> <p>嘉 賓 1：劉 野</p> <p>嘉 賓 2：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p> | | |

資料來源：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

(一)大陸參會學者

| 編號 | 姓 名 | 現 任 職 單 位（包括官方暨民間） | 職稱 |
|----|--------|--------------------|------|
| 01 | 郝時遠 | 中國社會科學院 | 學部委員 |
| 02 | 陳建樾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副主任 |
| 03 | 邢廣程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 所長 |
| 04 | 周競紅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 研究員 |
| 05 | 方素梅 |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藏智庫 | 研究員 |
| 06 | 烏日陶克胡套 | 內蒙古師範大學 | 教授 |
| 07 | 吐爾文江 | 浙江師範大學 | 教授 |
| 08 | 勵軒 | 四川大學 | 副教授 |

| 編號 | 姓 名 | 現 任 職 單 位（包括官方暨民間） | 職稱 |
|----|-----|--------------------|-------|
| 09 | 呂文利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 研究員 |
| 10 | 范恩實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 副研究員 |
| 11 | 白研 |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 高級工程師 |
| 12 | 吳楚克 | 中央民族大學 | 教授 |
| 13 | 張嘉馨 | 中央民族大學 | 博士 |

（二）台灣參會學者

| 編號 | 姓 名 | 現 任 職 單 位 | 職稱 |
|----|------|---------------------|------|
| 01 | 楊克誠 | 中國邊政協會 | 理事長 |
| 02 | 楊開煌 |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學會 | 理事長 |
| 03 | 趙竹成 | 政治大學 | 教授 |
| 04 | 藍美華 | 政治大學 | 副教授 |
| 05 | 羅中展 | 中華科技大學 | 助理教授 |
| 06 | 馬普東 | 中國邊政協會 | 常務監事 |
| 07 | 劉學鈞 | 中國邊政協會 | 秘書長 |
| 08 | 張華克 | 中國邊政協會 | 常務監事 |
| 09 | 陳又新 | 中國文化大學 | 副教授 |
| 10 | 娥舟文茂 | 蒙藏委員會藏事處 | 處長 |
| 11 | 楊仁煌 | 開南大學 | 副教授 |
| 12 | 曹大明 | 三峽大學訪問學者(大陸學者) | 副教授 |
| 13 | 嚴昊 | 政治大學(大陸學者) | 博士生 |
| 14 | 高學宗 | 中華海峽兩岸原住民(少數民族)交流協會 | 副理事長 |
| 15 | 周德容 | 聯合大學 | 助理教授 |
| 16 | 司其元 | 中國邊政協會 | 理事 |
| 17 | 游麗卿 | 中國邊政協會 | 監事 |
| 18 | 朱浚源 | 中央研究院 | 研究員 |
| 19 | 林群傑 | 立法院 | 參事 |

| 編號 | 姓 名 | 現 任 職 單 位 | 職 稱 |
|----|--------|-----------|------|
| 20 | 周健 | 中國文化大學 | 副教授 |
| 21 | 林遙鵬 | 中國邊政協會 | 副秘書長 |
| 22 | 開放報名參加 | | |

三、理事長歡迎詞

尊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郝時遠先生、兩岸參會學者及各位嘉賓大家早：

很高興時隔一年又在臺北相聚，猶記 2017 年 4 月中國邊政協會舉辦「絲綢之路今昔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獲得熱烈回響，場景彷彿如昨天，今天中國邊政協會與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之「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冀希能延續絲綢之路的大戰略框架下，致力於少數民族的發展與現代化進程的推進。

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早在夏商周時期，中國版圖就已經從黃河中、下游流域逐漸向四周擴大，形成了所謂中原地區，少數民族世居的地區則是處於這中心區的週邊地帶。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邊疆的穩定、各民族之間的交流和融合，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在這個統一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產生了各種不同論調的關於如何治理邊疆和少數民族的學說與思想。中國在大國崛起進程中，將無法忽略少數民族與邊疆地區的發展與進步所扮演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國 55 個少數民族，約 1 億 1 仟 3 佰多萬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數約 8.49%，大部分世居於中國廣袤領土之邊陲地帶。在中國過往歷朝歷代中，中心區域尚且自顧不暇，更遑論其他力量福澤邊疆，中國的邊疆與少數民族地區一直是中國最不穩定的一塊，除屢遭鄰國的肆意入侵，更是其心各異，又加外國勢力蠱惑欲脫離中國而獨立或切割，國家無法安定因素下致使政治與經濟也無法得以發展。中國大陸自 1986 年起，31 年來的扶貧與脫貧政策已擴及少數民族與邊疆地帶，中國不是單純的依靠福利制度，而是堅持開發式扶貧政策，對有勞動能力，願意通過自己努力脫貧致富的人，政府幫助他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提高能力，將開發式扶貧作為中國扶貧的主軸，以避免過度的福利制度所造成財政重負，中國在扶貧起步階段借鑒學習許多的國際經驗。各國的減貧戰略都是從基本

國情出發，因此中國所有的扶貧制度、扶貧政策的設計，也都是基於基本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制定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思想是習近平總書記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內涵豐富，意旨高遠，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理論指引和思想指南。少數民族的現代化與邊疆的治理開發、進步，正是中國能快速擺脫落後與貧窮國家的重要核心戰略。

此次研討會計有大陸 11 位學者，台灣 4 位學者發表論文，會務組很有條理的將論文區分為：主題演講、總論篇、歷史篇與個案篇分別論述，如此的區分綱目統一梳理，使所有與會者，能迅速進入本此研討會核心主題而不紊亂。最後謹預祝本次「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圓滿成功，各位嘉賓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與會學者合影



四排左起：林遙鵬、高學宗、楊仁煌、楊開煌、郝時遠、劉學鈺、吳楚克
 三排左起：邢廣程、土爾文江、烏克陶、朱泓源、周德容、藍慶良、蔡偉傑
 二排左起：游麗卿、陳建樾、侍建宇、勵軒、方素梅、周競紅、呂文利、藍美華、范恩實、王慶峯
 前排左起：張華克、張嘉馨、白妍、嚴昊、林群傑、林昶光、曹大明

五、會議剪影



楊克誠理事長致詞



學部委員郝時遠研究員致詞



會議場景（一）



會議場景（二）



聯合報刊登會議資訊

六、會議摘要：

本次學術研討會計有大陸 11 位學者，台灣 4 位學者發表論文：
主題發表：郝時遠-取代與改造：敖魯古雅現代發展的思考。
總論篇：邢廣程-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的新思路；
楊開煌-中國大陸疆、藏民族地區現代化評析；
土爾文江-希望與危機：少數民族如何應對現代化。
歷史篇：陳建樾-民族團結與現代化的展開：1950 年代初期的大陸民族政策；
楊仁煌-原住民族長照文化－以阿美族年齡階級制度為例；
呂文利-《司馬遷定律：中國的“西北”與“東南”關係研究》。

個案篇：吳楚克-盟旗制的歷史作用和現代意義；
藍美華-現代化在內蒙古的體現與意義；
烏日陶克套胡-巴爾虎蒙古族牧民的現代化現狀個案考察；
趙竹成-關於少數民族現代化的思考“以維吾爾族為核心的討論”
范恩實-；關於借助“全域旅遊”推進少數民族現代化的初步思考；
周競紅-巨變與赫哲族現代化管窺。

誠如理事長於研討會閉幕致詞所言：「經過兩天、五個場次的密集學術研討會議，除了有 100 餘人次聽眾與會研討之外，兩岸學者專家親自向台灣的學術界，發表了自己的心血結晶，是極為難得的學術交流機會。經過兩天的充分發言與溝通後，整個學術研討會的會議部分正式結束，會中也獲得許多寶貴的意見。明天大陸學者一行將展開三天田野調查研究學術之旅，預祝一路平安。

本次由中國邊政協會與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研討會，銘傳大學楊開煌教授及其研究生出力獨多，可惜報紙新聞中主辦單位漏列銘傳大學，對此表示遺憾並督促秘書處爾後需謹慎籌劃，綜合此次研討會獲致以下幾項成果：

- (一)此次研討會匯聚兩岸頂尖的研究邊疆少數民族問題的學者，對舉辦兩岸學術研討會規模，均屬罕見。
- (二)本次研討會，除一篇主題報告外，共有 14 篇論文，約 195,000 多字，就數量而言，可以說成果豐碩。
- (三)無論主題報告或 14 篇論文，從理論面、歷史面到個案面，可說是面面俱到，就質量言，可說篇篇精彩。
- (四)撰寫主題報告及論文的學者，除外有蒙古族、維吾爾族、壯族、畚族、台灣原住民族，與研討會名稱相當符合。
- (五)參與研討會者，有滿族、台灣原住民族，大陸來台學習的博士生，從事專題研究的副教授，此皆為以往所未曾有的。

七、會議後歡送晚宴

本次研討會圓滿成功，本協會楊理事長特別安排圓山飯店五福廳，遠眺大佳里河濱公園美麗夜景，享用美酒(金門高粱)佳餚，老朋友圓山飯店

公關室協理陳愷璜特別為我們安排小提琴演奏，音樂一起大陸學者跟著哼唱，霎時 7、80 年代鄧麗君的美妙歌聲又重現圓山飯店五福廳。

肆、南台灣田野調查研究學術之旅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

08:00 本次南台灣調研一行 15 人在張振成導遊的安排下，搭乘遊覽車前往台南，沿途豔陽高照、風光明媚著實欣賞國道之美。

11:00 午餐安排嘉義中埔交流道旁的古早味甕仔雞，一行十五人品嘗台灣獨特的雞料理，皮脆、肉嫩、湯汁飽滿，但辛苦了二位嘉義縣警局的長官，頂著烈日來與我們會面、關心。

15:00 台南安平古堡、孔廟、赤崁樓(孔廟目前與億載金城、赤崁樓、安平古堡列為台南四大古蹟園區。)

安平古堡原稱熱蘭遮城於 1634 年全部竣工，分內外兩城，係以糖汁調和蚵仔灰壘磚而成，技術相當精緻。此城共築造為三層，下層於地面下，為深一丈餘，形方之倉庫，構建地面上有二層，城壁高三丈餘，四面牆厚六尺，以砂土埋填築城，係放置火砲位置，城壁傾斜於地面。中間接著的部分壁後四尺，其上的城壁則以一塊半磚之厚度築成三尺高。於 1895 年日治時期開始，由於熱蘭遮城已荒廢，僅存南面城壁，1896 年，日本政府乃就廢址加以整理，以磚砌成今之現狀，而在城上建蓋日式住房，作為海關官長公館，並在城下四周築職員宿舍數棟。

孔廟創建於明永曆 19 年，西元 1665 年是鄭氏治台時期鄭經時創建，以祭拜孔子，後來設立明倫堂作為講學，而成為全台首學。孔廟後殿康熙 24 年，西元 1685 年，孔廟改為台灣府學，俗稱文廟，經過幾次翻修擴建，成為今日規模。

日據時期，1989 年，台灣總督府在孔廟設立台南公學校 1916 又把公學校遷至台南師範學院（今台南大學）現址並重新擴建孔廟。民國以後又歷經五次大型整修，在民國 72 年，被列為國家一級古蹟，並於民國 86 年，進一步成立孔廟文化園區。

赤崁樓為「普魯民遮城」舊址，城為荷蘭人於明永曆七年(西元

1653 年)就赤崁地方所建，國人因以地名城焉。永曆十五年(西元 1661 年)鄭成功光復台灣，先克此城，闢為公廨。後得台灣城(今支安平古堡)改赤崁城為承天府署，永曆十八年(西元 1664 年)府裁，撥充火藥軍械庫。至嘉慶十年(西元 1805 年)樓漸傾圮。知縣潘慶辰(光緒四年--七年任)沈受謙(光緒十年--十三年任)先後就該城遺壘創建海神廟、文昌閣、五子祠及蓬壺書院，而五子祠及蓬壺書院 圮廢已久，惟餘兩樓翼然，今考據重修，恢廣軒敞，先賢名跡，本地風光，允為古都之鉅觀云。(台南市政府撰文)

19:00 入住老爺行旅，結束第一天的南部調研之旅。



全臺首學-孔廟



熱蘭遮城-安平古堡



普魯民遮城-赤崁樓



台南老爺行旅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二）

- 09:30 屏東排灣、魯凱族禮納里部落，瑪家鄉相鄰三地門鄉與霧台鄉，98年莫拉克風災造成這三鄉重大災情，而瑪家鄉瑪家村、霧台鄉好茶村及三地門鄉大社村災區鄰近瑪家農場，因此，政府便將此三村災民遷至瑪家農場安置，並由世界展望會來援建瑪家農場永久屋興建，經部落與各界討論，命名為「禮納里 Rinari 部落」，意為「我們一起走，大家一起往那兒去的地方」。
- 11:30 排灣族風味餐，瑪家穀倉千百年來，太陽光、空氣、水恩賜予排灣族人的生命之穀，作出了流傳幾世紀的風味料理，讓品嚐的親朋好友～每一口都能吃到滿是誠意與祝福的驚喜... 以小米為主要食材的魯凱族美食饗宴！另有小米年糕、各種口味的泡芙、藍色香草茶，烤山豬肉等特色料理。
- 13:00 山川琉璃吊橋，是連結三地門鄉三地村與瑪家鄉北葉村的吊橋，這座吊橋，不僅僅為往來交通，也展現當地原住民文化與歷史，琉璃珠的意象裝置由在地藝術大師撒古流·巴瓦瓦隆設計，分別鑲嵌在橋上兩側及引道上計有 32 面故事牌，述說著部落動人故事。另外，吊橋兩端的入口意象，則由三地門地磨兒國小及瑪家北葉國小學生，以馬賽克藝術作品，裝置錨碇座牆面及擋土牆牆面，尤其兩端各設置一座巨石裝置藝術，以「蕃薯」、「芋仔」的意象，象徵族群融合。
- 14:00 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位於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原為瑪家山地文化村，於三地門、瑪家、霧台等三個原住民鄉對外交通之樞紐地帶，園區成立於民國 74 年，佔地面積 82 公頃，園內展示台灣原住民 16 族之文化，規劃成迎賓區、塔瑪麓灣區、娜麓區及富谷灣區。園區劃分為迎賓、塔馬路灣、娜麓灣和富谷灣四大參觀區。迎賓區位在園區入口，設有文物陳列室、工藝館、視聽館、八角樓特展館及解說服務中心。塔瑪路灣及富谷灣兩區皆以原住民傳統建築為展示對象，完整呈現聚落的風貌。娜麓灣區以動態表演為主，設有歌舞場，360 度環形劇場及 16 族塑像的生活形態展示館，並設有「我們的教室」提供手工藝教學。園區建有登山步道，登高俯瞰整

個園區，石板屋、竹屋、木屋等…高低錯落於綠林中，加上散置其間的山地雕刻，處處表露著原住民的傳統軌跡。

19:00 六合國際觀光夜市，是南臺灣最早的行人徒步區和國際級觀光夜市，其前身為大港埔夜市。興起於 1940 年代末期至 1950 年代初期，以高醫醫院前身的原高醫六合門診部為中心，聚集於臺灣高雄市大港埔空地上的小吃攤，名列高雄最具代表性的夜市，近幾年因商家惡意哄抬價格或大敲竹槓行徑，致使夜市萬頭鑽動之情景不在。

22:00 入住高雄康橋行旅



禮納里部落 三地門鄉歸曉惠鄉長與郝時遠合影 山川琉璃吊橋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

09:30 抵達佛陀紀念館，位於台灣高雄市。2003 年舉行安基典禮，2011 年 12 月 25 日落成。興建緣起於 1988 年星雲大師至印度菩提伽耶傳授國際三壇大戒，當時西藏喇嘛貢噶多傑仁波切(Kunga Dorje Rinpoche)，感念佛光山寺長期為促進世界佛教漢藏文化交流，創設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並舉辦世界佛教顯密會議，乃至創立國際佛光會等，是弘揚人間佛教的正派道場，遂表達贈送護藏近三十年的佛牙舍利心願，盼能在台灣建館供奉，讓正法永存，舍利重光。佛陀紀念館是一座融和古今與中外、傳統與現代的建築，具有文化與教育、慧解與修持的功能。該館的興建，正是希望透過供奉代表佛陀威德、智慧的法身舍利，讓人們在禮敬佛陀舍利的同時，能夠開發自己清淨的佛性，並為人間注入善美與真心，帶來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12:55 搭乘高鐵返台北

18:30 台中科技大學謝俊宏校長晚宴

謝校長與中國社科院長期學術交流，與本團數位學者均有交情，得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郝時遠研究員帶團至台灣參加學術研討會，特親邀數位台中科大好友北上，設宴於天成大飯店席開二桌，近30位學者參加，會中除一訴情誼外更尋求學術交流機會，9點一到又匆匆趕回台中，真是辛苦謝校長您有心了。

22:00 入住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世界最高銅構坐佛(佛陀館)



學者一行合影



謝俊宏校長與郝時遠研究員合影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0930 大陸學者一行人檢查行李，準備至桃園國際機場搭乘 CA186 回北京，依據當初兩岸學術研討會構想，本次「少數民族的現代化」學術研討會由台灣方面辦會，大陸方面調研，預計八月下旬，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將安排參訪中俄邊境的滿州里口岸、巴爾虎旗與敖魯古雅部落。

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噶爾丹

孟鴻

前文化大學教授

摘 要

康熙、吳三桂、五世達賴與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這四個活躍在十七、八世紀的人物，對中國近代史有著巨大的影響，這四個人的關係錯綜複雜，彼此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或鬥智或訴諸兵戎；吳三桂原係明朝遼東守將，因衝冠一怒為紅顏而投降清廷，獲封為平西王，鎮雲南，自專於一方，嗣因清廷有意削藩而舉兵反清；五世達賴漸次從其統治者蒙古固始汗及其後人手中剽竊政治權力，逐漸在今藏地擁有政教兩權，而蒙古族人佞奉喇嘛教，在心靈信仰上等同成為喇嘛教黃帽派（格魯派）殖民地；其時漠北喀爾喀蒙古尚未納入中國清朝版圖，而漠西額魯特蒙古準噶爾部更是雄據天山以北，更非中國清朝所能掌控；至於今西藏，當時仍稱圖伯特（即吐蕃）雖已通好於清，但並未歸附中國清朝，不僅想與清朝分廷抗禮，且欲指使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當時尚無外蒙古一詞），迫使清朝將大軍移往北方，期以延緩清朝向青藏地區進展；至於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曾在拉薩出家為喇嘛，以其為準噶爾部長巴圖爾鴻台吉之子，因此甫出家即被「認證」為「活佛」，此人野心勃勃，妄想統一全蒙古，再創成吉思汗或帖木兒之霸業，遂甘心為五世達賴所驅策甘為其馬前卒而東掠漠北；至於五世達賴自從蒙古和碩特部剽竊到政治權力後，權力會使人上癮，也會使人腐化，五世達賴為鞏固既得權力，自是不希望清朝向青藏地

區發展，由是指使準噶爾部噶爾丹向東侵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把清廷軍力引向北方，就「戰略」而言，也屬高明；至於康熙，為國史上極少見之英明帝王，對於吳三桂之叛變，自是無法容忍，必須予以敕平，對於版圖也立志要將漠北、青藏納入中國疆域；噶爾丹之東掠漠北，更必須予以嚴懲，中國歷代帝王敢於御駕親征者，除明成祖朱棣外，只有康熙（北魏拓跋珪、拓跋燾也曾率兵親征，但規模均不及以上二帝），許之為「大帝」，應屬允當。本文就此四人事跡酌為敘述。

一、清初四周情勢

滿朝龍興於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地，經努爾哈赤皇太極之努力經營，多爾滾之能征善戰，終於在皇太極薨後之西元 1644 年明帝朱由檢之崇禎十七年自縊後，在吳三桂之引導下，進入北京，同時改國號為清（之前自認繼承十二、三世紀女真族所建之金王朝，史稱後金，後獲悉金王朝在國史評價不高，遂改國為清），入北京之清帝為愛新覺羅、福臨，也即習稱之順治（有清一代，每一帝均僅一個年號，因此皆以年號稱皇帝），其時不僅明宗室在江南，閩粵乃至西南進入緬甸負隅抗爭（史稱南明），而鄭成功更驅逐荷蘭而進駐台灣、澎湖、意圖恢復故明，而漠南蒙古也尚未全部歸順，至於漠北喀爾喀蒙古（有車臣、土謝圖及札薩克圖三汗，分左右兩翼七鄂托克，俗稱七旗）、漠西額魯特蒙古（或厄魯特蒙古，即明代之衛拉特蒙古，或作瓦拉，衛拉特乃瓦拉之複數詞）¹，額魯特分四部即：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明末時以準噶爾部獨強，於是土爾扈特部舉部西徙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駐牧，和碩特部徙牧青海（有部分徙牧寧夏），杜爾伯特仍駐牧今外蒙古西部科布多盆地，至是天山以北盡為準噶爾部所有，清康熙中期以前，無論漠北喀爾喀蒙古、或

¹ 據兩《元史》所載，蒙古有本支、別支之分，其起始即為蒙古者，如博爾濟錦、泰亦赤兀……等為蒙古本支，其原非蒙古，經服或自動併入蒙古而蒙古化者，稱蒙古別支；前者即兩《元史》所稱之黑韃靼，後者則為白韃靼、野韃靼，如汪古、篋兒乞、林木中百姓、克烈、乃蠻等，元帝退出大都（今北京）後威權已大不如前，蒙古別支組成聯盟，稱衛拉特或作瓦剌。

漠西之額魯特諸部蒙古，均尚未為清朝所綏服，尤其準噶爾部實力強大，雖表面上向清朝「進貢」，實際上係貪圖清廷豐厚之賞賜，以及「進貢使」人數多達二、三千人，均帶有大量貨物前來販售，與其說是進貢使團，不如說是貿易團更為恰當，而且這種情形自匈奴以來皆是如此，只是中國歷代帝王好大喜功，均將此種貿易團體稱之為朝貢。

清朝入關初期，漠南蒙古也尚未完全歸順，至於遠在邊陲之西藏（時仍稱圖伯特，為行文方便，故用西藏），更為鞭長莫及，皇太極時（1627~1643 年在位，時尚未入關，也尚未改國號為清），五世達賴雖曾遣使隨同和碩特固始汗之使者到盛京（今遼寧瀋陽）向後金通好，但通好不等於歸順，這是史實，無需諱言，何況當時各部蒙古幾皆佞崇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達賴雖為此教派之最大活佛，但並非此教派地位最高之教主，教主為甘丹寺之赤巴，但甘丹赤巴不是轉世而來者），五世達賴對各部蒙古有絕大之影響力，基此，清初諸帝自皇太極、順治而康熙、雍正、乾隆均極重視達賴及喇嘛教，乾隆且指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繫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²可見喇嘛教對蒙古影響之大，清朝之欲經營西藏乃勢不可免者，但五世達賴自從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後人剽竊到政治權力後，權力的滋味會使人戀棧，五世達賴也未能例外，為長享政治權力，以控制藏人的身體與心靈，同時也影響及於各部蒙古人的心靈，自不願中國清朝力量進入青藏地區，如純就五世達賴而言，此乃人情之常無可厚非，因此想方設法，阻止清廷力量向青藏地區發展。

吳三桂，原係明朝山海關守將，明末內政不修，加以天災不斷，於是流賊處處，其中以李自成、張獻忠最為大宗，明末帝朱由檢崇禎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自縊，並捕獲吳三桂之父吳襄，命其致書吳三桂，囑其來降，吳三桂原已願降，嗣得知其愛妾陳沅（即陳圓圓）為李自成所掠，遂衝冠一怒為紅顏，轉而降清，乃引清兵入北京，並助清廷四處討伐流寇，卒被封為西平王，鎮守雲南，軍政均得以自專，之後以耿盡忠請求撤藩，欲回遼東終老，清廷准其所請，由是吳三桂懷疑朝廷有意撤藩，乃假意向朝廷自請撤藩，以測朝廷態度，不意年青之康熙竟

² 見乾隆《喇嘛說》，引自錄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所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按《乾隆實錄》未收《喇嘛說》。

准其所請，由是吳三桂起兵反清，但以師出無名，先盛而後衰死於軍中，未幾即被清廷所敕平。

西蒙準噶爾部噶爾丹，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鴻台吉之第六子，曾到拉薩為喇嘛，五世達賴以其為準噶爾部長之子，具利用價值，遂認定其為轉世活佛，當巴圖爾鴻台吉死後，噶爾丹趕回準噶爾時，五世達賴復授以「博碩克圖汗」名號，因此噶爾丹對五世達賴可說是奉命唯謹，噶爾丹在奪得準噶爾部領導權後，不斷向外擴張，擁有今新疆全部及中亞部分地區，妄想統領全蒙古，恢復成吉思汗霸業，乃迎合五世達賴之意，向東侵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將清廷軍力引向北方，如是則無力經營青藏，康熙固然英明，且有統一全中國之意志與能力，但人的生命有限，一旦壽終正寢，嗣位者未必有康熙之智慧與能力，是則五世達賴仍可保有其喇嘛王國唯我獨尊之地位，是以對噶爾丹之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抱持教唆與鼓勵態度，且派出位階極高之呼圖克圖到噶爾丹軍中以為協助。

綜觀以上情況，康熙嗣位時，中國清朝並非一片榮景，甚至還是一片荊棘，有待康熙去敕平。

二、吳三桂與三藩之亂

所謂三藩有前後三藩，故明餘緒福王朱由松、唐王朱聿鈞、桂王朱由榔是為前三藩；而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盡忠是為後三藩；對清朝而言，兩者絕不相同，據清代學者魏源的說法兩者的差異是：

「語敵寇之名號，則前順而後逆（前指前三藩，後則為後三藩），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而後乘全盛，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而後等摧山，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³

從上引文獻可知後三藩之亂，對清初政局影響之大，但吳三桂以出師無名，按吳三桂曾絞殺故明永明王，無法以反清復明為口號，最終落得死於軍前收場。

³ 見魏源《聖武記》卷二《藩鎮、康熙戡定三藩記上》，台灣世界書局，1962年，頁41。

按吳三桂降清被封為平西王後，極受清廷重視，使其自專於雲貴一帶，據趙翼稱：

「三藩之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鎮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⁴

不僅如此，吳三桂為厚植一己之實力，與西藏（時仍稱圖伯特）五世達賴進行茶馬互市于北勝州，于是西番蒙古之馬，由西藏入滇者歲千萬匹⁵，從此可見吳三桂與五世達賴有往來，馬為戰爭重要工具，可視之為「戰略物資」，雖則文獻所載由西藏入滇之馬歲千萬匹，不免有誇大之嫌，但藏地並不產馬，青海、甘肅、內蒙則產馬，但數量也不可能每年有千萬匹之多，不過五世達賴為吳三桂居中向蒙古求售馬匹則為不爭之實（其時青海為蒙古和碩特部所有，今寧夏阿拉善一帶也為和碩特部所有），可見吳三桂屯積戰馬，早懷不軌之心。

據魏源《聖武記》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記上》所載，當時三藩所擁有的兵力，耿尚二藩各有十五佐領，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指六、七千之綠旗兵及其家屬），按清代八旗制度中有佐領一級，位階為正四品，滿語稱牛条額真最初每十丁編一組，其長稱牛条額真按「牛条」乃滿語「大箭」、「額真」為「主」之意，質言之牛条額真就是此十丁之長，漢語稱之為「佐領」，其後部族擴充，每一牛条從原先之十人，擴充為三百人。但平西王吳三桂則擁有五十三個佐領，換言之吳三桂擁有一萬五、六千個兵丁，含其眷口則多達數萬人，這只指直屬於吳三桂的綠旗兵。有五十個佐領，則可設置左右都統⁶，下設前後援剿四鎮分十營，每

⁴ 見趙翼《皇朝武功紀盛、平定三藩述略》

⁵ 見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上》，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金、漢士，晚年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著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等書。

⁶ 都統，係軍隊統領者，歷朝均有，但此處之都統係清朝獨有之制，清代八旗制中，都統為每旗之最高長官；八旗制每旗設固山額真一人，左右梅勒額真一人，清太宗皇太極天聰八年（1634）改為梅勒章京，順治十七年（1660年）定制，固山額真漢字稱都統，梅勒額真稱副都統，掌一旗之戶口、土田、教養與訓練等。清代各省駐防八旗，也設將軍或都統為長官，一般兩者不並置。以上參見除連達《中國歷代官制大詞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914。

營有兵一千二百人。吳三桂除擁有雄厚之兵力外，並以其親信吳應麒、吳國貴、胡國柱等為都統，以馬寶、王屏藩、王緒等十人為總兵，清廷以其時吳三桂初入滇，羽書旁午，對之特為寬容，雲貴督撫均受其節制，對其用人也飭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由吳三桂所薦舉之文武官員稱之為「西選」⁷，對財務所需，戶部不得稽遲，當時「西選」之官遍天下，清廷對之可謂寬厚至極。

以順治十七年（1660 年）部臣奏雲南省俸餉年需九百餘萬，此乃一筆龐大開支，於是廷議召還滿洲兵外，並裁減綠營兵萬分之二，以撙節開支，但吳三桂以邊疆未靖，兵力難減，于於發動對緬甸、水西戰役，以之為保留兵餉之藉口，其擁兵自重心態已是昭然若揭。

吳三桂入滇後，奪故明桂王朱由榔舊宮為藩邸，並加以擴建踵事增華，極侈麗之能事，盡括原雲南豪族沐氏舊莊七百頃以為平西王藩莊，除與西藏五世達賴進行茶馬交易外，更假濬渠築城為名，廣增開市，鑿鹽井、開礦、鼓鑄，潛積硝磺諸禁物（硝磺可用以製造炸藥），對雲南地區重斂金幣，廣積財物，以結交文士，期冀渠等為其效力，其專制滇中十多年，日練士馬、磨利器械，水陸衡要，編置私人，各省提鎮，多為其心腹，其子且尚公主，日在朝廷行走，朝中大小事務無不嫻悉，朝夕飛報與吳三桂，更詭稱蒙古侵掠麗江、中甸，於是調兵前往征勦，旋又稱蒙古兵已遁走（以上均據魏源《聖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上》，以此唬弄朝廷，得以繼續擁兵自重。

康熙十二年（1673 年），平南王尚可喜受制於其子尚之信，遂用幕客金光之計，上奏朝廷請歸老遼東，留子鎮粵，朝廷准其所請，遂令尚可喜撤藩回遼東故籍，其時為康熙十二年三月，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耿盡忠疑朝廷有鳥盡弓藏之意，頗不自安，遂於同年七月也疏請撤藩，以探朝廷是否有撤藩之意，疏上，康熙命群臣廷議，當時群臣咸以吳三桂兵多權重，不可遂移，如准其撤藩，恐變生肘腋，惟有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力請准其撤藩⁸，康熙遂准其撤藩，吳三桂原係

⁷ 見周谷城《中國通史》，頁 920，按該書早在 1930 年代即已出版，惟 1960 年代台灣尚處於戒嚴時期，出版書局不能列印出版者。

⁸ 見《十二朝東華錄》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昔我聖祖（指康熙）於吳三桂一事，

試探性請撤藩，料想朝廷必會加以婉拒，不料朝廷竟准其所請，吳三桂騎虎難下，況且早畜異志擁兵自重，豈肯就此束手，且已與五世達賴互通聲息，無後顧之憂，遂決定起兵反清，時為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按國史傳統一旦舉兵必得有名，吳三桂之舉兵，名義難定，若以反清復明為號召，則吳三桂曾追入緬甸絞殺故明永明王，若以驅逐滿虜復我中華為號召，則吳三桂之降清受爵將作何解？初時吳三桂曾想待行至中原再行舉事，但又恐事機泄露，惟反清已是勢在必行，終於發難舉兵討伐滿虜，遂蓄髮易服，建元立號，以明年為周王元年，改元紹武，鑄錢「利用通寶」，旗幟皆用白色，時貴州巡撫（係官名，始於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係一省之首長，清沿明制，別稱撫台、撫院、撫軍）曹申吉、提督（官名，始於明代為總兵以上之武官名，清代設提督軍務總兵官，簡稱提督，從一品，為一省之高級武官，與督撫並稱「封疆大吏」，提督所屬有鎮、協、營、汛各級）李本深，雲南提督張國柱皆從之，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出走，至鎮遠被吳三桂軍追及自刎，消息傳至北京，舉朝震動。吳三桂之軍於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沅州（今湖南省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使澧、辰之間（澧，今湖南省常德市澧縣；辰，今湖南省懷化縣辰溪縣一帶）道路不通，清偏沅巡撫使盧震棄長沙奔岳州（今湖南省岳陽市），至康熙十三年（1674 年）正月二十四日，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宏等降吳三桂，其時滇、黔川均已失陷，桂、閩、陝危殆，清廷乃先後命都統巴爾布等赴荊州（今湖北省荊州市江陵縣），都統朱滿等馳赴武昌、將軍尼雅翰等速抵安慶（今安徽省安慶市）、總兵除治都還守彝陵（經查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清時期，無彝陵，但有彝良，在今雲南省東北角，地近四川，以當時情勢而言，兩者恐非一地》，鎮西將軍席卜臣駐守西安，清兵雲集於鄖陽（今湖北省十堰市鄖西縣及鄖縣，兩縣相鄰，在湖北省西北部，清時為鄖陽郡，郡治在鄖縣）、宜昌荊州、武昌諸郡逗留觀望，無敢渡江撓吳三桂之鋒者，可見吳三桂其時聲勢頗盛。當吳三桂據澧州，占常德、陷長沙

諭令廷臣集議，當時眾人咸謂不可遂移，惟米思翰、明珠諸人主撤，其後逆藩抗命，眾皆邀罪議撤之人，甚至有進誅明珠之說者，聖祖深闢其說，即宣諭曰：朕自少時，以三藩氣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可因三桂反，遂行委過於人。」可見當時康熙確有撤藩之意。

時，清廣西將軍孫延齡起而反清，自稱安遠大將軍，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同年九月，吳三桂集重兵于中路長沙、岳州一線，又遣總兵彭士亨為左路，直犯川北廣元，謀據寧羌（時為寧羌州，今為陝西省漢中市寧強縣，在陝西省西南角，緊鄰四川省東北角）入陝西。九月二十三日，清定南將軍希爾根奏，吳三桂派將率兵出右路，徑攻江西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在江西省中西部），企圖與耿精忠兵聯成一氣；同月二十四日清廣西提督馬雄、左江總兵郭義叛清，廣西全省騷動，清廷命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率軍討之。吳三桂此時氣勢鼎盛。

吳三桂起事之頭幾年（1673~1678 年）在疆場上頗稱順利，侵城掠地，也頗有所得，雖建元立號，但並未稱帝，至 1678 年（康熙十七年）三月始於衡州（清為衡州府，府治在今湖南省衡陽市）南岳之麓，三月初一，祭天稱帝，正式建號大周，改元紹武，以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封諸將，造新曆，舉鄉試，以之號召遠近，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髹，音休，以漆塗物使之美觀為髹），構廬舍萬間為宮殿，但遇大風雨，登基儀式潦草完成，就中國傳統習俗而言，此乃不祥之兆，《清稗類鈔、方技類》曾載以下一段趣聞，姑且錄之：

「衡州嶽神廟（按衡山為五嶽中之南嶽），有小靈龜，大僅如錢，三桂之叛也，妄冀神器，擇吉祀神，置輿地圖，而默祝之，以視神之所向，龜蹣跚循走，不出長沙、常德（此二地均在湖南省東北部），返至湖南而止，再拜、再禱，龜復如之，三桂及其黨相顧失色。」⁹

這一則雖是稗官野史之說，當然是吳三桂失敗後始有之傳說，姑妄錄之，以作為清人對吳三桂起事之看法。吳三桂稱帝後不及半年於 1678 年八月中風，於八月十七日遂死，吳三桂一死，餘眾已不足道。綜觀吳三桂原係明朝遼東守將，以愛妾為流寇李自成所奪而降清，節操可議，既以身為貳臣，且受封平西王，其子且為額駙，集榮華富貴於一身，理應安份守

⁹ 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台北明文書局，1981 年，頁 475~476。查《清稗類鈔》係徐珂所撰，徐珂本名昌仲可（1869~1928 年），另署中可，光緒時舉人，曾在袁世凱幕下工作，撰有《清稗類鈔》等書，後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一生撰著多達三百多萬言。上引在該書頁 66。

己，然而自古降臣（將）均有不安之心，而新主則對降將有猜忌之意，況且有所謂功高震主，吳三桂對清之入關居功厥偉，又擁兵自重，朝廷對之豈有不防備猜忌之理，吳三桂之反清，全然出於恐懼個人權力名位受剝削，既不能提出恢復故明口號（以其遠征緬甸、追殺故明永明王），以號召故明遺老，又不知提出驅逐滿族，以激起漢人之擁戴，在此種情形下，吳三桂之起事，可說是師出無名，其以失敗收場，似可預卜，不過吳三桂卻知曉聯絡其後方的西藏五世達賴，以免有後顧之憂，此在戰略上具有積極意義，而五世達賴也為此致書清廷（漢文文獻稱「奏言」，其實其時清朝尚未綏服西藏，用「奏言」似未妥）稱：

「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鳴張，不若裂土罷兵。」¹⁰

從此項文獻可見，在康熙十三年以前，吳三桂與五世達賴及西藏，除前述茶馬交易外，必然曾給予五世達賴相當多的「供養」，否則達賴豈肯遣使向康熙求情「三桂若窮蹙乞降，可宥其一死」，甚至說出「倘竟鳴張，不若裂土罷兵」這種語，必然得到吳三桂相當「好處」，此乃合理推測。雖然有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但吾人需知政治人物之話語，可信度不高，甚且所記載下來者，往往與政治人物之原意相反，茲姑舉二例以為佐證：其一，康熙時雖因準噶爾問題，始終無法徹底解決，唯一解決之道，為攻滅準噶爾，攻滅之道如能聯合遠徙裏海北境、伏爾迦河東西兩岸之土爾扈特部蒙古¹¹，形成東西夾擊之勢，當可事半功倍，其戰略思維，一如漢武帝之聯烏孫以合擊匈奴，但康熙以身為「天朝」皇帝，自不願表示有與土爾扈特合兵擊準噶爾之意，於其五十一年（1712 年）派以太子侍讀殷札納為首，輔以理藩院郎中納顏、內閣侍讀圖理琛等共三十二

¹⁰ 見魏源《聖武記》頁 43。另《清聖祖實錄》、《康熙十三年》作：「（達賴）喇嘛又奏言：『蒙古兵力雖強，難以進邊，縱得城池，恐其貪據，且西南地熱，風土不宜。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鳴張，莫若裂土罷兵』」。

¹¹ 土爾扈特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於明末以準噶爾特強，乃率部西徙裏海北境伏爾迦河下游東西兩岸之地，西方文獻多稱之為喀爾瑪克（KalmaK Mongol）或作喀爾穆克、喀爾梅克，有關土爾扈特西徙及其後（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年）東返詳請，可參見馬汝珩、馬大正《漂泊異域的民族》，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 年，劉學鈞《土爾扈特源流與考證校補》蒙藏委員會，1970 年。

人之使團，經俄境西伯利亞赴裏海北境土爾扈特，會晤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事後圖理琛撰有《異域錄》一書，（西人以此稱該使團為圖理琛使團），《異域錄》全書均未提到康熙要聯合土爾扈特之意，按中國官場長官之意向尤其帝王，多不願宣之於口，往往希望部屬或臣工揣摩上意提出長官或帝王心中之意向，對中國官場政治文化略有所知，當會同意本文之看法，按殷札納使團可能沒有能猜中康熙心中想法，康熙在使團出發前，來請「聖訓」時，康熙不得不將心中想法以反面之方式提出「訓示」，康熙面諭使團：

「彼等（指土爾扈特阿玉奇汗等）若言欲會同夾攻（準噶爾部）策旺拉布坦（即策旺阿喇布坦），爾等斷不可應允。但言策旺拉布坦與大皇帝甚是相得，不時遣使請安入覲，大皇帝也時加恩賜，雖其勢力單弱窮迫已極，我主斷不征伐，此事甚大，我等未便相允。」¹²

康熙之「聖諭」可說是違心之論，「聰明」之臣工當能體會出康熙本意。再看當代之例子，自中央政府遷台後，台灣處處可見蔣介石銅像，但據《蔣中正日記》41年十一月一日所記：

「台北基隆道口、松山機場岔路口銅像於生日揭幕，此實浪費招搖之事，以後應嚴禁在生前再建銅像也。」¹³

就在蔣介石「以後嚴禁在生前再建銅像」之「訓示」之下，蔣氏銅像越建越多，以當年蔣氏之威權統治，果真決心禁建銅像，試問何以銅像越建越多，可見政治人物之言論往往言不由衷，甚至具有反面之宣示作用，因此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未必是金科玉律。西藏政教高層之言論更為隱晦，因此五世達賴說出「倘（吳三桂）鳴張，不若裂土罷兵」，其中包含接受了多少吳三桂的餽贈，因此對許多文獻的引用，必須多方查尋。

¹² 見圖理琛《異域錄》卷上，頁2，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所用之版本為《借月山房匯抄》本。

¹³ 轉引自2018年四月一日，台北《聯合晚報》A7版，標題為《銅像滿天飛，蔣中正也不想啊》。

三、噶爾丹

噶爾丹係準噶爾部酋長，而準噶爾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其餘三部為：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及和碩特，土爾扈特西徙後，輝特遞之，仍為四部），額魯特係清代之稱謂，或作厄魯特，明代稱瓦剌、外剌，其複數為衛拉特，其中除和碩特外，均非蒙古本支，也即其原本非蒙古，而後歸入蒙古者，其駐牧地區在大漠以西，也稱漠西蒙古。以其非蒙古本支，在元時無甚政治地位，元帝脫懽帖睦爾退出大都後，蒙古本支力量逐漸衰微，而非本支之衛拉特力量則轉趨壯盛，明英宗朱祁鎮（1436~1449、1457~1464 年在位）且於其正統十四年（1449 年）在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東）被瓦剌也先所俘，史稱「土木堡之變」，可見額魯特蒙古力量之壯盛，及至明末，四部之中以準噶爾部最為壯盛，為爭奪牧場，土爾扈特西徙、和碩特東徙阿拉善與青海，杜爾伯特仍駐牧科布多盆地，如天山以北全為準噶爾部所占有，清初準噶爾部酋長為巴圖爾鴻台吉（鴻台吉、黃台吉、皇太極，均為漢語皇太子之蒙語音譯），此人勇謀兼具，力抗俄羅斯之侵掠，噶爾丹為其第六子，其時各部蒙古均佞崇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帽派或黃教，達賴、班禪、章嘉、哲布尊丹巴為此派之四大「聖者」），常有部落酋長將其子送往西藏出家為喇嘛，巴圖爾鴻台吉也未例外，將其第六子噶爾丹送往拉薩為喇嘛（推測其時當在順治末年或康熙初年），喇嘛教黃帽派對蒙古貴族子弟出家為喇嘛者，都會另眼看待給予優遇，稱之為「朵內」¹⁴，可見佛家所謂眾生平等，在喇嘛裡只是空話一句，不僅如此，五世達賴睿智天生、政治嗅覺極為靈敏，似已看出清朝如旭日初升前景難以限量，必得想方設法，不使其向中國西南方推進，察覺準噶爾部蒙古是其可以利用之棋子，而噶爾丹為巴圖爾鴻台吉之子，乃一「奇貨」，因此到拉薩出家當喇嘛之初，即給予「呼圖克圖」名號¹⁵，但噶爾丹胸懷大志野心勃勃，一心想統治全蒙古，並不潛心，學佛，有文獻指其「不甚學梵書（此處泛指佛經），顧時時取短槍摩弄」

¹⁴ 「朵內」即貴族喇嘛，見俄·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頁 160。

¹⁵ 按「呼圖克圖」係蒙語，意為「明心見性，生死自主」，詳細說即是「能知前生後世，不墮輪迴，生死自如，死後仍然轉世再來」，見胡耐安《邊疆民族志》，蒙藏委員會，1970 年，頁 93，質言之，就是「活佛」。

¹⁶，噶爾丹雖無心於學佛，但其人也算視野寬闊，想憑藉準噶爾部實力，統一各部蒙古，不僅要再創其祖先托歡、也先之霸業，更想與中原一爭短長，甚至幻想成為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第二，且他並非有勇無謀之人，對大環境也有一定程度之認識，深知中國清朝大致綏服漠南各部蒙古，雄踞於準噶爾之東，且有北向西進之意圖（也有向西南青藏地區推進之意），短時期內，準噶爾無力纓其鋒；而北方帝國俄羅斯位於準噶爾之西及北，正積極向西北利亞東部進軍，哥薩克騎兵驍勇、武器新穎，向東侵掠勢如破竹、銳不可當，皆非準噶爾噶爾丹所能挑畔者，就客觀環境看，西邊之哈薩克、天山南麓之葉爾羌汗國均臣於準噶爾，因此向東進掠尚未納入中國清朝之漠北喀爾喀蒙古，遂成為「最佳」選項，且五世達賴為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地區進展，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將清朝力量引向北方，如何將清朝大軍引向北方，慫恿準噶爾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漠北一旦不寧，漠南各部蒙古也必然騷動不安，如是北京、華北必受影響，因此只要漠北有警，清朝大軍不得不調往北方，以圍京師，就戰略而言，五世達賴此舉確具卓見，而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也符合噶爾丹之戰術需求。

噶爾丹在西藏當喇嘛期間，其父巴圖爾鴻台吉去世，噶爾丹從拉薩星夜趕回準噶爾，五世達賴一方面給予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名號（很怪異，達賴係出家喇嘛，原應四大皆空，竟然可以給予他人政治名號），用以增加其在準噶爾之聲望；另一方面派位階極高之喇嘛，隨噶爾丹返回準噶爾，以便隨時為其出謀劃策奪取準噶爾部之領導權，但以拉薩距準噶爾路途遙遠，在噶爾丹抵達準噶爾之前，準噶爾部長之位已由其兄長僧格所繼承，噶爾丹只得等待機會，在此等待機會期間，噶爾丹可能對四周情勢作了詳細分析，按僧格係反對俄羅斯向東擴張者，因此對沙俄採取強硬政策，但噶爾丹則認識到一旦奪得準噶爾首長之位，如想向東侵掠喀爾喀蒙古，就必須與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否則必有後顧之憂，此乃地緣政治使然，西元 1668 年（清康熙七年），其時噶爾丹仍是身著袈裟之喇嘛（但有呼圖克圖之名號），在其私人帳幕中曾接待俄羅斯使者柏林（bbлпин），按稍早準噶爾部長僧格曾要求俄羅斯交還越界放牧，而被俄羅斯扣留之準噶爾屬民惕列烏特人，並揚言如不交還，將舉兵攻擊俄羅

¹⁶ 見梁玠《西陲今略》卷七《噶爾丹傳》，噶爾丹即噶爾丹。

斯之托木斯克及茲坦茨克城，雙方頗有劍拔弩張之勢，但噶爾丹會見俄使時，以一付討好的口氣對使說：

「我們呼圖克圖和喇巴（即喇嘛，此時噶爾丹身邊有五世達賴所派之高位階喇嘛，為之出謀劃策）不是軍人，我們全卡爾梅克（西方文獻稱全部額魯特蒙古為卡爾梅克，按卡爾梅克實際上應音譯為喀爾瑪克 Kalmak 始稱正確，蓋卡或喀的 a 為陽性母音，後面不能配以梅 my 之陰性母音，此乃突厥、回紇語之規則，理應予以辨明）的所有呼圖克圖和喇巴都主張：卡爾梅克人和臺什（即台吉）在任何地方都不要發動對（俄羅斯）皇上陛下的戰爭，沒有什麼必要保護我們那些已經遷往皇上陛下那邊去的惕列烏特人。」¹⁷

按當時準噶爾部（一般或稱之為準噶爾汗國，不確，無論巴圖爾鴻台吉或僧格均未稱汗）當家作主者乃僧格，為維護部族尊嚴與權益，不惜與俄羅斯訴諸戰爭，噶爾丹對俄使伯林之一席話，一副屈膝卑躬諂媚討好嘴臉，躍然紙上，揆其目的，是希望未來奪得準噶爾部領導權後，能與俄羅斯維持友好關係，以遂其向東擴張而無後顧之憂的野心，可見噶爾丹也有相當之謀略，並非單純之糾糾武夫。

西元 1669 年（清康熙八年），準噶爾部首長僧格為其異母兄卓特巴巴圖爾所殺，當時和碩特、杜爾伯特以及較具聲望之額魯特貴族，莫不覬覦準噶爾部首長之位，噶爾丹在西藏喇嘛協助下，又憑其「呼圖克圖」及「博碩克圖汗」之名號，順利奪得準噶爾部之領導權，從此準噶爾汗國（以噶爾丹被五世達賴賜「博碩克圖汗」，故可稱之為汗國）成為五世達賴喇嘛王國之一把利刃¹⁸，甘願為擴張喇嘛王國版圖作馬前卒，關於此點，俄國學者茲拉特金也指出：「無疑的是，噶爾丹如果沒有喇嘛教的支持和幫助（實際上是指五世達賴而言），就不可能指望在這場（指爭奪準噶爾部領導權）的鬥爭中取得勝利。」¹⁹噶爾丹成為準噶爾汗後，自然唯

¹⁷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 221。

¹⁸ 見張植華《略論噶爾丹》一文，文載《中國蒙古史學會成立大會紀念專刊》北京中國蒙古史學會編，呼和浩特，1979 年，頁 435。

¹⁹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 240。

五世達賴之命是從，他也頗有作為，秣兵厲馬開疆闢土，擴大了準噶爾汗國的版圖，儼然成為峙立於中國清朝西部，今中亞東部的游牧大國，從此噶爾丹野心更熾，想恢復其先人托歡、也先的霸業，而此一「雄心壯志」與五世達賴想方設法欲延緩清廷向青藏地區發展的戰略不謀而合，因此鼓動、慫恿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遂成為最佳選項。

噶爾丹雖然奪得準噶爾汗位，也征服天山南路之葉爾羌汗國以及今中亞東部，深知一時之間尚無力與中國清朝正面抗爭，因此在他尚未奪得位之前，即採取親俄羅斯政策，既奪得汗位之後，更與沙俄加緊勾結，以為奧援；另一方面遣使奉表入貢於清朝，對清廷虛與委蛇，並可乘機窺伺清廷之虛實，同時所謂「貢使」竟多達二、三千人，不僅可以獲得朝廷的賞賜，還可以將攜帶之牛、羊、馬、駝、皮毛等貨物出售牟利，以換取準噶爾蒙人所亟需之民生用品，因此所謂「奉表進貢」，實際上對準噶爾之經濟有極大的幫助。噶爾丹之勾結俄羅斯，因其時俄羅斯正全力向貝加爾湖以東布里雅特蒙族聚居進攻，噶爾丹與之勾結，一則自身可以免於有後顧之憂，再則沙俄之東進與準噶爾之東掠漠北喀爾喀，如同時進行，清廷將陷於兩面作戰之困境，勢將顧此失彼，憑心而論噶爾丹也算是頗富謀略，當然其背後是否有西藏大喇嘛為之出謀劃策，以文獻不足，難作有否之推定。

1672 年（清康熙十一年）沙俄政府藉護送僧格時代所派赴莫斯科交涉之代表涅烏蘆思返回準噶爾之便（時僧格已死，噶爾丹已奪得統治權），遣俄人卡爾瓦茨基為使，到噶爾丹駐牧之牙帳一窺準噶爾之虛實，噶爾丹親自予以接見，並要求此後準噶爾派赴莫斯科之使者，俄羅斯各地方當局不應阻擾，可能卡爾瓦茨基親眼目睹噶爾兵強馬壯實況，確具相當實力，足以牽制中國清朝，有利沙俄向東西北利亞之侵掠，由是沙俄對噶爾丹之請求，作出如下之決定：

「不要阻攔噶爾丹使者，並遣送他們到首都。」²⁰

從而可見噶爾丹之聯俄政策頗為成功。噶爾丹如是經營十餘年，噶爾丹認為羽翼已豐，或者五世達賴認為中國清朝已敕平三藩之亂，漠南各部

²⁰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 243。

也幾已歸順清廷，中國清朝可能已有實力向青藏地區發展，乃催促噶爾丹發動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以便將清朝力量引向北方，經過準噶爾與沙俄之協調，沙俄挺進西北利亞東部、額爾古納河西岸之雅克薩地方，以優勢兵力（尤其武器）征服當地土著，築雅克薩城，已逼近額爾古納河，清廷不得不出兵將之驅逐²¹，而噶爾丹趁中俄雅克薩發生戰爭時，率三萬鐵騎悍然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敵，向南逃往中國漠南達里岡崖牧場，康熙不欲兩面作戰，在對俄雅克薩戰勝之情況之下，與之簽定《中俄尼布楚條約》，將額爾古納河以西三十多萬平方公里之地割與俄羅斯，噶爾丹趁俄羅斯東侵雅克薩時，東掠喀爾喀蒙古，在時間拿捏上相當精準，這其中是否有西藏大喇嘛為之出謀劃策，實有懷疑之空間。

就在以上外在情勢及噶爾丹主觀意念下（此一主觀意念其實就是五世達賴「大戰略」的遂行），在噶爾丹東掠大軍中，有五世達賴所派位階極高之大喇嘛濟隆呼圖克圖等數十人²²作為噶爾丹之「智庫」，當準噶爾大軍進入漠北喀爾喀地域後，奸淫擄掠逢人便殺，可說是無惡不作，固然不能指明濟隆呼圖克圖等數十西藏大喇嘛，參與此等暴行，但其親眼目睹此等暴行而未加阻止，則為不爭之實，所謂出家人慈悲為懷，此際早已被拋諸九霄雲外。準噶爾大軍不僅殺土謝圖部汗幹齊賚所屬之許多台吉，且

²¹ 有關中俄雅克薩之戰非本文主題，略，但可參見劉學鈞《五世達賴、噶爾丹與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文，該文輯入劉著《歷史原來是這樣》，台北大地出版社，2017年，頁249~286。

²² 濟隆呼圖克圖之在噶爾丹軍中，見《清聖祖實錄》卷181，頁14下—15上，此處係引自《清實錄藏族史料》，此一濟隆係第六世，名阿旺工曲宜瑪，見張其勤，《西藏宗教源流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濟隆呼圖克圖之在噶爾丹軍中，顯然負有特殊使命（任務），但又不能公諸於世，當代被西方學界奉為圭臬之《西藏政教史》一書，對此一重要史事居然避而不提，顯見濟隆之在噶爾丹軍中，有不可告人之任務，按《西藏政教史》係流亡印度藏籍商人夏格巴所著，按夏格巴全名作夏格巴旺曲德典，或作夏格巴旺秋德丹，於1976在印度出版此書，極盡扭曲變造史實之能事，之後此書譯為英文，西方學者對藏事之瞭解，多出於此書，由於此書捏造史實，大陸自治區曾由《西藏政治史評注小組》編寫評論性之《夏格巴「西藏政治史」與西藏歷史的本來面目》小冊，對該書之謬誤數十處提出糾正，但全文晚到1992年始以內部參考方式予以漢譯，書名為《藏區政治史》，譯者為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季剛、余萬治、央京娜姆及次仁拉姆，全書分上下兩冊，凡七百多頁，屬內部編號方式出版。

掠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屬牧民²³，據目擊者稱：

「卡爾每克博碩克圖汗（按即噶爾丹），率領大批人馬進攻幹齊賚汗的兒子以及呼圖克圖和其他許多台吉的大量烏盧斯（即烏努什或兀魯思，意為領地）牧民，將他們趕出故土，取了幹齊賚汗和呼圖克圖治下的許多村落，又將他們的烏爾嘎（即營地）夷為平地。」²⁴

另據清廷所派赴喀爾喀使者錢良擇所撰《出塞紀略》²⁵中稱被噶爾丹大軍擊敗之喀爾喀蒙人之慘狀：「以木為匣用盛小兒，置於駝背」、「死者相枕，臭聞數里」，可見噶爾丹大軍殺戮之慘狀；另沙俄派往噶爾丹大營充當「參謀」之俄使基比列夫，於 1690 年（康熙二十八年）三至七月間穿越喀爾喀地區，返回俄國後，於其報告書中也指出其親眼目睹喀爾喀蒙古被蹂躪之慘狀：

「在那些蒙古草原上，住所被卡爾梅克人博碩克圖汗洗劫一空，那些屢遭洗劫的殘餘的蒙古人，在山溝和草原上飢餓地流浪著，並且人相食。」²⁶

試問這種如同人間地獄的慘狀，身在噶爾丹大營的西藏大喇嘛濟隆呼圖克圖等，何以不本諸我佛慈悲的訓示，出面加以阻止，以彰顯上天有好生之德，然而濟隆等這一批西藏大喇嘛，全然未加以勸阻，從而益顯五世達賴或桑結第巴只想假手噶爾丹蹂躪漠北喀爾喀蒙古，迫使清廷調軍北上，使清廷不能或無力向青藏地區進展，純就戰略而言，五世達賴無愧其「達賴」（「達賴」係蒙古語，意為「海洋」，可衍伸為智廣如海，係漠南蒙古俺答汗賜予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的名號）名號「智者」的含意，但與佛門悲天憫人的本意，卻是背道而馳的。

當中俄在雅克薩發生戰爭時，噶爾丹趁機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康熙

²³ 此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之子，為喀爾喀蒙古第一世哲佛，相傳為印度、西藏第十四世札阿囊昆噶寧波之轉世，見釋妙舟《蒙藏佛教史》，揚州廣陵書社，2009 年，頁 149。

²⁴ 見張植華《略論噶爾丹》一文，頁 439，詳見本文註 18，係引自外文資料。

²⁵ 《出塞紀略》一文附於魏源《聖武記·康熙親征準噶爾記》，頁 91~92。

²⁶ 茲拉特金著、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頁 273。

在盱衡情勢後，認為準噶爾之為害較之俄羅斯為甚，必須徹底解決，因此在雅克薩打勝仗之情況下，與沙俄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將額爾古納河以西（額爾古納河係黑龍江上游）至貝加爾湖之地割讓予俄，換取與俄羅斯之和平相處，以便騰出兵力對付準噶爾之噶爾丹，此乃在兩權相害取其輕之不得已作法。外蒙古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眾逃到漠南達里岡崖牧場避難時，康熙盡一切可能加以濟助，並承諾將御駕親征，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喀爾喀地區，使漠北蒙古返牧故土，康熙果真言出必行，前後三度親征噶爾丹，卒將噶爾丹逐出漠北，最後噶爾丹在走投無路之情況，困病而死²⁷，臨終時說出：

「我（噶爾丹）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指漠北喀爾喀蒙古），為（五世）達賴喇嘛煽惑而來。由今觀之，達賴陷我，我又陷眾人矣！」²⁸

可憐一代梟雄噶爾丹，因受五世達賴之蠱惑，甘為其馬前卒、手中刃，終於落得走投無路困病而死。

四、五世達賴

「達賴」一詞，係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或作阿勒坦汗）頒賜給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之名號，原係蒙語，其意為「海洋」，按無論漠南或漠北蒙古，均不臨海，因此所謂「達賴」（海洋），通常僅指水域較大的湖泊而已，既係俺答汗頒賜索南嘉措之名號，與廣大之藏族毫不相干，索南嘉措得到此一稱號之後，以其可衍伸為「智廣如海」，他不敢專享此一名號，乃向上推兩世，以宗喀巴嫡傳弟子根敦珠巴為一世達賴，根敦珠巴之轉世根敦嘉措為二世達賴，索南嘉措自為三世達賴，從此代代相傳，目前流亡印度之拉木敦珠為十四世達賴。

索南嘉措得到「達賴」名號後，更希望能得到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之

²⁷ 一般漢文史均稱噶爾丹在窮途末路時，仰藥自殺，但西方及近現代大陸學者，多認為噶爾丹係病死，此說可信度較高。

²⁸ 溫達《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十五，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此處係轉引自日人若寬松、馬大正編《清代蒙古的歷史與宗教》，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87。

保護、支持，以便與在藏地掌權之喇嘛教噶舉派抗衡，點慧之三世達賴想出絕妙的方法，指定蒙古俺答汗之曾孫為四世達賴，如此一來把蒙古土默特部與喇嘛教格魯派（黃帽教）綑綁在一起，逼使蒙古土默特部不得不成為格魯派之後盾，如此巧妙之安排，實無愧於「智廣如海」之名號，以往論歷輩「傑出」之達賴，每以五世達賴、十三世達賴為最，論點慧，三世達賴絕不在五世、十三世之下。四世達賴法名雲丹嘉措，為歷世達賴中唯一蒙古族，雲丹嘉措出身於蒙古貴族，自然不捨其在童稚之年，即離鄉入藏過出家生活，直至十四歲時始在蒙古土默特部武裝部隊護送下入藏學經，雲丹嘉措既貴為格魯派最大活佛，應是養尊處優錦衣玉食，有最好之醫療照顧，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四世達賴入藏後，僅過十四年，在青壯之十八歲即告圓寂，對其圓寂留下頗多想像空間，而且此後再無蒙古族被認定為是達賴之轉世，蒙族之四世達賴雲丹嘉措之入藏，對掌權之噶舉派，不免具有若干鎮懾作用，以其家族在漠南具有實力與威望，然俺等汗死不久，土默特部勢力崩解，四世達賴也「適時」圓寂。有一事頗值一提，四世達賴入藏後，於 1614 年以四世班禪羅桑却吉堅贊為師，在拉薩哲蚌寺受比丘戒²⁹，從此形成班禪、達賴此兩系活佛互為師徒之不成文慣例，此慣例至今已有四百年，照理說目前十四世達賴已高壽八十五歲，一旦圓寂，十五世達賴必得以十一世班禪為師，此乃行之四個世紀之慣例。

四世達賴既已圓寂，其時在藏地（按其尚時尚無西藏一詞，仍稱吐蕃，此處為行文前後一貫，姑用藏地）掌握實際統治權者操在藏巴汗手中（藏巴汗係漢文簡譯，全文意為「第悉藏巴」為後藏上部之王，屬噶舉派噶瑪支派之政權，此非本文主題，從略），藏巴汗原就對格魯派有所不滿，現四世達賴既已圓寂，遂下令中斷達賴一系之轉世，此時格魯派信徒（含蒙古各部）至為不滿，喀爾喀部確科爾兄弟率兵入藏，想以武力迫使藏巴汗收回成命，但卻被藏巴汗所擊敗³⁰，四世達賴仍不得轉世，就在此際，藏巴汗染患重病，雖延醫診療，卻是藥石罔效，眼見即將不久於人

²⁹ 見五世達賴著，陳慶英、馬連龍譯《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傳》，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1992 年，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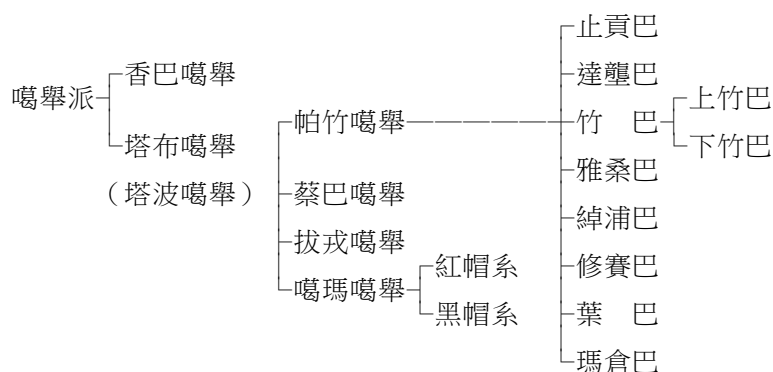
³⁰ 見李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57。

世，因深知四世班禪羅桑却吉堅贊（1567~1662 年）深通醫術，在求生意志之下，不得不向前此所反對之格魯派四世班禪求助，請求給以治療，四世班禪為格魯派生存與發展著想，同意為藏巴汗療病，四世班禪果真醫術高明，終於使藏巴汗恢復健康，藏巴汗為對四世班禪表達謝意，表示捐獻一處莊園給班禪所駐錫之札什倫布寺（在後藏日喀則），以為酬謝其診療之功，但四世班禪為求格魯派達賴「法脈」得以延續，辭却藏巴汗的餽贈，僅懇求准許達賴得以轉世，藏巴汗一則感到四世班禪對已有救命之恩必得有以回報；再則深信格魯派已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下，不會受到威脅，遂同意准四世達賴轉世³¹，就此看來四世班禪對達賴一系有再造之恩，這是史實。

既然藏巴汗允准達賴轉世，於是格魯派內就開始尋找四世達賴的轉世靈童（蒙語稱之為呼畢勒罕），當時藏地喇嘛教各教派競爭權力極為激烈，噶舉派（俗稱白教）已失勢之帕竹噶舉³²，同情格魯派，於是雙方合作，共同推定阿旺洛桑嘉措為四世達賴之轉世靈童，時為 1622 年（明熹宗朱由校天啟二年，後金努爾哈赤天命七年）³³，靈童既已認定遂派代表向藏巴汗政權稟報轉世靈童認定經過，當時掌握藏巴汗政權權力之內大臣仲尼旺宮瓦及外大臣崗蘇克強對靈童本身雖未提出置疑，但對靈童駐錫地點則加以刁難，藏巴汗政府希望靈童留在後藏札什倫布寺，因藏巴汗政權中心在後藏，如是易於控制達賴，但格魯派代表很技巧地使達賴仍在前

³¹ 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 128~129。

³² 噶舉派內支派繁雜，茲以表列方式呈現如次：



³³ 見克珠群佩主編《西藏佛教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頁 464。

藏哲蚌寺駐錫（有關交涉經過詳情見陳慶英等編著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 131~134，於此不贅），五世達賴阿旺洛桑嘉措天生睿智點慧無比，而格魯派許多高位階大喇嘛也都足智多謀，對於藏巴汗政權及噶舉派噶瑪噶舉之壓制，早已設法要加以反制。

當時（十七世紀初）客觀環境是滿洲努爾哈赤初崛起，建立後金政權，聲勢尚未大張；明朝仍然統治內地，但已非武力強大之帝國，塞外土默特蒙古力量也已瓦解，準噶爾部蒙古在巴圖爾鴻台吉統治下，稱雄於天山以北；和碩特部蒙古在固始汗（或作固實汗）帶領下，占有青海，與西藏毗鄰，力量相當強大，且崇信喇嘛教一格魯派，由是格魯派或五世達賴遂結好和碩特部固始汗，希圖引固始汗之力剷除藏巴汗政權，固始汗看出後金國力如旭日初升（清入關前稱金，史稱後金，入關後始改國號為清），銳不可當，終將問鼎中原，遂通好於後金，並要五世達賴派使者與固始汗之使者到盛京（今遼寧瀋陽）向後金示好，時為 1642 年（後金皇太極崇德七年），時漠南東部蒙古科爾沁、扎魯特等部已歸順於後金，無論努爾哈或皇太極已知蒙古人佞崇喇嘛教格魯派，意識到優遇喇嘛教，可以收服眾蒙古，其實古今中外，凡英明之政治領袖，都會運用宗教以統治人民，反之則為宗教領袖所運用，當固始汗與五世達賴之使者到盛京後，皇太極可能曾口頭邀請五世達賴來訪，遂有之後五世達賴訪問北京之行。

當五世達賴（以下均僅稱達賴）欲藉和碩特蒙古固始汗之武力剷除藏巴汗政權，固始汗也確實率軍入藏擊滅藏巴汗，但固始汗本人卻駐在拉薩，實際統治西藏，其時達賴對固始汗之統治，心悅誠服，曾於其所著之《西藏王臣記》³⁴中說出以下一段話：

「王率百萬雄師（按王指和碩特固始汗），轉戰南部（按西藏在青海之南），盡取閭羅到邊以內之地。壬午年（按係 1642 年，後金皇太極崇德七年）二月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門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其傲慢之容，俯首禮拜、恭敬歸順。霍爾（指蒙古）曆三月十五日，依『時輪』算規新年開始之日，汗

³⁴ 此書原名《天神王臣下降雪域（西藏）陸地事跡要記——圓滿時節，青春喜筵之杜鵑歌聲》，以書名太以冗長，遂將之簡化為《西藏王臣記》，此書由劉立千譯注，2000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

王（指和碩特固始汗）即成為全藏三區之主。王令如大白傘，
覆蓋于三界之頂首。」³⁵

達賴這一段話明白表示西藏臣服於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統治之下，而和碩特僅為額魯特蒙古四部之一部，論實力尚不如準噶爾部之巴圖爾鴻台吉，更非蒙古本支之領袖，達賴及西藏已臣服於固始汗，目前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叫囂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若非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沒讀過五世達賴之《西藏王臣記》），則是有意欺騙世人；且再進一步看所謂「主權」，乃是十七世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始創出之政治術語，西藏怎可能「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明顯是唬弄世人，較調出家人不打狂語，更為可惡。

固始汗實質統治西藏，以其擁有武裝力量，達賴不得不俯首禮拜、承認固始汗為全藏三區之主，這是五世達賴親自黑字寫在白紙之上，狠狠的打臉了十四世達賴所說的「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十四世達賴如果還認為自己是讀過書的喇嘛，應該面壁三年禁聲不言。

西藏的統治權握在和碩特蒙古固始汗手中，達賴雖在宗教具有崇高地位，但對俗世的政治，固始汗是不會讓他染指的，但固始汗之入藏是受格魯派之請求，以保護格魯派為名進軍藏地，因此得到許多格魯派信眾的支持，在逼降藏巴汗統治全西藏後，不能不考慮到達賴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蒙古人對喇嘛教格魯派的佞崇，同時固始汗更想藉達賴在額魯蒙古的影響，重振和碩特為額魯特蒙古四部的盟主地位（額魯特四部，除和碩特部為蒙古本支、且屬黃金氏族，其餘均為蒙古別支，因此和碩特在額魯特聯盟中，常居於盟主地位），因而必須給達賴以適當地位，於是固始汗效法元朝創建者忽必烈對帝師八思巴的作法，將衛藏十三萬戶獻給達賴，吾人需知所獻不過是稅收而已，統治權仍握在固始汗手中。

五世達賴認為固始汗既將藏地十三萬戶獻給自己，則達賴自當為藏地之主，但以固始汗率軍入藏戰勝藏巴汗（丹律旺布）將之捕獲下獄（其後將之裝入皮囊投入雅魯藏布江處死），命噶瑪噶舉派喇嘛改宗格魯派，噶瑪噶舉派從此一蹶不振，有功於格魯派，兼以固始汗威望隆崇，因此在固

³⁵ 見劉立千譯註之《西藏王臣記》頁128。

始汗生前，實質統治西藏，並無問題，此所以五世達賴在其所著《西藏王臣記》一書說出對固始汗之統治心悅誠服。固始汗之統治西藏也有其高度之政治智慧，雖然尊崇五世達賴為藏地宗教領袖，但將甘丹頗章政權權力之實際行使者第巴一職之任命權，由固始汗親自掌握³⁶。就五世達賴而言引進和碩特蒙古固始汗，剷除了藏巴汗、摧毀噶瑪噶舉派，雖一掃心中之夙恨，但政權仍握在固始汗手中，而固始汗之實力又強過藏巴汗，等於驅逐了狼，卻引進了虎，心中自是不甘，但又無可奈何。

固始汗於 1655 年（清順治十二年）病逝於拉薩，享壽七十三歲，固始汗死後，五世達賴認為以往持教法王（前此視土默特俺答汗為持教法王，之後奉固始汗為持教法王，即護持宗教之法王）家族高高在上，作為格魯派最高法王之達賴自是心中不平，固始汗既死，遂想從持教法王家族手中剽竊一些政治權力，在藏地固始汗為最高政治領袖，在宗教上自以五世達賴為最，但實際執行者則為在此二人之下的第巴，第巴一職之任命權操諸固始汗手中，固始汗既死，五世達賴如想獲得世俗的政治權力，只有從第巴任命權著手，於是五世達賴便與固始汗家族對第巴任命權展開一場微妙之競逐。

固始汗死後，其諸子競逐汗位而展開一場鬥爭，最後由其長子達延鄂齊爾繼承汗位，由於與在青海之諸弟互相猜忌，必須予以擺平，因此延後三年始入藏，達延鄂齊爾是勇敢大戰將，但對政治則極其外行，在其入藏之前，藏地諸多重大事務，達延鄂齊爾均未過問，五世達賴嚐到權力的滋味，如所周知，一旦嚐到權力滋味後，鮮少能自動放下，而且藏中也發覺和碩特部內部不和，一些反對和碩特蒙古對藏地之統治，也開始蠢蠢欲動，達延鄂齊爾對政務不感興趣，當首任第巴索南饒丹於 1658 年（清順治十五年）去世時，五世達賴向達延鄂齊爾詢問新任第巴人選時，達延鄂齊爾對如此重要之人事任命竟毫不在意，表示尊重五世達賴意見³⁷，五世達賴也認為此人事極為重要，經慎重考慮後，任命赤烈嘉措為第二任第巴，熱烈嘉措由於是由五世達賴提任，因此處處唯達賴之命是從，可見達賴從和碩特汗手中剽竊了若干世俗之政治權力。達延鄂齊爾於 1668 年

³⁶ 見陳慶英等編《歷輩達賴生平形象歷》頁 155。

³⁷ 見李兒只斤蘇和、班布日《衛拉特三大汗國及其後人》，頁 70。

（清康熙七年）去世，和碩特內部又陷入汗位爭奪，同年，第二任第巴赤烈嘉措也去世，一時西藏最高統治者與最高行政長官均出缺，五世達賴看到自己總攬政教兩權的機會終於到來，由於青海和碩特貴族競逐汗位頗為激烈，一時之間未能定於一尊，於是五世達賴便逕行任命親信羅桑圖道為第三任第巴，此時第巴之行政權力幾已被達賴剝奪殆盡，僅成為達賴之宗教助手，一切政治權力都被達賴所獨攬，和碩特部經過三年的內訌，於 1671 年（清康熙十年），始由達延鄂齊爾之長子貫綽克喇達那繼承汗位並入藏，五世達賴給予「丹津達賴扎勒布」尊號，簡稱達賴汗³⁸，達賴汗一如其父，對繁瑣之政務不感興趣，對於第巴已被達賴所操控，並不表示異議，五世達賴眼見奪取行政大權之時期業已成熟，1675 年第三任第巴羅桑圖道自請卸任，達賴任命自己的愛徒桑結嘉措為第四任第巴（此時已完全跳過和碩特汗），桑結嘉措以年事尚輕、經歷不足為詞，推辭任命，達賴改任命羅桑金巴為第四任第巴，以為過渡，至 1679 年（清康熙十八年）羅桑金巴過渡性任務完成，自請卸任，達賴遂任命桑結嘉措為第五任第巴，西藏情勢從此丕然大變。

桑結嘉措出身拉薩郊區大貴族仲麥巴家族，此人既點慧又有學問，更有野心，原名貢確敦珠，為卓越之天文學家與醫學家，有三十多部專著，應屬不可多得之人才，五世達賴其極為信賴與倚重，二人想法與作法幾乎完全一致，1679 年（清康熙十八年）五世達賴曾「宣布他（指桑結嘉措）的所作所為與達賴喇嘛本人所為完全一樣。」³⁹因此無論桑結嘉措所為或五世達賴所為，本質上都等同是五世達賴之所為。

當五世達賴初以蠶食方式剽竊得西藏地方若干政治權力後，食髓知味，而和碩特繼固始汗者均無心於政務，兼內訌頗烈，遂予五世達賴以鯨吞藏地政治權力，自是藏地政教兩權定於一尊，五世達賴天生睿智，已看出中國清朝康熙帝乃英明有為之君王，如假以時日，終將統一全中國，西藏在中國範疇之內，但達賴也深知人之壽命有限，如能延緩中國清朝向青

³⁸ 同註 36 所引書頁 71。

³⁹ 見夏格巴著、劉立千、羅潤蒼、扎西尼瑪、楊秀剛、余萬治、央京娜姆、茨仁拉姆等譯《藏區政治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此書係內部發行，上冊頁 253。

藏地區推進，待康熙龍馭上賓，其繼任者未必有賢如康熙，如是西藏將可逍遙於中國之外，達賴也仍可專制獨裁於「喇嘛王國」之內，純就戰略思維而言，此項看法也頗正當，其門徒漠西蒙古首席大喇嘛咱雅班智達也不主張與中國清朝往來⁴⁰，但是如何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地區推進，乃是一高難度戰略思維，西藏本身武力微不足道，以往賴以為持教法王的青海和碩特蒙古，也已衰微，且已傾向中國清朝，更不足恃，稍早清平西王吳三桂駐紮雲南，曾與達賴除茶馬交易外，並曾厚遺達賴，以為奧援而免後顧之憂，按雲南西北部有藏人聚居（今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因此吳三桂與西藏五世達賴結盟，自有政治意義，但達賴明知吳三桂是中國清朝治下的一個藩王，而與之結盟，明顯含有欲以吳三桂牽制清朝的作用，其後吳三桂反清，清廷曾致書五世達賴囑其「分兵進討，若吳三桂勢蹙投降，喇嘛（指五世達賴）其即執送。」（見《康熙實錄》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四月乙卯條），而達賴遣使回覆除敷衍康熙外，更稱：「若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鳴張，莫若裂土罷兵。」（同上引《康熙實錄》），康熙對此答覆極表不滿，告知來使稱：「吳三桂負此殊恩，構衅殘民，天人共憤，朕乃天下人民之主，豈容裂土罷兵？」（出處同上），從而可見五世達賴確有與吳三桂結盟之事，希望因吳三桂之反清，達到「裂土罷兵」目的，如是，則清廷自無力進軍西藏，就戰略而言，也屬高招，不料吳三桂病死軍中，吳三桂之叛旋即被清廷敕平。

吳三桂之叛既被清廷敕平，五世達賴想藉吳三桂之亂，使清廷裂土罷兵自然落空，達賴環顧當時客觀情況，中國清朝敕平吳三桂之亂後，聲勢更為壯盛，漠南各部蒙古多已歸順中國，且編設為盟旗，漠北喀爾喀蒙古雖尚未納入中國版圖，但其心向中國，喀爾喀雖也崇信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其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之子，其前身則為藏人覺囊派高僧多羅那他，到喀爾喀弘法，極受漠北喀爾喀蒙人尊崇，蒙人尊之為「邁達理活佛」（邁達里 Maidari 係梵文之蒙語讀音，意為慈氏，也即彌勒佛），多羅那他在漠北喀爾喀地區弘揚覺囊派教法二十多年，喀爾喀蒙人復尊之為「哲布尊丹巴」，此一稱號乃蒙藏兩族喇嘛

⁴⁰ 有關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事跡，可參看喇德納巴德喇著、成崇德譯註《咱雅班智達傳》，北京全國圖館文獻縮微復冊中心出版，1990年。

對精通喇嘛教法、而又能嚴守戒律之大喇嘛之尊稱，1634 年（後金皇太極八年）圓寂，次年喀爾喀土謝圖汗適得一子，遂認係多羅那他之轉世，遂為喀爾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世，稍長入藏學經，五世達賴強迫其改宗格魯派，否則不准其回漠北喀爾喀蒙古，不得已改宗格魯派，心中自有不甘，對五世達賴未必真正尊崇，兩者心存芥蒂乃是極自然之事，達賴不信任喀爾喀蒙古，也屬意料中事，不能依靠漠北喀爾喀蒙古以牽制中國清朝。

草原游牧民族自匈奴以至蒙古，其政治領袖均喜好擁有美好的名號⁴¹，黠慧之達賴深知蒙人此一習俗，乃投其所好，對各部蒙古領袖人物給予名號，蒙古人一旦接受此封號，無形中即成為達賴之下屬、附庸，茲將五世達賴對各部蒙古所給予封號，據學者所著專書表列如下⁴²：

五世達賴喇嘛冊封的蒙古諸部首領

| 時間 | 部屬名稱 | 人物 | 封號 | 出處 | 備註 |
|--------|------|--------|---------|----------------------------|------------------|
| 1626 年 | 土默特 | 圖巴台吉 | 岱松琿台吉 | 《五世達賴喇嘛傳》 ③(上)第 59 頁 | 此時漠南蒙古尚未歸服(後金)清朝 |
| 1635 年 | 准噶爾 | 巴圖爾琿台吉 | 額爾德尼巴圖爾 | 《准噶爾汗國史》第 156 頁 | |
| 1637 年 | 和碩特 | 固始汗 | 丹津曲吉嘉布 | 《五世達賴喇嘛傳》 (上)第 109 頁 | 對和碩特蒙古的首次冊封 |
| 1646 年 | 土爾扈特 | 書庫爾岱青 | 不詳 | 《卡爾梅克族在俄國境內時期的歷史概況》①第 12 頁 | 冊封為汗 |
| 1655 年 | 和碩特 | 鄂齊爾圖 | 洪台吉 | 《五世達賴喇嘛傳》 (上)第 284 頁 | |
| 1658 年 | 和碩特 | 達延汗 | 丹增多吉杰布 | 同上，第 307 頁 | 青藏和碩特蒙古第二代汗王 |
| 1658 年 | 和碩特 | 達賴巴圖 | 達賴洪台吉 | 同上，第 316 頁 | 固始汗之 |

⁴¹ 可參見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此問題非本文主題，故略，如有興趣可參看此書。

⁴² 見王力《明末清初達賴喇嘛系統與蒙古諸部互動關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年，頁 280~283。

| 時間 | 部屬名稱 | 人物 | 封號 | 出處 | 備註 |
|--------|------|----------------------|----------------------|---------------------|---------------|
| | | 爾 | | | 子，青海和碩特蒙古最高首領 |
| 1659 年 | 和碩特 | 汗王兄弟等 | 不詳 | 同上，第 318~319 頁 | |
| 1660 年 | 和碩特 | 達延汗 | 丹增達延杰波 | 同上，第 350 頁 | 第二次冊封 |
| 1662 年 | 和碩特 | 達賴洪台吉 | 墨爾根洪台吉 | 同上，第 383 頁 | 第三次冊封 |
| 1666 年 | 和碩特 | 鄂齊爾圖 | 車臣汗 | 同上，第 437 頁 | 第二次冊封 |
| 1671 年 | 和碩特 | 達賴汗 | 丹增達賴汗 | 《五世達賴喇嘛傳》（下）第 55 頁 | 青藏和碩特蒙古第三代汗王 |
| 1671 年 | 和碩特 | 薩鈞、仁欽、貝貝 | 墨日根台吉、徹臣台吉、額爾克齊農 | 同上，第 56 頁 | 青海和碩特蒙古諸位首領 |
| 1672 年 | 准噶爾 | 噶爾丹 | 琿台吉 | 同上，第 90 頁 | 還俗後的首次冊封 |
| 1673 年 | 喀爾喀 | 特巴噶 | 覺里克圖額爾克岱青 | 同上，第 110 頁 | |
| 1673 年 | 和碩特 | 噶居羅卜藏丹津 | 額爾德尼達爾汗曲杰 | 同上，第 120 頁 | |
| 1674 年 | 喀爾喀 | 汗王及其長子 | 土謝圖汗和班智達額爾德尼台吉 | 同上，第 145 頁 | 哲布尊丹巴一世兄、侄 |
| 1674 年 | 和碩特 | 策旺拉布坦、王妃的親兄弟尼爾巴、其弟丹津 | 額爾克岱青、土謝葉圖諾顏、額爾德尼巴圖爾 | 《五世達賴喇嘛傳》（下）第 145 頁 | |
| 1674 年 | 喀爾喀 | 薩鈞台吉之子扎什 | 額勒覺喀丹巴圖爾 | 同上，第 147 頁 | |
| 1677 年 | 和碩特 | 噶爾丹達吉 | 噶爾丹岱青博碩克圖齊農 | 同上，第 255 頁 | |

| 時間 | 部屬名稱 | 人物 | 封號 | 出處 | 備註 |
|--------|------|-----------|-------------|---------------------------|-----------------|
| 1678 年 | 和碩特 | 畢力克額爾克台吉 | 居熱圖和碩齊台吉 | 同上，第 282 頁 | |
| 1678 年 | 準噶爾 | 噶爾丹 | 噶爾丹丹增博碩克圖汗 | 同上，第 291 頁 | 第二次冊封 |
| 1679 年 | 和碩特 | 本阿旺丹增 | 卓里克圖岱青 | 同上，第 331 頁 | |
| 1679 年 | 和碩特 | 本才丹 | 額爾德尼青台吉 | 同上，第 352 頁 | |
| 1679 年 | 喀爾喀 | 扎薩克圖部車臣濟農 | 齊農 | 《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①第 82 頁 | |
| 1681 年 | 和碩特 | 額爾德尼台吉 | 額爾德尼覺里克圖台吉 | 《五世達賴喇嘛傳》（下）第 445 頁 | |
| 1683 年 | 喀爾喀 | 衛征哈坦巴圖魯 | 不詳 | 《清初五世達賴喇嘛檔案史料選》第 102 頁 | 第巴桑結嘉措以達賴喇嘛名義所為 |
| 1690 年 | 土爾扈特 | 阿玉奇 | 岱青阿尤喜汗 | 《最後的游牧帝國：准噶爾部的興亡》②第 193 頁 | 同上 |
| 1691 年 | 準噶爾 | 策妄阿拉布坦 | 額爾德尼卓里克圖洪台吉 | 《西域圖志》卷 47，《雜錄一》第 601 頁 | 同上 |
| 1694 年 | 準噶爾 | 策妄阿拉布坦 | 阿爾泰以西准噶爾汗 | 《清聖祖實錄》卷 166 第 17 頁 | 第巴桑結嘉措以達賴喇嘛名義所為 |

上列所列僅為蒙古各部世俗首領，各部喇嘛教高位階喇嘛尚未包括在內，如一一加以表列，可謂枚不勝舉，多得不可算計，從而可見五世達賴何其點慧，利用蒙人喜好虛名之人性弱點，予以「收編」，如以各部蒙古受「封」情況分析，從下表可知梗概（同註 41）：

五世達賴喇嘛對蒙古諸部首領冊封情況統計

| 部屬名稱 | 次數 | 人次 | 汗、琿台吉 | 其他封號 |
|--------|----|-------|-------|------|
| 和碩特蒙古 | 19 | 21 以上 | 6 | 5 |
| 準噶爾蒙古 | 5 | 3 | 5 | 0 |
| 土爾扈特蒙古 | 2 | 2 | 2 | 0 |

| 部屬名稱 | 次數 | 人次 | 汗、琿台吉 | 其他封號 |
|---------|----|-------|-------|------|
| 漠北喀爾喀蒙古 | 5 | 7 | 1 | 6 |
| 漠南蒙古諸部 | 1 | 1 | 1 | 0 |
| 總計 | 32 | 34 以上 | 15 | 11 |

從上項統計表可看出五世達賴對額魯特蒙古（今和碩特、準噶爾、土爾扈特）情有獨鍾，在三十二次的賜封中，額魯特蒙古占二十六次，其中對準噶爾之噶爾丹賜封兩次，相當特殊（認證其為轉世呼圖克圖尚不在內），可見其對噶爾丹之重視，從另一角度看，噶爾丹深具被利用之價值。

前文已介敘噶爾丹係準噶爾部首長巴圖爾鴻台吉之第六子，對其事跡前文已有敘述，於此不贅，達賴認為如能蠱動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則漠南各部蒙古（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必將騷動，漠南蒙古與北京近在咫尺，為保衛京師，清廷必然要將大軍北調，如是自無餘力經營西藏，達賴可自專於其喇嘛王國，至於準噶爾騎兵與喀爾喀蒙人，乃至清軍之死傷，都不在其考慮之內，所謂「死道友，不死貧道」正是此意，至於如何遂行此一計畫，首先需協助噶爾丹奪得準噶爾部首長之位，其次需噶爾丹俯首聽命率兵東侵，而且尚需與俄羅斯搭配，同時向東進攻，使清廷無法兩面作戰，則準噶爾東掠喀爾喀將可穩操勝券，凡此均非噶爾丹所能勝任，因此派出以濟隆呼圖克圖為首之西藏喇嘛七十多人，在噶爾丹軍中為其出謀劃策，而且此七十多個西藏喇嘛，除充當噶爾丹「智庫」角色外，還扮演著求和使的角色，達賴深知中國清朝對西藏地方至為重視，基於愛屋及烏，連帶的對達賴也極為尊崇，達賴或第巴桑結嘉措算計著一旦噶爾丹戰敗，清軍追剿，那時這七十多個西藏喇嘛出面向清軍求情，希望手下留情，使噶爾丹不至全軍覆沒，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清廷大軍大敗噶爾丹之軍，濟隆等七十多人即到清軍大營前請求勿予追擊，並甘言求和⁴³，清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竟為其甘言所騙，未趁勝追剿，使噶爾丹免於被殲滅，可見五世達賴（或第巴桑結嘉措，時五世達賴已死，桑結嘉措詭言達賴閉關，一切均以達賴名義施行，不過五世達賴前

⁴³ 詳見《康熙實錄》，康熙二十九年八月辛酉條，以彼此對話頗冗長，從略，可見《清實錄藏族史料》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一冊頁 89~91。

此曾公開宣稱桑結嘉措所作所為與達賴所為完全一樣）何其點慧，幾乎可說是算無遺策。

五、康熙

在我國歷史長河中，在位六十年之帝王寥寥無幾，康熙即為其中之一，清初自努爾哈赤以至乾隆，無一不是睿智天成，康熙尤為其中最，盱衡全局深知必須將大漠南北聯成一氣，青藏高原合為一體，而後將天山南北納入版圖，如是中國始稱完整，然而開疆拓土，不但需強大之武力，更需要有豐饒之經濟力為後盾，否則縱有強大之軍力，也必然是先盛後衰，康熙早知準噶爾部終將為患中國，但其實力尚無必勝把握，因此對準噶爾藉口入貢，實際是派出數千名「入貢使」，行貿易之實，清廷均予忍讓，其目的是希望有充裕的時間以厚植國力，終會使準噶爾俯首聽命，但對準噶爾部勾結俄羅斯一起向東侵掠，則決不予忍讓，不惜出動大軍摧毀俄軍所建之雅克薩城，且在戰勝之有利情況下，與沙俄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不惜將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三十二萬平方公里之地（為布里雅特蒙古聚居之地）割讓予俄羅斯，其目的在騰出兵力，以對付準噶爾之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

當準噶爾之噶爾丹率鐵騎東侵漠北喀爾喀時，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敵，人民牲畜死亡甚多，其時三汗及眾台吉曾集會研商，究竟應向北投靠沙俄、或向南投奔大清，兩議難以確定，乃向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徵詢意見，哲佛說：

「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異言異服，殊非久安之計，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⁴⁴

於是三汗及哲佛之眾乃向南逃入屬清上駟院（屬內務府所轄，原名阿敦衙門，康熙十六年改上駟院，為供應宮廷所需牛、馬、羊）之達里岡崖牧場⁴⁵，清廷非但未趁喀爾喀危難之時加以吞併，更徵調各處牛、羊、

⁴⁴ 見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七，引松筠《綏服紀略》詩註，蒙藏委員會 1987 年校訂本。

⁴⁵ 關於達里岡崖牧場詳情，可參見劉學鈔《外蒙古問題新論》，台北南天書局，2014 年，頁 14~16。

米、布、糖、茶等予以接濟，並承諾來年將御駕親征，將噶爾丹逐出漠北，讓喀爾喀之眾重返故土，此蓋康熙深知漠北地域廣袤、人口稀少，如不能得到喀爾喀蒙古人之誠心歸順，縱然此際予以併吞，未來對漠北也無法防守，因此要獲得漠北，就必須讓喀爾喀蒙人心悅誠服地歸順，此所以承諾，來年將親噶爾丹，奪回漠北，使之重返故土，康熙果真實踐諾言，於其二十九年（1690 年）御駕親征噶爾丹；自秦始皇以來朝歷代帝王親自披褂上陳者，僅有少許幾個，康熙便是其中之一，果真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乃得重返故土。次年（1691 年，康熙三十年），康熙刻意在靠近漠北之多倫諾爾舉行滿洲及蒙古八旗會盟比丁大會（類同閱兵），並邀喀爾喀三汗前來觀禮，其意固在耀武揚威，而三汗目睹大清武力壯盛，心想此次準噶爾雖被清軍逐出漠北，待整休之後，未必不會捲土重來，屆時仍是無力抵抗，於是在懷德畏威之情況下，莫諾歸順中國清朝，納入中國版圖，中國自會加維護，遂請求比照漠南各部蒙古之例編設盟旗，成為中國領土，但保留三汗，此種結果完全在康熙規劃之中，也從此始以大漠為界，在漠北者稱外蒙古，在漠南者稱內蒙古，明載于《大清會典·理藩則例》之中，而成為法律名詞，如《理藩則例》所載：

「大漠以南曰內蒙古，為部二十有四，為旗四十有九，……逾大漠曰外蒙古，為部四（按原僅三部，雍正時增置三音諾顏部，此部不稱汗，故稱為部四）附以二，為旗八十有六。」

從上述可知漠北外蒙古之納入中國版圖並未經戰爭，乃是外蒙古自動歸附，此一歷史事實，對外蒙古未走向當具參考價值，此雖題外，但頗具歷史意義，又從上述可知康熙具有高瞻遠矚之智慧。

康熙之於西藏，也呈現其睿智之一面，前文曾敘及五世達賴為攏略各部蒙古，常以虛空之名號賜予各部蒙古首領，使各部蒙古在形式上成為五世達賴之下屬或藩屬，此種以虛無之名號，換取蒙古各部之歸心的是高招，當康熙御駕親征，將噶爾丹逐出漠北後，五世達賴竟幻想故技重施，於康熙二十九年（1691 年）十一月，聯合青海和碩特等部台吉、乃至落敗之噶爾丹，聯名致書康熙，擬賜康熙以「尊號」，並附上貢賀禮物，康

熙是何等人物，豈是如此拙劣技倆所能哄騙得過，康熙自是予以拒絕，並發還貢禮賀物⁴⁶，可見其深知實至名歸之理，雖剿滅準噶爾，尚未將西藏納入版圖，誠如康熙上諭所稱「有何可賀而受尊號乎？」，論者或謂唐太宗李世民曾受四夷上「天可汗」之尊號，如就史論事，兩者完全不同，唐太宗係在剿滅東突厥（唐時以其在北，故稱北突厥）並擒獲東突厥可汗，一時四夷均懾於大唐聲威而俯首稱臣，故上「天可汗」之尊號，而康熙既未擒獲噶爾丹，而西藏五世達賴也並未向清朝稱臣，如接受達賴所上之「尊號」（其實就是一個名號而已），豈不成為被達賴所封賜，聰明如康熙豈會接受。

康熙也深知從內地入藏，道路險阻，行軍至為不易，不宜以武力強行入藏，只能以威懾方式，使其自動歸附，當噶爾丹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時，五世達賴可能已圓寂，只是第巴桑結嘉措隱瞞其死訊，詭稱達賴閉關，第巴假達賴之名發號施令，紙難以包住火，達賴死訊終於為清廷所偵知，乃不得不公開五世達賴之死訊，據夏格巴所著《藏區政治史》一書稱，第巴之所以隱瞞五世達賴之死訊，乃是「這些（指隱瞞死訊）都是從西藏的公共利益考慮而做的」⁴⁷，這純脆是鬼話，五世達賴死訊既已公開，就不得不進行尋訪其轉世靈童的工作，然而事實上早在數年前，第巴桑結嘉措已覓妥倉央嘉措為五世達賴之轉世靈童，也即六世達賴，此一達賴為第巴桑結嘉措所立，不知潛心修佛，但知散漫濫情，吟唱情歌，勾引婦女，遂引起仍在名義上統治西藏之和碩特蒙古固始汗後人、拉藏汗及青海各部蒙古之不滿，尤其拉藏汗對五世達賴或第巴桑結嘉措之剽竊政治權力，更為怨恨，由是拉藏汗與桑結嘉措形成兩股敵對團體，頗有勢不兩立情狀，之後桑結嘉措雖辭去第巴之職，但仍在幕後操控西藏政局，以五世達賴或桑結嘉措之教唆、維護噶爾丹，清廷自是支持拉藏汗，而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不端行為，有辱佛門，拉藏汗乃奏請清廷調倉央嘉措為假達賴，康熙對此事頗慎重，為避免有人利用倉央嘉措進行政治角逐，乃下令將倉央嘉措「執送京師」⁴⁸，據清《聖祖實錄》載：「拉藏送來假達賴喇嘛，

⁴⁶ 康熙之上諭頗為冗長，此處從略，詳情見《清實錄藏族史料》，第一冊，頁 94~95。

⁴⁷ 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上冊頁 262。

⁴⁸ 見《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頁 257，《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 185，也載有

行至西寧口外病故」，可見康熙以此種方式介入藏地政務，亦云高明，而且更高明的是命人將倉央嘉措「尸骸拋棄」，此舉係不使其信徒藉其遺蛻建塔紀念，另行掀起風波，此事在康熙四十五年（1707 年十二月，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 185），三百年後美國歐巴瑪政府獵殺賓拉登後，將其尸骸拋諸大海，其目的也是預防賓拉登信徒藉其遺蛻或墳墓作文章，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康熙較歐巴瑪早了三百多年。

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既被認係假達賴，且在執送北京途中病故，而其遺蛻也被拋棄，此際拉藏汗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為達賴，但青海蒙古眾台吉並不全然認同，彼此向朝廷互相攻訐，康熙乃命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眾台吉之使，同赴西藏看驗，拉都渾等一行分別向拉藏汗及第五世班禪羅桑耶歇（1663~1737 年）徵詢看法，均指稱波克塔胡必爾汗係真達賴，奏入朝廷，廷議云：

「拉藏所立達賴喇嘛，既問之班禪胡土克圖，確知真實，應無庸議，但達賴喇嘛例有封號，令波克塔胡必爾汗年幼，請再閱數年，始議給封。又，青海眾台吉與拉藏不睦，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藏獨理，應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

結果康熙批曰：

「依議。其管理西藏事務著侍郎赫壽去。」（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 186，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己亥條）

康熙運用西藏本土第巴與和碩特蒙古拉藏汗之不睦，以及新達賴真假之爭議，派赫壽入藏協同拉藏汗辦理西藏事務，未費一兵一卒，介入藏地政務，而赫壽之入藏，實為稍後設置駐藏辦事大臣之濫觴，若非康熙睿智天成，何克臻此？宜乎其廟號為「聖祖」。至於目前流亡在外之十四世達賴及其所謂「流亡政府」，一再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試問和碩特蒙古統治西藏之史實作何解？中國清朝派赫壽入藏協同拉藏汗辦理藏地政務又作何解釋？五世達賴親手所撰《西藏王臣記》指稱和碩特蒙古固始汗為全藏三區之主，又作何解釋？夏格巴、十四世達賴、西藏流亡政府甚至所謂國際法學家范普拉赫等，若非讀書不精，則為刻意

瞞騙世人，惡莫大焉。

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三月，清廷議政大臣等議論藏事，以拉藏汗及班禪呼圖克圖（《清實錄》多作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等，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以達賴喇嘛之封號，由是康熙乃如所請，給以印冊，封為六世達賴喇嘛（按前此倉央嘉措認假達賴，故波克塔胡必爾汗仍為六世），前此（三、四、五世達賴）諸世達賴之名號，僅是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賜給宗喀巴三傳弟子索南嘉措之名號，係屬私相授受，既與藏人無關，也與中國政府無關，至是，中國清朝正式封波克塔胡必爾汗為六世達賴喇嘛，並頒給印冊，從此「達賴喇嘛」名號成為中國政府所認定之名號，此後歷輩達賴都必須經過中國中央政府之認定，始稱合法，既使目前流亡印度之十四世達賴，也是經過中華民國政府正式認定冊封，這是史實，不容否定。康熙之冊封「達賴喇嘛」及頒給印冊，實開歷史之先河，也為「達賴喇嘛」必須經過中國中央政府之冊封，始具有其神聖地位，作出歷史定位，康熙實居首功。

這位波克塔胡必爾汗（胡必爾汗，按即呼畢勒罕之諧譯），經青海右翼貝勒戴青和碩齊、察漢丹津等向清廷理藩院稱不是真達賴轉世，里塘所尋到之呼畢勒罕始是真達賴轉世，這等於鬧了雙胞，朝廷遂命主事眾佛保到日喀則班禪處詢問新尋訪之呼畢勒罕真假，結果班禪告以里塘出生之呼畢勒罕為假靈童，可見康熙處理此事，相當尊重班禪之意見。康熙睿智天成，深知達賴在西藏、蒙古地區具有極大之影響力，亟思有以制衡，於其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正月諭理藩院曰：

「班禪胡土克圖，為人安靜，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予印冊，封為班禪額爾德尼。」⁴⁹

以此提升班禪地位，使之與達賴同其位階，至少在宗教上，兩者無分軒輊，其目的顯然意在不使達賴在蒙藏地區唯我獨尊，康熙不僅提高或抬班禪之地位，更設法尊崇喀爾喀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使其

⁴⁹ 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 189，按額爾德尼係蒙語，意為「珍寶」，見胡耐安《邊疆宗教》，蒙藏委員會，1961 年，頁 35。

地位與達賴同，藉此減少達賴對外蒙古之影響，同時於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封章嘉呼圖克圖為灌頂國師⁵⁰，且為內蒙古最大活佛，以政治力拉抬其地位，其目的也在企圖降低達賴對內蒙古之影響，按清初諸帝皆極具智慧，其行事風格往往不予明言，更不立文，全憑臣工會意，至是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及章嘉合稱黃教四聖，在宗教上其位階完全平等，如假以時日，達賴將不會是黃教中唯我獨尊者，惜乎自嘉慶以後諸帝，不能體會康熙、乾隆之用意，如乾隆鑒於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等活佛轉世，弊端叢生，「自前輩班禪額爾德尼示寂後，現在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之呼必勒罕及喀爾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皆以兄弟叔侄姻婭遞相傳襲，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親族，幾與封爵世職無異……」（見乾隆御制《喇嘛說》，引自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所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可見當時大活佛轉世已經被幾家豪族所把持，失去喇嘛教活佛轉世的神秘性，於是乾隆乃定下「金瓶掣籤」之法，杜絕前此所生之弊端，掣籤時由駐藏辦事大臣監臨（關於金瓶掣籤非本文主題，從略，如欲知詳情可參見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年；蔡志純、黃顥《活佛轉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等書），縱然只尋得一個靈童，也得將其姓名寫於籤牌，與一空白籤牌投入瓶中，經在佛前誦經後掣出，如掣出為空白之籤牌，則必須另行尋訪靈童，如此可以杜絕藏中豪門把持大活佛之轉世，可惜嘉慶時（1796~1820 年在位），八世達賴圓寂，藏中僅尋得一名靈童，奏請免於掣籤，嘉慶竟予批准，可見嘉慶已不能體會乾隆對活佛轉世之用心，開免予掣籤之先例，此後十三世達賴土登嘉措於光緒帝時頒旨免予掣籤，十四世達賴及十世班禪額爾德尼均經中華民國政府特准免予掣籤，設若嘉慶能體會其父乾隆頒布「金瓶掣籤」之深層用意，之後藏事之演變，可能是另一種面貌。

且再看另一事，初倉央嘉措被指為假達賴喇嘛時，康熙命人將此假達賴執送京師，當時諸皇子及諸大臣均認為一假達賴擒之何為（見《清實錄藏族史料》一冊，頁 183），但康熙有獨到之看法，因準噶爾部噶爾丹病困而死後，由其兄僧格之子策旺阿拉坦嗣立為準噶爾部首領，雖表面上對

⁵⁰ 見乾隆御制《喇嘛說》。

清廷表示恭順，且不時「進貢」（實係貪圖清廷之賞賜，同時藉進貢之名，行貿易之實），但一如噶爾丹，懷有極大野心，康熙心知肚明，但絕不宣之於口，對於要將假達賴倉央嘉措執送京師，雖諸皇子、眾大臣都認為何須多此一舉，此時康熙始將其心中看法說出，康熙稱：

「朕意以眾蒙古俱傾心皈向達賴喇嘛，此雖係假達賴喇嘛，而有達賴喇嘛之名，眾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擒，若為策妄阿喇坦迎去，則西域、蒙古皆向策妄阿喇布坦矣，故特遣席柱等前去。席柱等到其地，策妄阿喇布坦果令人來迎。以此觀之，若非遣人前往，則假達賴喇嘛必已歸策妄阿喇布坦矣。」（見《康熙實錄》四十五年四月乙巳條）

康熙之能高瞻遠矚洞燭機先，於焉可見，清朝自嘉慶之後諸帝其智皆不如康乾，清朝遂日益就衰。

六、結語

吳三桂、噶爾丹、五世達賴及康熙，都是同一世代的人物，對中國近代史具有很大影響，設若當時沒有按照既有的軌跡運作，則其可能的情况將會如何，實難以想像，其可能情况之一：吳三桂未死，更高倡華夏夷狄之辨的民族牌，激起中原漢人對滿人入關揚州十屠，文字獄、剃髮令等清初稗政，清朝或將無法抵擋，或許會如五世達賴所說被迫「裂土罷兵」，清朝僅保有部分華北及東北，是則中國分裂為東北及西南兩部分，而五世達賴除將繼續專制西藏地外，更遙控準噶爾部，影響大漠南北各部蒙古，清朝將成偏安之局，只是吳三桂自願降於滿族清朝，很難打出民族牌，而他深入緬甸追殺明帝室遺裔，也無法喊出反清復明口號，因此吳三桂之起事師出無名，復以康熙乃不世出之帝王，絕不可能「裂土罷兵」，兼以天不假年於吳三桂，當其中風病歿之後，其起事之軍遂一敗塗地，為清所殲滅。

噶爾丹原也屬草原上之一代梟雄，惜乎由於時代之演進，武器已從冷兵器進入熱兵器時代，光憑騎射鐵騎稱霸之時代，已一去不回，縱使成木真、帖木兒再世也已無能為力，噶爾丹對此似無認識，但渠也有相當智慧，深知擁有呼圖克圖名號，可以迷惑蒙古族人，而「博碩克圖汗」名

號，可以提高其在額魯特蒙古中之聲望，其父巴圖爾鴻台吉力量如許壯盛並未稱汗，僅稱「鴻台吉」（或作琿台吉為漢語皇太子之音譯），並未稱汗，噶爾丹顯然在五世達賴身上下過極大功夫（雖然五世達賴欲利用噶爾丹之東掠，將清軍引向北，但同樣訴求，也可施之於巴圖爾鴻台吉，但並未給予「汗」之名號，僅給予「額爾德尼巴圖爾」，其為：珍寶之勇士，是可以推測噶爾丹曾厚遺五世達賴或其親信形同「分身」之第巴桑結嘉措），可見其非平庸之輩，抑有甚者，噶爾丹可以不顧與蒙古族相近之惕列烏特人，以討好俄羅斯，且與沙俄勾結，同時向東侵掠，如拋却民族情感，純就戰略面而言，噶爾丹確有其高明之一面。但噶爾丹忽略戰爭乃是最大之銷耗，必得有豐沛之物資、人力、財力為後盾，天山北路固尚稱富饒，但如與中原內地比較，則天差地別，噶爾丹只是五世達賴手中之棋子或馬前卒，達賴並未給噶爾丹分毫支助，噶爾丹暴虎憑河，其不落敗殆不可能之事；再者噶爾丹低估了康熙之意志與中國之實力，而俄羅斯與中國簽訂《尼布楚條約》後，平白得到貝加爾湖以東至額爾古納河以西，三十餘萬平方公里之地，自然置「盟友」噶爾丹於不顧，此則為噶爾丹始料所不及，宜乎落得走投無路，最後病困而死。在本文所敘四人中之賽局中，吳三桂、噶爾丹無疑是輸家，而噶爾丹則是最大輸家，吳三桂好歹曾稱帝，是病死而非敗死。

至於五世達賴或其「分身」第巴桑結嘉措，在四人之博弈中，毫無疑問是最大贏家，達賴先從清平西王吳三桂茶馬貿易獲得巨款，而吳三桂必然對五世達賴有所餽贈，而且份量極重，若非如此，達賴豈肯遣使對康熙說「吳三桂力窮，乞免其死罪」萬一鴟張，莫若裂土罷兵。」這顯是受到吳三桂厚賄後所作之言語，所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五世達賴乃極富有之人，額魯特大活佛咱雅班智達呼圖克圖風塵僕僕不避辛勞為人做法事後收取供養，曾有人問咱雅班智達何需如此涉沙渡漠，咱雅班智達答以：

「一方面為傳布神聖的佛教；另一方面是收集禮品和捐獻，以便酬謝在我求學時期給予我巨大恩惠的（五世）達賴喇嘛金庫。」⁵¹

⁵¹ 見喇德納巴德喇托忒蒙文《蘭占巴咱雅班第達傳》成崇德譯註，輯入《清代蒙古高

可見五世達賴對財富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須知在西藏寺廟往往放高利貸，布達拉宮乃是最大之寺廟，當然也是最大之放高利貸者，指五世達賴接受吳三桂賄賂，實為合理之推測；或許有論者稱：達賴乃出家喇嘛慈悲為懷，乞求康熙在吳三桂力窮時，免其死罪，此看似有理，但是且看，當噶爾丹大軍東掠喀爾喀蒙古時奸淫殺戮無惡不作，致喀爾喀蒙古「死者相枕，臭聞數里」、「且人相食」，在噶爾丹軍中有五世達賴所派極高位階之濟隆呼圖克圖（為格魯派大人呼圖克圖之一，其地位僅次黃教四聖）等七十多人，此時喇嘛教之慈悲為懷到那裡去了？英國雅各所著《宗教比較學》曾指出：

「喇嘛教的特點，就是把持政權，有達賴喇嘛總管一切。」（譯者為韓汝霖，此書初由廣學會出版，1956 年由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再版，上引文字見頁 160）

對但知把持政權者（不論是政客或宗教神職人員）談慈悲，無異對牛彈情。

五世達賴未出一兵一卒、一分一毫錢財，只派出濟隆等大喇嘛到準噶爾噶爾丹軍中，除為出謀劃策之外，仍會接受準噶爾蒙人「供養」，絕非「無給職」的白打工，仍然收得滿坑滿鉢，把時間拉到當代來，自台灣開放、輔導流亡印度、尼泊爾地區活佛喇嘛來台後（事實上是十四世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禁止活佛喇嘛來台，但自 1997 年十四世達賴來台後，對該項禁令形同廢止）每年來台自稱活佛、仁波且及喇約有一千五百人次（其中有多次來台者），每個離台時至少獲得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之供養，每年以一千人計，每年從台灣信徒獲得十億以上「供養」，十四世達賴 1997 年首次來台，只是為信徒「摩頂」，就得到數千萬元「供養」，可見自達賴以至一般活佛、仁波且、喇嘛，對如何從信眾身上吸收「供養」，有極高明手法，五世達賴雖極富有，在既有文獻上，並未看其支援噶爾丹之記載，可見他既未出力，也未出錢，噶爾丹卻自願為其東掠漠北喀爾喀蒙古，將清朝大軍引向北方，延緩中國清朝向青藏經營的時程，譽其為神機

妙算，也屬允當。

在五世達賴盤算中，康熙縱然英明，但古往今來無不死之人，一旦康龍馭上賓，嗣位者未必賢如康熙，是則必無經營青藏之想法與能力，如是達賴不僅可以繼續在喇嘛王國專斷獨行，而蒙古各部且將成為其附庸或心靈上的殖民地，甚至大清皇帝也可能匍匐於其「法座」之下；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康熙不僅享壽超越古稀，較五世達賴更為長壽，更難得的是嗣位者雍正，乾隆（至少前三、四十年）均為賢明之君，而五世達賴更先康熙而死，其「分身」桑結嘉措隱隱其死訊長達十餘年，仍以達賴之名發號施令，事發後被藏巴汗處死。雖則達賴的夢幻未能完成，但毫無疑問在四人博弈中，是個大贏家。

至於康熙在國史長河中，絕對可算是傑出帝王之一，且在位長達六十年，三度御駕親征，更為秦皇漢武所不及，在與吳三桂、噶爾丹博弈中，都占上風，尤其噶爾丹勾結沙俄雙雙向東進掠，康熙權衡利害，決定以大軍摧毀俄羅斯所建雅克薩城，時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當清軍撤回後，俄軍又於次年重返雅克薩條築城堡，清廷得悉，再度命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軍攻打雅克薩，此次共出動官兵二千一百多人，經過一番激戰，將該城團團包圍，清軍切斷城內水源，由是圍城數月，城中缺水少柴、糧罄援絕，俄軍死傷不少兼以發生瘟疫，眼見即將被完全殲滅，此際沙俄遣使到北京「乞撤雅克薩之圍」，又有荷蘭使者從中斡旋，而康熙心中別計畫，康熙深知俄羅斯係一廣土眾民之大國，有長期作戰能力，如不趁勝與之和解，恐將陷入泥淖，而準噶爾之東掠喀爾喀蒙古，勢必影響漠南各部蒙古，且漠南與北京近在咫尺，必須將噶爾丹逐出漠北，使喀爾喀能重返漠北，對喀爾喀恩威並施，或能將漠北納入版圖，是則大漠南北聯成一氣，使之成為華北屏障，在此種思維下，兼之俄使到京乞和，遂於其二十五年（1687 年）九月二十八日令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撤回圍雅克薩城之兵，但仍列於城外江邊，通知城內俄軍可以自由出入，等候俄使之到來，同時清廷又派人入城為城內俄軍治病，更發給糧食以濟其困，康熙之對沙俄示好，自有其目的。

之後中俄展開和談，簽訂《尼布楚條約》，在談判之前，正是準噶爾大軍肆虐漠北喀爾喀蒙古之時，由於《尼布楚條約》已簽妥，俄羅斯獲得

額爾古納河以西至貝加爾湖以東之一大片土地，自是心滿意足，遂將其與噶爾丹之結盟置諸腦後，也因此清廷始能騰出兵力，御駕親征噶爾丹，將之逐出漠北，讓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眾得以重返故土駐牧，之後康熙於其三十一年（1692 年）在靠近漠北之多倫諾爾舉行滿洲八旗與漠南蒙古各部會盟比丁大會（類似今日之閱兵大典），邀喀爾喀三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各台吉前來觀禮，康熙此舉其意自在耀武揚威，喀爾喀三汗目睹中國清朝軍威壯盛，又深知噶爾丹在休養生息後，仍將捲土重來，屆時喀爾喀依然無法抵擋，同時深感中國清朝有恩於己，於是在懷德畏威情況下，要求歸附中國，比照漠南蒙古之例編設置旗（以原有之三部為三盟，雍正時增置三音諾顏一部，但此部不稱汗），惟要求保留原有之汗號，此項發展，原在康熙構劃之中，自是欣然允諾，漠北喀爾喀蒙古之納入中國版圖，並非由戰爭得來，乃是自動歸附，從此以大漠為界，而有內、外蒙古之稱謂。

初，噶爾丹東掠時，喀爾喀三汗曾有向北或向南投靠俄羅斯或中國清朝二選項，疑而未決，請示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哲佛以向南投奔中國清朝為妥，於是始逃往漠南之達里岡牧場，之後清朝在多倫諾爾與行會盟比丁時，喀爾喀三汗之決定歸附中國清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也發揮一言九鼎之作用，因此康熙對哲布尊丹巴（此為一世哲佛，係前土謝圖汗之子）特為尊崇寵優有加，上述作為固為原因之一，更重要原因則為康熙深感西藏五世達賴對漠北喀爾喀蒙古，具有極大之影響，對清朝而言，等同浸蝕其統治力，因此有意培植、拉抬出身外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地位與聲望使與達賴等同，以削弱達賴對外蒙之影響力，惜呼乾隆未能體會乃祖之用意，因一世哲佛圓寂後，轉世靈童為外蒙貴族所把持，遂規定嗣後哲佛轉世靈童必須在青藏地區尋訪，使康熙之用心付諸東流，清初諸帝行事風格既不明示，更不立文字，但憑嗣位者及臣工自行體會，因此有許多措施未能貫徹，甚或被扭曲，殊屬可惜，但是也從而體會康熙之智慧。

本文所敘四人，都是一時之才俊，吳三桂若對手不是康熙，或許真能使清廷裂土罷兵，成一方之霸，而噶爾丹也屬草原游牧民族之佼佼者，惜乎已進入熱兵器時代，而噶爾丹仍憑恃騎射，自是無法抵擋清軍之攻勢，

兼以其所控制地區人寡地瘠，而戰爭除沙場上衝鋒陷陣之戰士外，更重要的後勤補給，噶爾丹缺乏堅實之經濟力，再加以其發動東掠行動，是受到五世達賴之唆使，本身只是達賴手中的棋子，戰爭缺乏正當性，而其「盟友」俄羅斯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獲得好處後，對噶爾丹之求援置之不理，噶爾丹之落敗病困而死，乃是必然之結局。在上述四人中，毫無疑問五世達賴為大贏家，對其黠慧不能不加以贊歎，作為一個謀略家是極其傑出的，但作為一個宗教家則似乎缺少了悲天憫人的慈悲心。

五代時期回鶻

劉學鈺

前中原大學、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摘 要

回鶻原名回紇，唐時請求改稱回鶻，係泛丁零族之一支，丁零或作敕勒、鐵勒，以其俗乘高輪車，中原王朝遂名之為「高車」與匈奴、鮮卑、柔然、乃至漢人均有密切往來，尤其有唐一代，更與之多次和親，唐肅宗李亨時（西元 757~761 年在位），更以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可見其與中原關係之密切，因其篤崇摩尼教，以其有功於唐，乃准許摩尼教在中原建寺院傳弘其教法，唐文宗李昂末年（西元 828~840 年在位），回鶻汗國內訌，為黠戛斯所滅，回鶻部眾四處奔逃，入於唐境者，最終融入唐人之中，逃往甘州者，稱甘州回鶻，逃往西州者（古高昌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稱西州或高昌回紇，此部分再往南進遍佈天山以南諸綠洲，其中部分更進入今中亞地區建立喀拉罕汗國。唐朝自安史之亂後，也進入藩鎮割據狀態，於西元 907 年（唐哀帝李祝天祐四年）終於為朱溫所篡，建立梁政權（史稱後梁），從此中原進入五代十國之亂局，一般文獻遂鮮少提及回鶻，或雖有提及，但不為人所重視，本文擬據相關文獻，就五代時期回鶻（按此時已用回紇一詞）與五代各朝之關係，酌為敘述。

關鍵詞：丁零、敕勒（鐵勒）、高車、回紇（鶻）、五代

一、回紇與回紇汗國

回紇係泛敕勒系民族之一支，敕勒在我國古文獻上作丁零，敕勒系民

族分布地區極為廣袤，大致而言，西起裏海東側，東至貝加爾湖周邊，均有敕勒系各民族分布其間，我國古文獻作丁零（或作丁靈），西漢武帝劉徹（西元前 140~前 87 年在位）時派蘇武出使匈奴，因其副使張勝涉入匈奴內部權力鬥爭，事洩，蘇武遭坐連，遂將蘇武徙北海（今貝加爾湖）牧羝（公羊），並稱：「羝乳乃得歸」，蘇武既至北海，其羊為丁零所盜，此即《史記》、《漢書》所載「蘇武牧羊」故事，盜蘇武羊之丁零，即泛敕勒系各民族之統稱，此為丁零一詞首見於我國正史，以其出現在北海周邊，自是而後諸多史冊均認為丁零（泛敕勒系各民族）之族源於今貝加爾湖周邊，此種看法幾已成為定論。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按泛敕勒系民族，包涵許多支系，「敕勒」一詞（之前均作丁零）首見於《晉書》卷九七《北狄傳》稱西晉武帝司馬炎太康五年（西元 284 年）有北狄十九種部落自漠北遷入塞內（塞指長城），其中有「赤勤種」，此「赤勤」即「敕勒」，這是散牧於東方的丁零之族，事實上在貝加爾湖以西至裏海以東，也有丁零之族分布其間，如《三國志·魏志》卷三十注引《魏略·西戎傳》稱康居北有丁零，按三國時康居在烏孫之西，而烏孫與月氏（應讀為肉支）始居祁連、敦煌間（見《史記·匈奴傳》，經考證祁連、敦煌，應在今地區西，應在今天山東麓），匈奴冒頓單于（冒頓應墨毒）時將之擊破，乃西徙今新疆西部伊犁河流域（含今哈薩克東部），烏孫之西有丁零，可見丁零系民族分布之廣，裏海東側確實有丁零之族分布其間，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中國各族所接觸之丁零為東丁零，在烏孫以西康居以北之丁零為西丁零，回紇乃是東丁零之一支系。

東丁零系各民族分布範圍極廣，根據漢文文獻，「丁零」一詞古音讀若「顛連」（見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五，詩《丁零》二首註，此處係轉引自周偉洲《敕勒與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頁 9），是則與狄歷、敕勒（鐵勒）等均為一音之諧譯，至於「高車」，乃因其俗乘高輪車，北朝已漢化之鮮卑人稱之為高車，據《史記·匈奴傳》載，匈奴冒頓單于時曾「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可見丁零與匈奴同一時代，其為源遠流長之民族，實毋庸置疑。據漢文相關文獻所載，在我國春秋時代（一般指周平王姬宜臼東遷之西元前 770 年至孔子著

《春秋》之西元前 475 年，是為春秋時代），今河北、山西、陝西北部一帶已見有赤狄活動的記載，丁零的前身為狄（狄有赤狄、白狄、長狄之稱，但其為狄則一也，正如苗族有白苗、青苗、花苗之稱，但其為苗則一也），而狄的前身極可能為殷商時代的鬼方，如是則回鶻民族與華夏民族，同是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

由於敕勒系各民族其生存空間主要特徵為草原、沙漠，不宜農耕，受自然條件制約，形成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大致上從我國大興安嶺以西、至裏海以東，長城以北以至西北利亞南部，在此廣袤地域中¹，大致均為草原沙漠，除極少數河流（多為內陸河）沿岸有少許農業外，生息其間之諸多民族如匈奴、鮮卑、柔然、敕勒、塞種……等，受自然條件之制約，均以游牧為生，游牧民族機動性大、活動空間廣，由於在上述廣袤地域中，空間雖大，但地形、地貌則頗單調，因此民族雖多，但其生活形式差異不大，彼此對民族意識並不十分強烈，只要某一民族出現一英明驍勇領袖，則諸游牧民族都如影隨形扈從之，如匈奴冒頓單于崛起後，諸引弓之族皆號匈奴，因此北亞諸游牧民族彼此混融情況相當普遍，此乃自然形勢使然，回鶻民族在數千年發展中，吸納四周各民族血緣、文化習俗乃至語言，也是無可避免的結果，探討回鶻史事，應有此項認知，故舉一例為證、西漢以王嬙為昭君公主嫁南匈奴呼韓邪單于，生下一子，呼韓邪薨，由其另子立為新單于，依北亞草原游牧民族蒸報婚習俗²，新單于仍以王昭君為閼氏（讀若胭脂，單于妻稱閼氏），又生二女，匈奴語稱女孩子為「居次」（此係漢字音譯匈奴語，與今日讀音或有些許出入），此二女分別嫁匈奴貴族須卜氏、高官當于，《漢書》稱之為「須卜居次」、「當于居次」，向者多以此二詞為王昭君二女之名，實際乃是其一為「須卜夫人」，另一為「當于夫人」，至今維吾爾族（係回鶻族後裔）語稱女子漢字音譯仍近「居次」（Kez），可見回鶻語受匈奴之影響，但卻不能以此認定回鶻源於匈奴。

¹ 上述地域即一般所指的北亞，或稱中亞，詳情請參見 L. I. 米羅什尼科夫《中亞一詞的含義》一文，該文輯入《中亞文明史》第一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芮傳明譯，2002 年，頁 366~368。

² 蒸報婚為人類婚姻形成之一種。

就既有文獻看，「回紇」一詞最早出現在《新唐書、回鶻傳》作：

「回紇……元魏時亦號高車，或曰敕勒，訛為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袁紇者，亦曰烏護，曰烏紇，至隋曰韋紇，……大業（大業係隋煬帝楊廣年號，共十四年，605~618年）中，（突厥）處羅可汗攻脅鐵勒（諸）部，哀責其財（哀，音培，意為剷除），既又恐其怨，則集（其）渠豪數百悉坑（殺）之，韋紇乃并（與）僕骨、同羅、拔野古（皆）叛去，自為俟斤（係官號），稱回紇。」

可見袁紇、韋紇、回紇，均一音之諧譯，至於又稱「回鶻」者，以唐德宗李適（780~805 年在位）貞元四年（788 年）十月，回紇首領合骨咄祿可汗（780~789 年在位）上表唐廷請改回紇為回鶻（音胡），取其「回旋輕捷如鶻」之意（鶻音胡或古，鶻即隼或鷲鳥，屬巨禽，能俯擊鳩鴿而食之），唐代以後，仍多以回紇稱之，元時則稱畏兀，實也回紇一音之諧譯。

在我國長城以北，最早建立國家而威震大漠南北，乃至西域者，非匈奴莫屬，之後鮮卑、柔然、突厥相繼而起，主宰大漠南北，建立汗國（可汗一詞即係柔然所創取代匈奴之單于），在匈奴、鮮卑、柔然、突厥主掌大漠南北時代，回紇先後皆役屬之，此乃北亞草原必然之政治生態。回紇一族由下列九個氏族建構而成：

1. 葇羅葛
2. 胡咄葛
3. 咄羅勿
4. 貊歌息訖
5. 阿勿滴
6. 葛薩
7. 斛嗢素
8. 葇勿葛
9. 奚耶勿

在上列九個氏族之中，以葇羅葛氏最為尊貴，為回紇族之核心，當回紇脫離突厥自立時，其可汗多出自葇羅葛氏。

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初（貞觀共二十三年，627~649 年）回紇首領菩薩以五千騎擊潰東突厥頡利可汗十萬騎，並虜獲東突厥大批人眾，於是聲勢大壯，唐太宗貞觀二年同屬敕勒系之薛延陀建立政權，立牙帳於鬱督軍山（或作于都斤山，今外蒙古抗愛山），此際回紇依附於薛延陀，但回紇領袖菩薩也自號頡利發（係官號），建牙於獨洛水濱（或作獨樂河，當今外蒙古土拉河，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 年，第五冊，頁 75）。貞觀三年（629 年）回紇遣使朝於唐廷，時東突厥已敗亡，漠北惟回紇、薛延陀為最壯盛。

至於回紇或以今日維吾爾一詞之原意為何？就漢文史料而言，並未見對回紇一詞有何解說，但波斯、阿拉伯文書中，對回紇或維吾爾（Uyghur）則有所解釋，約有以下兩種解釋：

1.Uyghur 一詞其意為「聯合、協助」之意

持此說者以突厥系民族始祖烏古斯汗信奉唯一的上帝、其親族有不信奉唯一上帝者，則率所屬征服之，終於戰勝不服從者，由是烏古斯召開大宴會，勞慰其親族、部落酋長、戰士，遂給各部落以「聯合」（Uyghur）之稱號，「Uyghur」一詞在敕勒系語中有「聯合、協助」之意³。此一詞意不僅運用到敕勒系各部落、各民族。

2.Uhghur 一詞有皈依之意

烏古斯既將 Uyghur 之稱號給予其所統率之各部落，而此稱號在突厥語中有「皈依」之意。依照阿布哈齊於《突厥種族系譜》首章所載：「人們常說：牛奶是凝結的，但如牛奶仍是牛奶時，各部分是彼此分離渙散的，可是一經凝結為乳酪時，則彼此堅固地黏結在一起。人們也說我（烏古斯）以教主『依瑪木』（Imam）為準則，換言之，如他坐下，我們都坐下，如他站立，我們都站立，這豈不是一種『皈依』嗎？當他們走過來用雙手緊緊抓著烏古斯可汗的衣邊以表示他們依依膝下的意思時，可汗便稱呼他們為 Uyghur。」（以上大致引自馮家昇、穆廣文、程溯洛編著《維吾爾族史料簡編》，北京民族出版社，上冊，頁 4）。

³ 此一說法拉施特《史集》第一章，係余大鈞、周建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年版，另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現改大學）所藏楊丙長譯拉得洛夫（W. Radloff）《福樂智慧》導言中也引有此說。

以上兩項對 Uyghur 一詞的解說，均為十三、四世紀時出現於波斯、阿拉伯文獻中，按其時無論波斯或阿拉伯均已全面伊斯蘭化，於是一切都附麗於伊斯蘭教，此種情形與蒙古於全面喇嘛教化之後，竟將蒙古民族源起附麗於吐蕃（即今之西藏，詳見《蒙古源流》，近代史學家陳寅恪對此曾有評論，詳見陳著《彰所知論》），因此以上兩項對 Uyghur 一詞之解釋，未必就是的論。

唐朝對薛延陀之稱雄漠北，頗為介意，聯絡回紇以制衡薛延陀，進行挑撥離間，始終是中原王朝對付四周邊疆民族諸政權策略之一，換言之，也就是歷代王朝「治邊政策」之一⁴，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年）薛延陀內亂，唐朝出兵攻薛延陀，回紇配合唐軍襲擊薛延陀，卒滅薛延陀，回紇首領吐迷度自稱可汗，此為回紇汗國之始。中原王朝之所以能以離間方式，挑撥北方游牧政權，且往往得逞，游牧政權本身存在有「被挑撥」的因素，前文曾提到北亞草原地域廣袤，但地形、地貌差異不大，生息其間之游牧民族雖多，但民族意識並不強烈，但凡有英明驍勇之領袖出現，不同民族立即聚集景從，形成民族聯盟式之帝國（或政權），但統治集團往往苛虐對待被統治之各民族或部落，自匈奴以來，若柔然、敕勒、鮮卑、突厥、薛延陀莫不如此，因此統治者（統治民族）與被統治者（被統治民族或部落）之間，存有對立、矛盾情形，遂給予中原王朝以可乘之機，稍加挑撥即可離間，回紇之與薛延陀即是如此。

回紇自吐迷度自稱可汗後，日漸壯盛，統有大漠南北（一般文獻均稱統有蒙古草原，按蒙古乃幾個世紀後，始出現之詞彙，用以指回紇汗國統有蒙古草原，不甚妥適）。

回紇汗國成立後，繼續壯大，且與唐朝維持良好關係，回紇汗國疆域大致上繼承東突厥之規模及其附屬部落，可能由於回紇汗國統治集團之部族，未若之前游牧政權統治集團對被統治部族之苛虐剝削，因此，回紇汗國能維持較長時間之穩定（自646年至840年），並日趨壯盛且曾數度與唐和親，此點對回紇汗國維持其在北亞草原的威望，有密切關。按北方游

⁴ 關於歷代治邊政策，可參見胡耐安《邊政通論》，該書係胡師自行出版，作為政治大學邊政系必修課教材，之後交由台灣商務印書館重行出版，另劉學鈞撰有《論清代邊政之得失》一文，初刊載於《中國邊政》季刊後，輯入劉著《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年，頁5~89。

牧政權自匈奴以始（更早因文獻未載，難知其詳），每喜與中原王朝和親，以此向周遭游牧部眾誇耀其與中原王朝有姻婭關係，用以增加其在草原上之威望，回紇汗國也承襲此一傳統，而且回紇汗國與唐朝之和親，是雙向之和親（也即非僅為中原王朝以良家子或宗室女賜以公主名號，嫁草原游牧政權單于或可汗），這在我國和親史上較為少見（北朝時曾娶柔然、突厥可汗之女）。

按唐朝於玄宗李隆基天寶十四載（755 年），有安史之亂，叛軍奪唐兩京，玄宗避禍入蜀，太子李亨於天寶十五載（756 年）在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附近）自立，史稱肅宗，深知憑既有之兵力，無法平定安史之亂，必須「假番兵以張形勢」⁵，於是派僕固懷恩、將軍石定番及燉煌王李承寀出使回紇汗國，要求和親，「以修好徵兵」⁶，其時回紇懷仁可汗（此號係唐朝所封，其回紇語汗號，音譯為：骨咄祿·闕·毗伽可汗，其名音譯為骨力裴羅）也有與唐和親並出兵助唐收復安史之亂意願，以是以其女嫁燉煌王李承寀，唐肅宗乃封懷仁可汗之女為毗伽公主，由是懷仁可汗親自率兵會同唐將郭子儀共擊安史之軍，卒助唐收復兩京（長安、洛陽），當回紇軍進入兩京之時，趁勢大事劫掠，金帛子女無不掠奪，唐廷對之無可奈何。但如無回紇軍之助力，唐兩京不可能收復，但從此也可想見被回紇軍擄去之唐人子女（此處稱唐人者，乃指魏晉時之「漢人」，經諸胡列國時代各族融合後之「新漢人」其內涵較之魏晉之「漢人」，已經複雜許多），久之即成為回紇人，可見回紇人中含有中原民族之血胤。

回紇汗國與唐朝綿密來往、多次和親，接受唐朝所贈大量中原禮物（如布帛衣服、日用品），其文明不免受到中原影響，如史載：

「初，回鶻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歷，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築宮

⁵ 見《唐書》《僕固懷恩傳》，按自清乾隆以來，皆以劉昫所領銜之《唐書》為《舊唐書》，按劉昫等係五代後晉時人，不可能得知後代宋朝時歐陽修另撰《新唐書》，而自署其所撰為《舊唐書》，因此《舊唐書》一詞乃對撰著者之不尊重，似不宜沿用，充其量只能作舊《唐書》。

⁶ 見舊《唐書·回紇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標點本，頁 5198，所謂「以修好徵兵」，意即向回紇汗國借兵。

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綉之飾，……」⁷

可見回紇深受中原文明之影響，但吾人應知兩個不民族文明，必然是互相吸納，回紇固然深受唐文明之影響，但唐人也受到回紇文明之影響，如唐詩人元慎（注意，此人係北魏拓跋燾之十一代孫，係鮮卑族裔）之《法曲》中稱：

「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羶落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
妓進胡音務胡樂。火風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聲胡
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竟紛泊。」⁸

此外，花蕊夫人之《宮詞》更明指稱：

「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
就中偏稱小腰身（回紇女子服飾剪裁合身會使人顯得婀娜多
姿）」（見《全唐詩》）

可見中原仕女服飾也深受回紇影響。

二、回紇汗國之覆滅

回紇汗國其政治制度，採可汗制，可汗為一國之君，與中原王朝皇帝一樣都認為其君權來自神受，至高無上，以是歷代回紇可汗之稱號前，均加上「騰里邏」、「愛騰里邏」與「毗伽」等修飾詞，其意為「自天所立」、「偉大神聖」⁹。其妻稱可敦，或作可賀敦，其地位僅次於可汗，可敦領有帳落，自有屬官隨從，也有發號施令之權力，如前引《資治通鑑》稱「築宮殿以居婦人」，所以有所謂可敦城（契丹遼朝覆滅後，有遼宗室耶律大石，曾率少許部眾至漠北可敦城，可證回紇汗國確有可敦城）。在可汗、可敦之下，有以下官職：

葉護：此官突厥汗國已設有此官¹⁰，其地位僅次於可汗、可敦，此

⁷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二六唐德宗建中元年夏六月條，台灣世界書局 1971 年，頁 7282，按此書係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在台翻印。

⁸ 《全唐詩》第十二冊，頁 4616~4617，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版，上引為《法曲》末八句，全詩共有二十四句。

⁹ 見楊聖敏《回紇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06。

¹⁰ 關於突厥官制，可參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92

官位雖源起於突厥汗國，但與之有所不同，在回紇汗國葉護僅屬官爵稱謂，而非實職，如唐燉煌王李承寀以娶回紇可汗之女為王妃，回汗可汗即封之為葉護，可見其僅為名銜而已。

設：此官名也係承襲自突厥汗國，分左、右設，為實職，掌兵權，多由可汗之子弟擔任，「設」有時在漢文史料作「殺」，實皆一音之諧譯，如唐代宗李豫寶應元年（762 年）回紇出兵助唐討伐叛將史朝義，即派「左殺」會同僕固懷恩為先驅；「設」，地位雖高，但一般駐地離汗廷較遠。

都督：此一官稱顯然襲自中原王朝，唐朝攻滅東突厥汗國後（唐稱之為北突厥，以其在唐之北境也），設燕然都護府，時曾任命回紇首領為瀚海府都督，回紇汗國建立後，在汗國本部內，每一大部落置一都督，共有十一個都督，都督等同一個部落首長，之後由於汗國疆域擴大，統治的民族部落增多，都督數量也隨之擴充。

宰相：宰相一官，顯然襲用唐朝官制，回紇汗國有內宰相三、外宰相六，內宰相似乎僅限回紇貴族出任，如葇邏葛氏與葛薩氏；宰相平時在汗庭內任職，如可汗、可敦繼位儀氏，即由內、外九位宰相主持。宰相也可奉命率軍出征，如西元 765 年（唐代宗李豫永泰二年），回紇在涇陽城（涇陽或作涇陽，即今陝西省咸陽東北之涇陽）與唐郭子儀結盟，回紇汗國參與盟誓者，即有五位宰相¹¹，宰相也可典兵在外，如 839 年（唐文宗李昂開成四年），回紇宰相掘羅勿，即典兵在外，勾引沙陀兵共攻回紇可汗，在回紇汗國後期，也有西域（今中亞）昭武九姓胡出任宰相者¹²。

將軍：此一官號也係襲自中原王朝，唐滅東突厥汗國設置燕然都護府時，回紇酋長吐迷度及其子婆閏曾先後封之為懷化大將軍、左驍衛大將軍，由是回紇襲用「將軍」官稱，但在回紇汗國「將軍」僅為官銜而非實職，如宰相護都毗伽將軍，宰相為實職，將軍僅官銜。

達干：此一官稱源自突厥，但突厥之有此一官稱，又極可能源自漢語

年，頁 120~123。

¹¹ 關於郭子儀與回紇盟誓詳情，見《資治通鑑》頁 7180~7182。

¹² 有關西域（今中亞）昭武九姓胡詳情，可參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

「達官」一詞，其地位頗高，與大將軍相當，或高於大將軍，但仍係官銜而非實職，如合、骨咄祿·毗伽可汗（唐封之為武義成功可汗，780~789年在位，後又加封為長壽天親可汗）在嗣位為可汗之前，為宰相達干，達干在戰時可兼掌軍事，而平時常任之為「外交」使臣，如唐肅宗李亨乾元三年（760年，同年改元上元元年）回紇「使大臣俱陸莫達干等人朝奉表起居」¹³，另據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語大辭典》則指達干為「伯克」的一種官職名。

梅祿：此詞原為「命令」之意，引申為「傳令官」，梅祿一般供職於可汗身邊，以便傳達命令。

司馬：此官稱也係襲自中原王朝，屬官銜非實職，其位階不高，因此較少出現於一般文獻中。

特勤：此詞原意為「奴隸」，其後演變成可汗子弟之專稱，其位階與設（或殺）相當，不過「設」為典兵實職，而特勤僅為官爵。特勤既為可汗子弟之尊稱，就有機會繼承可汗之位。若干文獻常誤書為特勒。

監使：即突厥汗國時之「吐屯」，監使為回紇汗國可汗派駐屬部之代表與統治者，此職主要由可汗家族或回紇貴族出任，回紇汗國對大部分屬部（國）都派有監使，代表可汗監臨之，頗具威權，回紇汗國時，東北之奚、契丹均羈屬之，回紇均派有監使以監臨之，及回紇汗國滅亡後（840年），奚、契丹二部「盡殺回鶻監使八百餘人」¹⁴。

啜：此職職由汗族子弟充任，啜以為統兵之官職，史傳中凡有啜出現之記載，多與其領兵作戰有關，如西元842年（唐武宗李炎會昌二年），回紇「有特勒（按係特勤之誤，特勤係官爵）荷勿啜東討契丹，戰死。」¹⁵

俟斤、俟利發：「俟斤」係突厥語「集中、集水」之意，葛邏祿部酋自稱俟斤，其意為「智慧如湖泊一樣的人」¹⁶，俟斤為初階官員，一般由部落首領擔任，如突厥汗國時期，回紇、僕固、渾等部落，其酋階稱俟

¹³ 見舊《唐書·回紇傳》

¹⁴ 《資治通鑑》繫此事於唐武宗李炎會昌二年（842年），見該書中華書局標點本頁7967。

¹⁵ 見舊《唐書·回紇傳》

¹⁶ 見《突厥語大辭典》首卷，維文版，頁146，但此處轉引自楊聖敏《回紇史》頁79，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斤。回紇壯盛後，又自稱俟利發，似較俟斤提升一級，之後又稱「活俟利發」，即大俟利發，再後則稱都督，回紇汗國建立後，對其所屬部落首領也授予俟斤稱號。

以上有關回紇汗國官制，大多參考楊聖敏《回紇史》、林幹《突厥與回紇史》、馮文、吳平凡編《回鶻史編年》等專著理合予以說明。

回紇汗國統治大漠南北百餘年，其助唐平定安史之亂後，崇信摩尼教，摩尼教傳教師幾全為西域（今中亞）昭武九姓胡人，按回紇汗國牟羽可汗（唐封之為頡、咄登里、骨啜密施、合、俱祿、英義建功、毗伽可汗，759~780 年在位，其妻為僕固懷恩之女），應唐之請率軍助唐敕平安史之亂、收復兩京後，於唐代宗李豫寶應二年（763 年）從洛陽帶走四位摩尼教法師返回漠北鄂爾渾河流域回紇汗庭，隨即召開回紇氏族大會（北方草原游牧政權凡遇重大問題或汗位繼承問題時，皆以召開氏族大會討論，後世蒙古之「庫利爾台大會」也屬此種草原游牧政權之傳統習俗），討論崇奉摩尼教問題，經討論後，決定以摩尼教為回紇汗國國教，從此昭武九姓胡大量湧入回紇汗國，如所周知，昭武九姓胡既善經商，也長於交涉，常為回紇可汗出謀劃策，九姓胡在回紇汗國逐漸占據頗高政治地位，不過十多年後，西元 779 年（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汗國內部發生軍事政變，有莫賀頓者（係宰相）起兵反對以摩尼教為國教，不僅殺害牟羽可汗，自立為可汗（此人係牟羽可汗從父兄，自立後稱合、骨啜祿、毗伽可汗，唐封之為武義成功可汗，後又加號為長壽天親可汗，780~789 年在位），更「屠其支黨及九姓胡幾千人」，以致「九姓胡聞其族為新可汗所誅，多道亡。」（見《資治通鑑》），摩尼教在回紇汗國境內一度銷聲匿跡，惟不久在九世紀初（唐憲宗李純元和元年，806 年），摩尼教再度大盛於回紇汗國，昭武九姓胡也再度在回紇汗國政壇位據要津，且有出任宰相者，可見回紇族原有血緣為主的政治結構，已遭到破壞，為社會不穩定埋下動亂的因素。

西元八世紀中葉之後，回紇汗國與吐蕃帝國展開數十年爭戰，如所周知，戰爭乃是國力最大的消耗，及至九世年代，雙方均已元氣大傷，兼以回紇內部早已埋下動盪因子，而回紇汗國統治階層又發生內訌，汗國之衰敗已是勢不可免。據《資治通鑑》《唐紀》四十二頁 7282 載：回紇可汗

登里（即牟羽可汗）欲舉國侵唐，其相莫邵頓達干力諫不可，不之聽，而國人也不欲南侵，莫賀頓達干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乃舉兵擊殺牟羽可汗，并昭武九姓胡二千人，遂自立為可汗，唐廷命京兆少尹臨漳人源休冊莫賀頓為武義成功可汗；莫賀頓自立為可汗後，又與牟羽可汗之子及國相、梅祿各擁兵數千相攻，自此之後回紇汗國內部經常自相漁肉，而且內訌愈演愈烈，在內訌中，僕固氏、躍跌氏與葛薩氏地位不斷提升，而汗族葇邏葛氏勢力則日見削弱，在唐朝操作下，僕固氏女子自牟羽可汗始，歷天親（即莫賀頓）、忠貞（係莫賀頓子多邏斯，號愛登黑邏、汨、沒密施可汗，唐廷冊之為忠貞可汗，789~790 年在位），奉誠（忠貞可汗子，名阿啜）三代可汗相繼為可敦（或作可賀頓，依可汗之妻，為汗國第二號人物），而可敦之父又出任回紇汗國之葉護，而僕固氏與唐朝有特殊關係（唐廷認僕固氏女為養女，僕固懷恩又曾為唐副元帥），回紇汗國之內訌，唐朝從中操作顯而易見，中原王朝對於「以夷制夷」固優為之；及至 790 年（唐德宗李適貞元六年），僕固氏少可敦葉公主（唐廷認僕固氏女為養女，故稱公主）竟然毒死可汗而立可汗之弟，此後之奉誠可汗年僅十五歲，已然成為傀儡，稱掌兵之大相為父，並自謂「仰食于父也」（見《新唐書·回鶻傳》）；及至 795 年（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一位「典兵馬用事」之躍跌氏（骨咄祿）奪取汗位，自稱「滕里邏、羽錄、沒密施、合祿、毗伽可汗」，唐廷冊封之為懷信可汗（795~805 年在位），從此回紇汗國葇邏葛氏汗統斷絕，及至 821 年（唐穆宗李恒長慶元年）回紇汗國可汗之位又為葛薩氏所奪取，統治回紇汗國二個世紀之葇邏葛氏族之失勢，遂啟更多姓貴族覬覦汗位之野心，遂紛紛擁兵自雄，更各勾引外援，舉凡唐朝邊將、沙陀、黠戛斯（即後世之吉爾吉斯）都成為回紇各氏族勾結之對象，832 年（唐文宗李昂大和六年）之後，汗位之爭奪更趨激烈，八年之間更換三位可汗，其政權之不穩定，可想而知。

西元 839 年（唐文宗開成四年），漠北草原「連年飢疫」，羊馬死者遍地，又逢大雪為災，據《唐會要》卷九八，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卷二稱：「流亡遍于沙漠，縵仆被于草莽」，其慘狀可想而知，而人禍總是因天災而興，內訌更加邀烈，其可汗為愛登里邏、汨、沒密施、句祿、毗伽彰信可汗（832~839 年在位）被迫自殺，其「國人立盧駮特勒為可汗（特

勒為特勤之誤），……回鶻遂衰。」（見《資治通鑑》頁 7942）。

盧駁（盧，音克；駁，音殺）既立為可汗，次年（840 年，唐文宗開成五年），其北方將軍句祿莫賀招引原已虎視眈眈之黠戛斯，合兵十萬騎南下攻回紇汗庭，按黠戛斯漢時為堅昆（或作鬲昆），唐初為結骨，後改稱黠戛斯，唐肅宗李亨乾元中（乾元共三年 758~759 年）為回紇所破，此際其君長為阿熱，建牙於青山，去回紇汗庭駱駝行需四十日（見《資治通鑑》頁 7947），見回紇既衰，阿熱乃自稱可汗，回紇北方將軍句祿莫賀即勾引黠戛斯聯兵十萬騎南攻回紇汗庭，大破盧駁之眾，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所載：

「回鶻別將句祿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駁……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駁職、特勒（應為特勤之誤）龐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啞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勤之誤）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指天德軍，其治所在大同川西，約當今內蒙古自治區巴彥諾爾市五原縣境）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且求內附。冬十月（指 840 年）丙辰，天德軍使溫彝德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指朔方西受降城）互六十里，不見其後，邊人以回鶻猥至（猥，音畏，眾多之意），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按單于都護府有雲迦關，而單于都護府當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見《資治通鑑》頁 7947）

至於以上所述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擊敗部眾崩潰，分三支而逃離漠北，逃離後之情況，對南下天德軍之一支，雖略有敘述，但也不甚詳，對奔吐蕃及奔安西之兩支，則未見交待，尤其當時唐朝表面上看，雖仍像龐然大國，但實際上自安史之亂後，唐朝已陷入鎮割據狀態，地方力量日漸膨脹，而中央則日漸衰微，九世紀中葉情況更是如此，南遷回紇之眾實際分為兩小支，分別沿參天可汗道南下（應係唐太宗李世民攻滅東突厥汗國後，四裔君長對李世民上「天可汗」尊號，以參拜天可汗之道路為參天可汗道），其中主要的一支為「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烏希特勤為主，另一支由大特勤啞沒斯等人所率領，此兩小支南下的回紇逃亡隊伍，雖同屬向

南逃命，卻是互相對立，其南逃目的也不相同。

由啞沒設與那頡啜所率領之一支回紇人，進入漠南後，即歸附唐朝（這一支顯然逐漸融入唐人之中）；而由烏希特勤所率領之一支，其中含原回紇汗國宰相五人、特勤十一人、將軍八人，另有可汗姊、公主、大都督、啜、尚書等「名王貴臣」，其南逃目的在於恢復故國，於是在南逃途中，便擁立烏希特勤為烏介可汗，至少在各部回紇中有了新可汗，據《唐會要》卷九八《回鶻》所載：

「（唐）武宗（李炎）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喪（于回紇），始知易代，其汗為黠戛斯所害，其國分散，有烏介特勒者（特勒為特勤之誤，而烏介乃汗號，其名為烏希），曷薩之弟，胡特勒（勤）之叔也，亦率眾南奔，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居塞上。朝廷遣鴻臚卿（係掌管四周邊疆少數民族事務之官）張賈、右金吾將軍王會往宣諭，分邊備以振食之……且冊為可汗，……而可汗違恩背德，侵劫諸部，旋又擅入雲州（今山西大同一帶），將入振武，上以天亡數盡，不可容也。乃命河東等遣兵討之。」

烏介可汗於 841 年立，其時尚自稱擁眾十萬，初向唐借兵助其復國，唐不許，遂剽掠羌、渾諸部，更欲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其時唐也無力將之剿滅，僅以兵備之，至 846 年（唐武宗會昌六年），烏介可汗為部下所殺（楊聖敏《回紇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版，作會昌七年，按會昌僅有六年），次年南奔回紇政治組織徹底覆亡，南奔的回紇人不免與唐朝之人互相融合，成為新唐人；至於南來的回紇人究竟有多少？據史傳載：啞沒斯所率南來降附唐朝者有「騎士二千五百人」，如連同老少婦人，大約有萬餘人；那頡啜所統者有「七千帳」，一般都以每帳（或作落）五人計，則有三萬五千多人；以上兩計約五萬人；843 年，烏介所部因寇掠唐邊郡，被唐軍「斬首萬級，生擒五千」潰兵多詣幽州降，「前後三萬餘人」，此後遏捻可汗收集亡散得五千多人，烏介所率南來者，約五萬餘人¹⁷，換言之，九世紀中葉，自漠北南來的回紇人，有將近十萬

¹⁷ 以上統計數字見楊聖敏《回紇史》，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52。

人，進入唐朝沿邊各郡，在今天看來，十萬人僅是小數目，但在一千多年前，十萬人不是小數目，據相關資料顯示，唐文字李昂開成四年（839年），全唐境約有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戶¹⁸，每戶以五口計，則其時全國約二千五百萬人，而中國人口分布，自晉室東渡之後，江淮以南人口三居其二，換言華北人口不過一千萬左右，而華北人口又以冀魯豫三居其二，如是晉陝甘不過三百萬人上下，沿邊各郡則更少，從此一角度看，十萬人就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換言之，在當時沿邊各郡，有不少回紇族血胤融入唐人之中，此一現象頗值注意，中國漢人內涵之多元性，於焉又得一確證。

至於西遷之兩支，在回紇汗國壯盛之時，今準噶爾盆地、焉耆、龜茲乃至葱嶺以西至熱海一帶，都在回紇汗國掌控之下，散布在上述地區之葛邏祿、樣磨、處月等都屬泛敕勒民族，而更較早進入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沿各綠洲的吐火羅人（也可稱之為泛塞種民族，昭武九姓胡也屬此一系民族），與回紇人早有互動，當840年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滅時，龐特勤率十五部回紇西遷即進入上述地，在適應上毫無困難，此一支漸向塔里木盆地兩沿各綠洲發展，其後進入今中亞地區建立喀喇罕汗國¹⁹，領袖廣義之西域。另有僕固俊原統有一部回紇，駐牧於北庭附近（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以東地區），渠於866年（唐僖宗李儂光啟元年）攻占北庭治所庭州（今新疆奇台附近）及高昌（唐攻滅鞠氏高昌後，將之設為西州，地當今新疆吐魯番地區），此部分成為後代高昌回紇（或稱西州回紇）。

當回紇汗國破滅時，除南下、西徙者外，尚有人數較少的一支，自漠北草原向南至居延澤（或稱居延海，地當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以上古今地名，均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五冊《隋唐五代十國時期》，再沿弱水（即額濟納河）進入河西走廊，進駐甘州（今甘肅省張掖一帶），是為甘州回紇，其時河西走廊為吐蕃（即今西藏）所占，甘州回紇實際上服屬於吐蕃王朝。

¹⁸ 見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54。

¹⁹ 關於喀喇罕國之創建勢，歷來有多種說法，但仍以回紇龐特勤說較為可信，詳情見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7~60。

回紇汗國雖已覆滅，但回紇民族並未消失，反而擴大其生存空間，進入高昌（西州）、西域（今新疆、中亞）者，與當地早住民族相混融，成為元代以後之畏兀，今日維吾爾族，而中原地區也於十世紀初，進入五代十國分裂局面，當吐蕃王朝崩解後，党項羌之西夏崛起，占領河西一帶，阻絕回紇與中原王朝往來，因此一般史傳對五代時之回紇與中原王朝關係著墨較少；但仍有來往。

三、五代時期之回紇

中國歷史自秦統一天下，以至清末帝宣布退位，前後共 2133 年（西元前 221~西元 1911 年），大致上統一與分裂的時程各居其半，首次分裂為三國立，歷時約六十一年，第二次分裂為諸胡列國（即一般史書所稱之五胡十六年，惟其時既不止五胡，所建之政權也不止十六國，以諸胡列國稱之較為妥適）及南北朝，歷時二百八十六年；第三次分裂即為五代十國，歷時七十三年；第四次分裂為兩宋、遼、金、西夏之南北對峙，歷時三百二十年，或可稱之為第二次南北朝；第五次分裂則為明與後元（或北元）蒙古之對峙，歷時二百九十四年。因此五代十國在國史上是一個分裂時代，無論梁、唐、晉、漢、周，國祚都不長，而且國力也都不強，對已入西域之回紇，實無能為力，但已在西域立國的回紇仍未忘故土，時有使者到故土向中原王朝通好。

按西遷回紇其中主要一支越過葱嶺進入廣義之西域，據《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二載當黠戛斯攻破回紇汗國時，「其相駸職、特勒龐（勒係勤之誤，特勤係官號，一般均書之為龐特勤）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葛邏祿為西突厥汗國之一部，其先駐牧於今宰桑泊東之額爾齊斯河南岸，稍後南徙，自號「三姓葉護」，西元 657 年（唐高宗李治顯慶元年）西突厥汗國滅亡後，其別種突騎施（原駐牧於今伊犁河中游北岸）繼興，統有碎葉河（今稱楚河）東西兩岸突厥十姓之地，西元 708 年（唐中宗李景龍元年）其首領沙葛受唐廷封之為十四姓可汗，葛邏祿即為其中之一姓（即一部），受沙葛統轄，其後突騎施漸弱，回紇汗國漸盛，征服葛邏祿，舊《唐書》載其事曰：

「玄宗（李隆基）開元中（開元共二十九年，713~741 年）

中，回鶻漸盛，殺涼州（今甘肅省武威一帶）都督王君 臯（臯，音綽，獸名），斷安西諸國入長安路，玄宗命郭知運等討逐，……西城北去磧石口三百里。有十一都督，本九姓部落，一曰葷邏葛，即可汗之姓；二曰胡咄葛；……每一部落一都督。破拔悉密，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以統領之），統號十一部落，每行止戰鬥，常以二客部為軍鋒。」（舊《唐書》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5198）

之後葛邏祿力量漸盛，擺脫回紇汗國統治，徙居突厥十姓可汗故地，占有碎葉及怛邏斯諸城，與回紇形成對峙之勢，但因東來道路為回紇所阻，未能入朝於長安，《新唐書·回鶻傳》所附《葛邏祿傳》對此有所敘述。789 年（唐德宗、李適貞元五年），葛邏祿趁回紇被吐蕃擊敗機會，向東奪取浮圖川（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回紇大懼，乃南徙以避其鋒，葛邏祿趁勢攻占喀什噶爾（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喀什市），回紇汗國覆亡後，葛邏祿遂成為七河地區之主宰者，按所謂七河地區，一般而言係東起天山山脈西端以北，西至楚河，南自熱海（伊塞克湖）北抵巴爾喀什湖，其間有伊犁河、卡拉塔爾河、阿克蘇河、列普瑟河等河，水豐草美，古烏孫即生息於此，今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所有，當回紇龐特勤一支回紇人向西遷入葛邏祿所控制地區時，照理說會與葛邏祿發生衝突，但就目前既有漢文史料，均未見有相關記載，所知者僅為後來雄踞中亞之喀喇汗王朝為龐特勤一支回紇人所建（詳見本文注 18 所引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

當回紇汗國為黠戛斯所破，回紇之眾或南下奔入唐境，其後或融入唐人之中，或被唐邊郡守將所逐，逃往大興安西端諸室韋之中（室韋係東胡系民族，有許多支系，其中蒙兀或蒙瓦室韋，即後日之蒙古，或云室韋係鮮卑一詞之諧譯），最後融入諸室韋之中。至於進入河西走廊之甘州回紇，初時雖服屬於吐蕃，當吐蕃王朝崩解後，遂自立稱可汗，進入高昌（西州）者稱西州回紇，也自行立國；至於進入西域部分，後建立喀喇罕汗國，前三者與五代時之中原王朝均有所接觸，茲分為以下兩部分加以敘述。

(一)甘州回紇或河西回紇部分

當回紇汗國崩潰半個多世紀後，唐朝也被權臣朱溫（全忠）所篡建立以梁為國號之政權（史稱後梁），從此中原進入五代十國時期，據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鶻傳》（按一般文獻一如《舊唐書》、《舊五代史》，此一種稱謂對撰著者薛居正而言，極不尊重，蓋渠撰《五代史》安知其後有歐陽修另撰《新五代史》，而自署其書名為《舊五代史》，仍以作舊《五代史》為妥，雖然歷來多作《舊五代史》、《舊唐書》，但積非不能成是，眾口也不能鑠金）所載：

「回鶻，其先匈奴之種也。後魏時（後魏係指鮮卑拓跋珪所建之魏），號為鐵勒，亦名回紇。唐元和四年（元和係唐憲宗李純年號，其四年為 809 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為『回鶻』，義取迴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本牙在天德西北（按天德係天德軍之省稱，駐紮於黃河河套以北，中受降城之西，中受降城位於鄂爾多斯河套以北，今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五原縣境內）婆陵水上（婆字疑為娑字之誤娑陵水，今色楞格河），距京師八千餘里。」

《新五代史》（或稱《五代史記》），對回紇之記載如下：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振武軍經考證其地當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又為石雄、張仲武所破，其餘眾西徙，役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

（見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916）

從上引《新五代史》知五代時甘州、西州回紇與中原王朝頗有往來，且甘州國回紇稱中原王朝為舅，其所以如此者，以唐時曾多次與回紇和親，其中有真公主嫁回紇可汗（之前兩漢與匈奴和親，多以良家子賜以公主名號嫁匈奴單于，從未以真公主與匈奴和親，唐初李世民以宗王女為文

成公主嫁吐蕃松贊剛布贊普也非真公主），回紇可汗乃自認中原王朝為舅家，實緣於此。

後梁太祖朱溫乾化元年（911 年，同年初為開平五年，後改元乾化），甘州回紇遣其都督周易言通好于後梁，史傳未載其時甘州回鶻君長名號，但舊《五代史》則有較細之記載：

「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甘州回鶻）遣都督周易言等人入朝進貢，（梁）太祖御朝元殿引對，以（周）易言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同正²⁰，以石壽兒、石論思並為千牛衛將軍同正²¹，仍以左監門將軍楊沼（《四部備要》本之舊《五代史》作湯沼，但仍以楊沼為是）充押領回鶻還蕃使（護送使者返回之臨時官稱）。通事舍人仇玄為通事判官，厚賜繒帛，放令歸國，又賜其入朝僧凝廬、宜李思、宜延箋等紫衣。」²²

從上項記載確證五代後梁時，甘州回紇與後梁有所接觸，另從「又賜其入朝僧凝廬，李宜思（見注 21），宜延箋等紫衣」句，可證其時甘州回紇仍有佛教僧侶，不過回紇自 840 年奔甘州，其時甘州乃受吐蕃所控制，吐蕃之佛教非正統佛教，雜有傳統苯教色彩，並吸入若干摩尼教成分，稱之為喇嘛教較為妥適，喇嘛皆著紫紅色袈裟，及甘州回紇遣使後梁已是 911 年，換言之，回紇之在甘州已有半世紀之久，移風易俗部份回紇人改宗喇嘛教，並非不可能之事（按回紇自牟羽可汗係奉摩尼教為國教，故云改宗），這點頗值深入研究。

五代後梁國祚短暫（907~923 年，頭尾僅十七年），即為源於泛突厥族，但已全然入唐之李存勖所取代，建國號為唐，史稱後唐，李存勖廟號莊宗，於其同光二年（924 年）四月，甘州回紇王仁美遣都督李引釋迦

²⁰ 右監門衛大將軍，即禁軍將軍，漢時設城門校尉，掌諸門禁衛，隋時擴充禁軍為十六衛，唐時分為左、右各以大將軍一人統之。同正，同正員之省，即某官職正員之外，另設一員，稱之為同正員或省稱同正，請參見徐連達《中國歷代官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328、945、466。

²¹ 千牛衛將軍，千牛衛係唐禁衛軍機構，分左、右二衛，每衛有上將軍一人、大將軍、將軍各一人，五代沿置，見《中國歷代官制》頁 89。

²² 宜李思，《五代會要》作年思宜，按宜李思應為李宜思之誤，而年審思又係李宜思之誤。而紫衣一般係指紫紅色袈裟。

²³、副使鐵林 ²⁴、都督楊福安等共六十六人來貢方物，並獻善馬九匹，後唐莊宗召對於文明殿，乃命司農卿（為漢時九卿之一，之後歷代沿置，主掌糧食積儲、京官祿米及園池果實，其署稱司農寺）鄭績（此字罕見，讀若會，舊《五代史》作績，但他書多作績，另有作績者，未省孰是）、將作少監（秦漢九卿之官謂將作少府，掌營建之類，將作少監應即將作少府）何延嗣持節冊回紇仁美為英義可汗（以上見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對此事之記載則為：

「至唐莊宗時，（回紇）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見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916）

同年（924 年）甘州回紇英義可汗仁美卒，由其弟狄銀立（狄銀，應係突厥語特勤 *tegin* 之諧譯，特勤由可汗子弟任之）嗣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朝後梁（以上為《新五代史》所載），然狄銀僅是官號而非人名，新、舊《五代史》均未提出狄銀（特勤）之名，按狄銀於 924~926 年在位，其時正是契丹耶律阿保機在位（916~926 年），耶律阿保機史稱遼太祖，據《遼史》卷四曾載：

「（天贊四年，按天贊係遼太祖年號，其四年為西元 925 年）十一月己未朔，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烏母主可汗。」

兩相比對，則知仁美之弟狄銀嗣立為甘州回紇後，其名稱為「烏母主可汗」，然則「烏母主」究竟是可汗之名號（如仁美為英義可汗「英義」乃是可汗之名號，並非其名字，一如後世鐵木真稱「成吉思」可汗，成吉思乃可汗之名號，其本名為鐵木真），不過比僅知狄銀可汗，也算是向前推進了一步。《新五代史》稱狄銀嗣立之後，遣都督安千想來朝後梁，此

²³ 見法、哈密頓（James Russell Hamilton）著，耿昇、穆根米譯《五代回鶻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頁 72，注 2 中稱李引釋迦牟尼之省稱，因此上說未必正確。

²⁴ 鐵林《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均作田鐵林，「田」當係漢姓，而「鐵林」，據哈密頓考證，可能為突厥語 *Tärim* 之音譯，在突厥族中多作為婦女名字，但噶什喀里《突厥語大辭典》認為可作為男性名字，如 1300 年時哈密（伊吾）王子即名 *Tärim*，見註 22 所引書頁 22。

安千想之「安」姓，顯然為今中亞昭武九姓安國胡人，從而可見回紇自改宗摩尼教後，有許多西域九姓胡融入回紇之中，安千想在某些文獻中作安千箱，「千想」或「千箱」當為胡語之音譯，用字不同，但音近。

後唐莊宗李存勖同光四年（926 年），狄銀或烏母主可汗卒，阿咄欲嗣立，阿咄欲事蹟，《新五代史》未曾著墨，但舊《五代史》及《五代會要》則略有敘述：「狄銀卒，阿咄欲事蹟，《新五代史》未曾著墨，但舊《五代史》及《五代會要》則略有敘述：「狄銀卒，阿咄欲立遣使來貢名馬。」是知阿咄欲與後唐也有聯繫。及至後唐明宗李嗣源（或作李亶）天成元年（926 年）六月十日，後唐御使台奏稱：

「伏睹今月三日，入閣班引退後，方引對朝貢蕃使。竊觀近制，頗失常儀。」

右太常禮院則奏（太常，掌宗廟祭祀、禮樂及文化教育之官，秦時稱奉常，西漢景帝改稱太常，其治事署衙稱太常寺，唐時時有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諸事）：

「……近制惟回鶻蕃使，則正殿引對。況回鶻見居甘州，其地元屬河西道涼州所管，每遣使進表帀，待以賓禮。皇帝御正殿，列百辟，鋪陳盛儀，酌禮沿情，事恐太重，伏請今後准諸蕃客列，只于殿內引對，不臨正朝，兼免乖越，又符故事。」（見《五代會要》卷三十、《雜錄》）

從上項記載有回鶻每遣使進表帀，可知甘州回紇與後唐往來頗綿密。

甘州回紇阿咄欲（或即烏母主可汗）何時卒，不詳，但從《新五代史》載：「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句，可知後唐明宗天成二年（927 年）甘州回紇已由仁裕「權知國事」，而且派使者李阿山來朝後唐，據舊《五代史》卷一三八載：

「天成三年二月（與《新五代史》所載相差一年），其（指甘州回紇）權知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三等一百二十人入貢，明宗召對于崇殿，賜有差。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為順化可汗。」

上項史料指出甘州回紇可汗派都督李阿三為使，此一「李阿山」姓名，頗值一談，李姓顯然是回紇自認是中原唐朝之甥而以李為姓，此點正如匈奴因數與兩漢聯姻，成為漢室之甥，及其衰弱時，多以「劉」為姓，如開啟諸胡列國（按即一般史書所稱之五胡十六國，但以其時既不止五胡，所建政權也不止十六國，故稱諸胡列國較為妥適）序幕之匈奴劉淵，就以劉為姓，至於其名「阿三」者，或云是「阿爾珊」之對音更可能是突厥語「Ašam」之對音，中亞昭武九姓胡也多有「山」音為名者，另，「阿三」，係後唐明宗養子名阿三，此人本姓王，其身世微賤，母魏氏，少寡，後唐明宗為騎將時，過平山（魏氏及其子阿三皆鎮州平山人），掠得魏氏及其子阿三，時阿三已十餘歲，明宗養以為子，名之曰從珂，是為後唐廢帝。中原之人取名阿三，有行三之義，而回紇、突厥、九姓胡取名阿山或阿三，乃音譯胡語與字義無涉。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929 年），甘州回紇又遣都督掣拔等五人朝於後唐，後唐授掣拔等懷化司戈，據舊《五代史》《本記》卷四十載後唐明天成四年元月壬辰日（929 年三月五日）：

「回鶻入朝使王掣拔等五人，各授懷化司戈、放還。」

此處懷化係形容詞，「司戈」則為唐禁衛諸所屬之武官名號，秩正八品或從八品，位在執戟之上，據《新唐書·百官志四》載：「司戈，執戟各五人。」從其官秩僅八品看，位階甚低，換言之，其時後唐或已知曉甘州回紇無甚實力，故僅授予八品之司戈之官號；至回紇所派掣拔者，據哈密頓考證，認為「掣拔」係突厥語「Čapar」之音譯，並經輾轉考證，指稱「掣拔」之意為「探馬」²⁵，果而「掣拔」意為「探馬」，探馬位階也不高，後唐授以八品之司戈名銜，也符合「對等」原則，同時也表明後唐對甘州回紇，並非一無所知。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930 年）甘州回紇又遣使孽栗祖、安黑連、翟末思等數度來朝貢方物²⁶。在《冊府元龜·外臣部·褒異三》有一段頗有價值之記載，茲略述如次：後唐明宗天成四（929 年）八月……癸亥，有

²⁵ 見哈密頓著，耿昇、穆根來譯《五代回紇史料》，頁 79。

²⁶ 回紇遣使一事，分見兩《五代史》、《五代會要》、《冊府元龜》等史料，此處係引自馮志文、吳平凡編《回鶻史編年》，新疆大學出版社，1992 年。

北京官員奏有摩尼教「和尚」（時以和尚、僧兼指各宗教之出家人或傳教師）死葬之，此雖小事，但往深一層看，則與回紇之南來有關聯，蓋回紇汗國破滅時，其時由大特勤噶沒斯所率一支入唐，唐賜以姓名為李思忠，其時摩尼教及教師也隨之而來，唐武宗封之為懷化郡王，及其孫李彥圖為太原少尹，適關中大亂，李彥圖率其族投歸後唐，後唐太祖李克用賜宅一區，在宅旁置摩尼院一所，其摩尼師至是卒（見《冊府元龜》頁11468~11469），從而也可知唐武宗會昌「滅佛」時，各「夷教」均受打擊，摩尼教尤甚，但李思忠（即噶沒斯）宅旁之摩尼教寺院未受影響，此點諸論摩尼教之論著，似均未提及，因此頗值一提。

及至後唐明宗長興二年（931年），甘州回紇又遣使安末思來朝，從安末思譯名看，很可能是昭武九姓安國胡融入回紇者，次年回紇再遣使貢方物。按十世紀時党項羌所建之西夏崛起，雄據青海、山西、陝西、甘肅一帶，阻絕甘州回紇東來進貢之路，或掠奪回紇來朝所貢之方物，舊《五代史、唐書十九、明宗紀九》載有此事，其文略為：

「……甲戌……葇彥稠奏，誅党項阿埋等十族，與康福入白魚谷追襲叛党，獲大首領六人，……及先劫掠回紇貨物，……壬午，葇彥稠進回紇可汗先送秦王金裝胡祿，為党項所掠，至是得之以獻。」（見標點本頁589）

設無西夏擋道，甘州回紇與中原王朝關係，或將更為綿密。同年三月，後唐封甘州回紇朝貢使拽祝為懷化將軍（懷化大將軍或懷化將軍，係唐武散官名）、副使印安勒為懷郎將，監使為懷化司侯、判官裴連兒為懷化司階（懷化郎將、懷化司侯、懷化司階其位階低於將軍）。後唐閔帝李從厚應順元年（應順僅一年，934），回紇仁美可汗遣使獻故可汗仁裕遺留貢物鞍馬、器械、仁美可汗又獻美玉團、玉鞦轡、礪砂、鈴羊角、波斯寶鏤、玉帶（見《冊府元龜、將帥部、懷撫》），後唐朝廷賜以錦袍、銀帶等物。後唐享祚也僅十四年（923~936年），由石敬瑭之晉所取代，史稱後晉，後晉石敬瑭天福三年（938年），甘州回紇可汗仁美遣翟全福為使到後晉獻野馬，獨峰駝、王轡頭、大鵬砂、礪砂、膾膾膾、金鋼鑽、鈴羊角、白貂鼠皮，安西絲、野駝峰等物，同年九月，據舊《五代史、晉書、高祖紀三》載有：

「……乙丑，于闐國王楊仁美遣使貢方物。」（見標點本頁 1018）

此一于闐國王叫楊仁美，「仁美」正是甘州回鶻可汗之名，舊《五代史》可能有誤，極可能是把「王」字誤書為「楊」，這種訛讀並不罕見，如一百五、六十年後，今外蒙古西部屬突厥回紇系之乃蠻部長太陽汗，本名台不花，奪得汗位後，曾受女真金朝封為「夷离堇」（此一名號，女真襲自契丹語，其意為大王，見《遼史》《國語解》所以自稱大王，但訛讀為太陽，復又稱汗，故以太陽汗之名見著于史冊，「陽」、「楊」同音，都為漢字「王」之訛讀，蒙古興起時，漠北之操突厥回紇語之克烈，乃蠻兩部，有可能是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破後，未及逃亡，仍留漠北之回紇人，之後與自額爾古納河西來的東胡系蒙古各部混融，成為克烈、乃蠻，當然此一推測仍需更多史料證明），因此把「王」訛讀為「楊」並非不可能；此外，據《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第三、回鶻》所載：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羴牛尾、玉氎等，晉遣供奉官張匡業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海為判官，冊（李）聖天為大寶于闐王。」（見《新五代史》標點本頁 917），

後晉所派使者高居海曾記載沿途經過及在于闐見聞，頗具參考價值（其全文見《新五代史》頁 917~918），可見舊《五代史》所稱之于闐王楊仁美，應是李聖天之誤。後晉也封李聖天為大寶于闐國，從此項封號看，其時于闐尚未伊斯蘭化。

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四年（939 年）三月，冊封回鶻仁美可汗，其冊封制曰：

「回鶻仁美可汗，雄臨朔野，虔奉中朝。一方之烽燧篋聞，萬里之梯航繼至，自當開創，益效傾輸，備睹尊獎之心，爰降冊封之命，宜封為奉化可汗。」（見《冊府元龜、外臣部、封冊三》）

另擇日備禮冊命，並遣衛尉卿（衛尉、秦漢時掌宮門屯衛之官員，北齊時設衛尉寺，設卿、少卿、丞各一人，隋唐沿置）邢德昭持節使之。天福五年回鶻可汗遣都督石海金等來後晉貢良馬百駒、並白玉團、白玉鞍轡等，以謝後晉之冊封。此後天福五年、七年，甘州回紇均有使者來，天福七年（942 年）石敬瑭卒，由石重貴嗣立，最初三年（942~944 年）仍以天福為年號，天福八年，封回鶻入朝使劉再成等為懷化大將軍、將軍郎將等，之後石重貴改元開運（共三年（944~946 年）、開運二、三年，甘州回鶻可汗均曾遣使到後晉貢獻，開運三年之使者名為突厥陸（見《新五代史·晉本紀》），此使者音譯名字頗奇特。

後晉出帝石從貴開運三年（946 年）國滅，由泛突厥族但已全融入唐人之劉知遠嗣立，建國號為漢，史稱五代後漢，初立仍以天福為年號，故《古今圖書集成邊裔典·于闐部》²⁷載有「天福十二年（947 年，此係自後晉石敬瑭建元天福以來連續計之）六月，戊辰、于闐遣使者來」之記載。實則已是後漢劉知遠元年，次年（948 年）改元朝祐，據舊《五代史》載，乾祐元年五月，回鶻使李屋等來，貢馬並白玉、藥物等（分見《回鶻傳》及《隱帝紀上》），同事件《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五》所載貢物較為詳細。在同書又載後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951 年）有西州回鶻（西州，唐太宗滅高昌鞠氏王朝後，建之為西州，遂稱西州回鶻，又其他自漢至唐均稱高昌，也稱高昌回鶻，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二月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先是自後晉以來，回鶻使者²⁸「每至京師（五代均以開封為京師，開封或作汴梁），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鬻之入官，民間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聽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詰，由是玉之價值十損七八」（見舊《五代史·回鶻

²⁷ 《古今圖書集成》係類書名，原名《古書圖書彙編》，清康熙時（1662~1722 年）陳夢雷等原輯未刊行，雍正時（1723~1735 年），命蔣廷錫等重為編校，改名《古今圖書集成》，全書一萬卷，分曆象、方輿、明倫、博物、理學、經濟六編，乾象、歲功、曆法等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每部先彙考，後總論，外編等項目，雍正四年（1726 年）以活字本排印，共印六十四部。

²⁸ 自通西域後，西域諸國之到中國販貿者，每稱為朝貢使（其中或有真為朝貢者），每一使者團往往數百人，其真正目的在販售西域商品，昭武九姓胡尤精此道，晚至明、清瓦剌、準噶爾之「貢使」多達數千人，朝貢其名，販售貨物其實，唯其人數眾多，所攜「寶物」數量也可觀，乃能影響市場價格。

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1843），西州回鶻使團之來，而後周太祖郭威又准其與民間交易，一時竟使玉石價格向下滑落十之七、八，一則可見其使團人數之多，如僅有正、副等少數使者，所能攜帶之「寶貨」為數有限，不可能影響市場價格；再則可證後晉、後漢之時，規定西州或西域回鶻使者所攜「寶物」必須全數售予官府，形同壟斷，對研究五代經濟，頗具參考價值。

後周太祖郭威廣順二年（952 年），據《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五》所載：

「三月，……回鶻遣使每與難支（此四字係使者名字之音譯），副骨迪歷等十二人來朝，貢玉團三、珊瑚樹二十、琥珀五十斤、貂鼠皮、毛褐、白氍、岑皮靴等。」

此處僅稱「回鶻遣使」，未書明其為甘州回鶻或西州回鶻或西域喀刺罕王朝，不過從貢品中有「珊瑚樹二十」看，此一回鶻可能為西域喀刺罕王朝，其所以作此推測者，無論甘州或西州回鶻均位處內陸，而珊瑚係海洋生物，喀刺罕王朝雖也不臨海，但其疆廣袤、國力壯盛與小亞細亞、西亞甚至歐洲各國均有經貿往來，地中海一帶盛產珊瑚，喀刺罕王朝有可能獲得珊瑚，此項推測確否，仍待有更多證據始能證實，此處僅作推測。至後周世宗柴榮顯德六年（959 年，按後周太祖郭威曾以顯德為年號，僅一年，死，無子，以養子柴榮嗣立，仍以顯德為年號），甘州回鶻遣使獻玉並礪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時後周世宗以玉雖稱寶，無益國用，故因而却之（見舊《五代史、回鶻傳》），如此看來周世宗柴榮尚不失為明智之君。後周世宗柴榮在位六年（954~959 年）卒，傳子柴宗訓，史稱恭帝，年幼在位僅兩年，為禁軍首領趙匡胤所篡，後周亡，五代也宣告結束。

（二）西州或安西回紇

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破時，其眾向南、向西逃亡，其向西逃奔者，除龐特勤所率奔向西域，另有一支逃往唐安西都護府所在之西州，此一支人數多少，兩《唐書》均未提及，但據《宋史、回鶻傳》載：

「（回紇於北宋神宗）熙寧元年入貢，神宗問其國種落生

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

按宋神宗趙顥熙寧共十年（1068~1077 年），其元年（1068 年）上距回紇汗國之滅亡（840 年），已有二百二十九年，一般以三十為一代，也即西州回紇之西奔西州，已歷七代，在此兩個多世紀中，就既有文獻所載，西州一帶並無重大戰事，照理有利於人口增長，然而當時（十一世紀中葉）西州生齒僅有三十萬人，如以此數字往前追溯，其西遷西州時，人口應不會超過五、六萬人。

西州為唐安西都護府治所，西州在唐以前均稱高昌，唐滅高昌鞠氏王朝後，將之設為西州，因此此部分回紇稱西州或高昌回紇，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唐朝在西域除設置安西都護府外，另設有北庭都護府（治所在庭州，其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薩爾縣護堡子），自唐代宗李豫（762~779 年在位）初，吐蕃攻陷河隴之後，此二都護府即行廢棄，終唐之世始終無力規復，西域東部一直在吐蕃控制之下，因此當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滅時，西遷到西州之初，直到 865 年（唐懿宗李漼咸通六年）回紇西遷之眾，大概只能在天山以北駐牧，回紇似無法進入天山以南，至 866 年（唐懿宗咸通七年）回紇仆固俊擊敗吐蕃，斬吐蕃論尚熱（論係吐蕃大臣官號、尚熱乃其名），回紇始占有北庭、西州、輪台（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輪台縣）之後，回紇之眾始擁有天山以南，並漸次向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沿各綠洲進駐，但其時唐朝已進入藩鎮割據局面，國威不振且党項羌之西夏崛起，今青海、寧夏、甘肅河西乃至秦晉部分地區，均屬西夏所有，西州回紇與中原王朝之聯繫受西夏之阻撓，幾乎斷絕，因此五代時期西州回紇鮮與中原往來，直到趙匡胤建立宋王朝（史稱北宋），西州回紇始於宋太祖建隆三年（962 年）遣阿都督等人向北宋貢方物，及至宋太宗趙匡義（因避趙匡胤諱，改名趙炅，炅音炯，明亮之意，作姓時讀貴）太平興國六年（981 年），宋太宗始遣供奉官²⁹王延德出使高昌回紇，至太宗雍熙元年（984 年）返，撰有《使高昌記》，至是中原王朝對西州回紇始有較多之認識，

²⁹ 供奉官，唐以中書、門下兩省官及御使台官為供奉官，宋三班院武臣有供奉官，宋太宗以後，分為東西兩頭供奉官，位在左右侍禁之上。

茲將該記全文抄錄如次³⁰：

「初自夏州（時夏州為西夏所轄，地當今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西北約五十公里處）歷黃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女喝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於水域以橐駝牽木棧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五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為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止。夕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梁劼特族，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之子（按于越係契丹官名）。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鳬鴈之類甚眾。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按開元係唐玄宗李隆基第二個年號，其二年為西元 715 年，距王延昌之使高昌，已二百六十七年），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寶鐵，謂之喫鐵石。又有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地名），乃至高昌。

³⁰ 王延德《使高昌紀》輯入《宋史》卷四九。《高昌傳》，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頁 14110~14113。

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蔥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群萃河濱，或起飛，即為日氣所爍，墜而復翼。屋宇覆以白堊，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磴（磴，音為或位）。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鴈。樂多琵琶、箏篪。出貂鼠、白氍、繡文花蕊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鎗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游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樂於其間。游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絨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眾熨、小眾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多族、預龍族之名甚眾。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

時四月，師子王（按即回紇語阿爾斯蘭之意譯今日維吾爾語讀獅子仍為阿爾斯蘭）避暑於北廷（或作別矢八里，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稍西北，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宋遼金時期》，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年，頁38~39），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王）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當不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今吐魯番市），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

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放牧平川中，彌互百餘

里，以毛色分別為群，莫知其數。北廷川長廣數千里鷹鷂鷗鵲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大如鼯，鷙禽捕食之。

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游佛寺，曰應運太寧之寺，（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造。

北廷北山中出礪砂，山中嘗有烟氣涌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鞬取之（鞬，同鞋，音也同），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冶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饑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既唐之西境。」

以上這一段係北宋初期西州回紇王延德親身目睹之情況，五代時情況也當如是，宋使王延德在西州回紇汗國親見有摩尼寺，此證明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滅，回紇之眾四處逃亡，其逃往西州者，仍為摩尼教信仰，至於西州回紇境內也有佛教寺院，但大多係鞠氏高昌王朝所建，以及唐滅鞠氏高昌王朝後，將之建為西州，等同內地，自是也廣建佛教寺院，如應運太寧之寺，即唐貞觀十四年所建。另王延德以正面方式描述西州回紇稱「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又稱西州回紇「人白皙端正，性工巧」，未以輕巉字眼敘述，此為其他《行紀》所罕見者。

（三）喀刺罕王朝

關於雄踞西域（含今中亞地區）之喀刺罕王朝，其創建者向有多種不同說法，但非本文之主題，本文採大陸學者魏良弢之說法，認係西遷回紇龐特勤及其後人所創建，詳見魏著《喀刺汗王朝史稿》一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以往由於國人鮮少注意邊疆史之研究，對遠在西域之喀刺罕王朝更為陌生，因而往九誤以喀刺罕王朝與西亞伊斯蘭國家關係密切，而與中原王朝關係不深，其實不然，在漢文史料中也留下不少喀刺罕王朝與中原宋朝、遼朝（遼朝係東胡系契丹族所建，為我國正統王朝之

一，享祚長達兩百餘年，其餘緒耶律大石更在西域創建西遼，西方文獻多稱之為喀刺契丹，將漢語文作為西遼官廷之官方語文³¹，遼朝當然是中原王朝）都有相當來往，五代之時，一則由於交通阻隔，而喀刺罕王朝也尚在草創之中，因此與中原五代各朝並無往來紀錄，不過在上節提到後周太祖郭威廣順二年（952 年）回紇遣使貢品中有「珊瑚樹二十」，頗令人好奇的是甘州或西州回紇（河西及吐魯番地區）均不產珊瑚，如何能有珊瑚樹作為貢品，且數量多達二十，是否有可能是喀刺罕王朝之使者，《冊府元龜》編輯者或許不能區別甘州、西州或喀刺罕王朝之回紇³²，而統回紇稱之，當然這是筆者大膽推測，仍需更多文獻證明，目前不能成為定論。以下所述者為喀刺罕王朝與宋、遼兩朝之關係。

據《宋史·于闐傳》載：北宋真宗趙恒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

「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斯溫等以方物來貢。（羅）斯溫跪奏曰（按羅斯溫乃回紇人名之音譯，漢文史傳將之斷為姓羅，名斯溫）：『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人作主。』上詢以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日道路嘗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即賁往，亦與命使無異也。』」

此處所謂「黑韓王」，按「黑」回紇語讀作「喀刺」，在突厥、回紇語甚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語言中，有純潔、神聖之義，如喀刺崑崙山、如遼亡後，其王室後人耶律大石率極少契丹族人到西域建立政權，漢文史料稱之為西遼，但西域史料及西方文獻均稱之為「喀刺契丹」，此兩處「喀刺」均含有神聖之義；再如稍晚崛起於漠北之蒙古，其自始即為蒙古者，稱「黑韃靼」，其原非蒙古而融入蒙古者，稱白韃靼或野韃靼，此處之

³¹ 關於喀刺契丹即西遼宮廷使用漢語文一事，見法人勒尼·格魯塞（RENE GROUSSET）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86。

³² 《冊府元龜》係北宋真宗趙恒於其景德二年（1005 年）命王欽若、楊億等編纂之類書，全書一千卷，輯集歷代君臣事跡，按人事人物，分門編纂，分三十一部，子目一千一百零四門，部有總序，門有小序。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 年）成書，孫奭注撰音義。取材以正史為主，間及經、子，不錄小說家言。所據諸史皆宋以前古本，當時唐、五代各朝實錄存者尚多，可以校補舊史。

「黑」則含有純潔之義。因此《宋史、于闐傳》之黑韓王，即喀喇罕王朝之可汗，於焉可證明北宋真宗時喀喇罕王朝確與中原宋王朝有聯繫，且再看《宋史》同傳載宋仁宗、趙禎嘉祐八年（1063年）八月：

「（于闐）遣使羅撒溫獻方物。十一月，以其國王為特進（特進為文散官名，漢時以諸侯功德最盛者封此官，兩晉南北朝多因之，隋為散官，唐始以為文散官，後代多沿用之，屬榮譽職）、歸忠保順砮鱗黑韓王。羅撒溫言其王乞賜此號也，于闐謂金翅鳥為砮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也。羅撒溫等以獻物賜直少不受，及請所獻獨峰橐駝。詔以遠人特別賜錢五千貫，以橐駝還之，而與其已賜之直。其後數以物來獻。」

當時喀喇罕王朝（或作喀喇罕汗國）已統有于闐，故《宋史》稱之為于闐，不過有一種情形需先予澄清，自唐代以來，西域昭武九姓諸國，自唐高祖李淵武德十年（627年）至唐代宗李豫大曆七年（772年）頭尾一百四十六年間，向唐朝遣使入貢有九十次之多³³，其中固有真正昭武九姓諸國所派使團，但也有不少是昭武九姓胡商冒稱使者，入貢為名，經商其實，入貢即可獲得皇帝賞賜（往往高於「貢品」之值），經商所得更為可觀，通常每一商隊（或冒稱為使團）人數往往多達五百多人，每人以兩峰駱駝計，千隻駱駝所馱載之貨物，其數量之多，可想而知，此一事實既往多為人所忽略，一概以朝貢稱，此乃虛榮心作祟，設能以此心態看上引史傳所載喀喇罕王朝所遣使羅撒溫，竟然以「獻物賜直（同值）少不受」，這很可能說明羅撒溫並非正式使者，而是商人冒充使者，否則怎麼可能以「獻物賜值少不受」？不過縱或如此，仍足以證明喀喇罕王朝人民與中原王朝有實質往來。且看《宋史、于闐傳》以下一段記載，更能證明以上推測屬實：

「熙寧以來（熙寧係宋神宗趙顥第一個年號，共十年，1068~1077年），（于闐，實係喀喇罕王朝）遠不逾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

³³ 詳細入貢情形，請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9~52。

珀、花蕊布礪砂、龍鹽、西錦、玉鞦轡馬、膾腩臍、金星石、水銀、安息雞舌香，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暈錦旋襴衣、金帶、器帀，宰相則盤球雲錦夾襴（襴為上下相連之衣衫）。地產乳香，來輒群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元豐也神宗年號，共八年，1078~1085年），始詔惟賣表及方物馬驢，乃聽以詣闕，乳香無用，不許貢。」

從上引史傳所載，更明白看出喀喇罕王朝的「使者」，實際上是販售有無的商賈，因此才「有所持無表章」，且「私與商賈牟利」，這分明就是喀喇罕王朝的商人，既是商人，就不會是匹馬單槍前來，而是成群結隊到宋朝境內「做生意」，此種接觸方式，較諸正式使者，更能廣泛深入民間，增加喀喇罕王朝回紇人與中原宋朝人民的接觸，有接觸就能增進互相了解，有時民間接觸其效果更甚於官方接觸。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年），于闐（實際喀喇罕王朝）遣部領阿辛上表稱：

「于闐國僂僂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複數百言。董毡使導至熙州（查熙州當今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分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冊及《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手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頁159），譯其詞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敕書諭之。」（見《宋史·于闐傳》）

這段史料頗為奇特，意謂喀喇罕王朝有三使來朝宋而未歸，但宋朝廷稱皆已賞賜後令還，其實此種情形稽諸往史，並不罕見，唐時西域昭武九姓諸國胡族或出使中國或來華興販，最後滯華不歸者所在多有，詳情可參見榮新江所著《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一文³⁴、及榮新江、華潤、張志清主編之《粟特人在中國》³⁵等專著，都可

³⁴ 該文輯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一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頁3~8，且列有昭武九姓胡遷徙路線路。

³⁵ 此書係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此書輯錄中外學者十八篇專文。

得知西域昭武九姓胡（即粟特人）滯留中國情形，如是則前述喀喇罕王朝所遣三使者之未返回于闐，當屬可以理解者。

除上述《宋史》所載回紇喀喇罕王朝使者或商人與中原宋朝接觸情況外，另《宋會要輯稿·蕃夷四》³⁶也載有以下數條史料，茲為節省篇幅，不再加以析說：

1. 「熙寧五年（1072 年）十月三日，『客省言（宋遼金元時掌禮賓之機構，宋客省掌接待外邦國信使、四方、四夷人進奉使，安排其朝。謹與辭另皇帝，受其貢獻禮物，頒給詔書，宴享賞賜等事）：于闐國進奉使羅阿厮難撒溫等有乳香三萬一千餘斤，為錢四萬四千餘貫，乞錢價三千貫，賣于官庫。從之。』」
2. 元豐元年（1078 年）六月九日，「詔提舉茶場司：（按宋有提舉茶鹽司，為主管各地茶收入之財政機構，此處提舉茶場司當係提舉茶鹽司之誤）于闐進奉使人買茶，與免稅，于歲額錢內除之。」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于闐貢方物。
3. 元豐二年十月十三日，「熙河路經略司言：于闐國貢方物而無國主表章，法不當納，已諭使去，詔：如堅欲來貢，可聽之。」
4. 元豐三年（1080 年）正月二十七日，「于闐國大首阿令顛顛溫等來貢方物」
5. 元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詔：于闐國進奉使所賣乳香償以見（同現）錢，其乳香所過官吏失察，令轉運司劾罪（唐時置轉運使，初為差遣官，由朝廷特命大臣經理江淮米糧錢帛物資之

³⁶ 《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輯，為古史籍中斷代的會要，始於唐德宗李適貞元中（貞元 785~805 年）蘇冕纂《唐會要》，宋於秘書省設會要所專司纂輯，前後十次，成書二千二百餘卷，所據為實錄，日曆、內外檔案等。稿未刊行。元修《宋史》多就此取材，各志所采尤多。明初修《永樂大典》，曾取《宋會要》史事分入各韻，惟其時《會要》原稿已亡其三，宣德間（明宣宗朱瞻基年號 1426~1435 年）又大半毀於火，清嘉慶（1796~1819 年在位）時徐松自《永樂大典》中輯出五、六百卷，後經劉富曾刪併原稿成初編二百九十一卷，分十六類，續編七十五卷，分九類，1936 年影印出版。

轉運工作，供給京師及百官所需，後遂成為常設官，宋代沿之，此處轉運司即轉運使）。」

6. 元豐三年十月九日，「熙州奏：于闐國進奉般次至南川寨（經查南川寨地當今甘肅省臨洮南傍洮水），稱有乳香雜物等十萬餘斤，以有違朝旨未敢解發，『詔：乳香約回』」

7. 元豐四年正月，「（于闐）又入貢。」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熙河路經略指揮、熙州目（目字或作自）今于闐國入貢，唯貴國王表及方物，聽赴闕，毋過五十人；驢馬頭口準此。餘物解發，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買賣，婉順開諭。除乳香無用不許進奉及挾帶上京並諸處貨易外，其餘物並依常進貢博賣。」

《宋會要輯稿》載有于闐回紇（實際上有即喀喇罕王朝）前來北宋進貢或興販共有五十條，此處不擬一一列舉，實可證明喀喇罕王朝與中原宋王朝，確有綿密的往來。

至於喀喇罕王朝與遼朝的關係，也相當密切，按遼朝係東胡系契丹族所建，為我國正統王朝之一，顧自秦統一天下，以至清宣統宣布退位之二千一百三十三年間（西元前 221~西元 1911 年），曾經在中國大地命王稱帝建元立號、建立政權或王朝者，總不下有五、六十個之多，但其享祚超過兩百年者，僅有西漢、唐、遼、明、清五個朝代，其中西漢與明之創建者為漢人，契丹之遼與女真與女真或滿族之清，其創建者為胡族，均無疑問，而唐朝李淵一族，介於胡漢之間，縱然李唐父系為漢人，而其女系母統則雜有胡族血胤（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83），此乃不爭之實，因此二千多年來的歷史，是由胡、漢民族所共構而成，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遼、金都是中國的正統王朝，當遼金西夏與兩宋對峙的時代，可視之為第二次南北朝，遼朝雄踞北中國，聲勢及於西域，就《遼史》本文而言，雖不見喀喇罕王朝之字樣，但《遼史》中的「阿薩蘭回鶻」經學者考定，指的就是喀喇罕王朝³⁷，此項考定至為正確，如是則《遼史》中提

³⁷ 見魏良弢《喀喇罕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48。

及「阿薩蘭回鶻」者，多達十八條³⁸，茲為節省篇幅，此處僅列舉以下數條，以供參考：

1.西元 933 年（遼太宗耶律德光天顯八年，後唐明宗李嗣源長興四年）六月（中國農曆），「回鶻阿薩蘭來貢」。雖然文字作「來貢」，其實只是遣使通好而已，甚至還含有窺視之意，但中國歷代王朝或政權，向以「天朝」自居，對周邊國家來使向稱之為朝貢使，雖有時明知來者僅是商賈而冒稱使者，仍以朝貢使視之，以滿足自大心理。

2.西元 940 年（遼太宗會同三年、後晉太祖石敬瑭天福五年）二月，遼所遣「墨离鶻末里使回鶻阿薩蘭還，賜對衣勞之。」遼朝之派使者赴阿薩蘭回鶻（按即喀喇罕王朝），顯然是對 933 年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具有回聘性質，當然也具有要進一步遼解喀喇罕王朝的用意。

3.西元 971 年（遼景宗耶律賢保寧三年、北宋太祖趙匡胤開寶四年）二月，遼「遣鐸遏使阿薩蘭回鶻」，此一使阿薩蘭回鶻，上距派墨离鶻末里出使，已有三十一年，這期間必然雙方還有使者往來，只是《遼史》未載，但不能以此斷定雙方沒有聯繫，正如文獻未載日蝕、月蝕、地震，就說未發生日月之蝕與地震。按遼朝自耶律阿保機薨後，太子耶律倍（時已被封為東丹國王）不能順利嗣位，而由耶律德光嗣位，從此遼朝皇位繼承，始終形成問題，因此可能史傳疏於記載與喀喇罕王朝往來詳情。此後在遼景宗保寧五年（993 年）五月、保寧十年（978 年）二月，阿薩蘭回鶻都曾遣使到遼朝。

4.西元 988 年（遼聖宗耶律隆緒統和六年、北宋太宗趙炅端拱元年）二月，「阿薩蘭回鶻來貢」，同年閏五月，又有使來貢，此後在統和七年、八年、九年、十四年（996 年）、二十三年（1005 年），開泰四年（1015 年）阿薩蘭回鶻均曾遣使到遼朝，雙方來往頗為綿密。

5.在遼興宗耶律宗真重熙年間（重熙共有二十四年，1032~1055 年），於重熙十四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阿薩蘭回鶻均曾遣使到遼朝。

6.遼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 年在位）咸雍四年（1068 年）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

³⁸ 見註 36 所引書頁 148~150。

從上引《遼史》所載阿薩蘭回紇（實際即喀喇罕王朝，不過喀喇罕王朝建立不久，即分為東、西兩部分，一般文獻稱之為東、西喀喇罕汗國，與中國北宋、遼王朝接觸的，都是東喀喇罕汗國）與中原北宋與遼朝都有所接觸，史蹟斑斑可考。但當北宋、遼南北對峙時，在西北部有党項羌所建之西夏橫亙於東喀喇罕汗國東來之路，按西夏是時控制河西走廊，乃西域東來必經之路，東喀喇罕汗國如欲進入中原，勢必要通過河西走廊，觀乎其與北宋及遼朝之綿密往來，當可推測，其與西夏應有相當的友好關係，否則西夏不會輕易放行東喀喇罕汗國使者進入宋境或遼壘，惜乎在既有文獻中，有關此方面的記載極少，只在《宋史》、《宋會要輯稿》中有零星記載，大陸學界先進魏良弢先生從浩瀚史料中，摘出東喀喇罕汗國與西夏有關聯之記載，茲將之酌為整理引錄如下：

1.西元 1082 年（西夏惠帝李秉帝大安八年、北宋神宗元豐五年），西夏西南都統昂星蒐名齊致北宋涇原總管劉昌祚之書函中稱：「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為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鬥，雖十年豈得休哉！」（《宋史·夏國傳》下），此處稱于闐（即東喀喇罕汗國）為「歡鄰」，可見其關係應處於和睦狀態。

2.西元 1083 年五月十九日，「（宋）熙河蘭路制置司使言：「西賊犯蘭州，破西關，虜略和雇運糧于闐人並橐駝。詔虜略于闐人畜，令制置司優恤之。」」（見《宋會要輯稿·蕃夷四》，又制置司應即制置使，唐時有此官職，掌經畫邊防軍務之官員。宋不常置，神宗以後，多以武臣出任此官），這條史料中所謂「西虜」乃指西夏言，但從其中：「虜略于闐人畜」句看似乎西夏與東喀喇罕汗國處於敵對狀態，與前一年西夏自稱于闐為其「歡鄰」，似有矛盾。

3.西元 1093 年（西夏崇宗李乾順天祐民安四年、北宋哲宗趙煦元祐八年），《宋史·于闐傳》載：「（于闐）請討夏國，不許。」似乎西夏確實與東喀喇罕汗國交惡，是則十年前西夏「虜略于闐人」，確有其事。雖然當時西夏逞強於宋朝的西北，以言實力，並無法進入西域攻掠于闐，所謂「虜略于闐人畜」者，極可能是東喀喇罕汗國東來興販之商賈，路經西夏所控制之河西走廊時，為西夏所劫掠（這其中又可能因「關稅」問題談不攏而予以沒收，就于闐而言，就是劫掠）。

4.西元 1097 年（西夏崇宗天祐民安八年，北宋哲宗紹聖四年）二月八日，《宋會要輯稿·蕃夷四》載：

「（于闐）遣使入貢（北宋），押伴所申進奉人羅忽都盧麥譯到黑汗王子言：緬葯家作過，別無報效，已差人馬攻甘、沙、肅三州（今甘肅張掖、敦煌、酒泉）。詔押伴使臣：候人使朝辭日，諭以黑汗王忠向朝廷，甚喜，若能破三城，必將厚待。」

從此條史文看，東喀喇罕王朝似已向東擴張而與西夏接壤，遂有「已差人馬攻甘、沙、肅三州」之說詞，此僅口頭說法而已，以當時東喀喇罕王朝之實力，似也無法率軍渡漠東來，其來使所以如此說者，顯然希望宋朝能出兵西征討伐西夏，為其肅清東來興販之障礙，然而北宋自與遼朝「澶淵會盟」後，早已偃武修文，是以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 年）東喀喇罕王朝請討西夏時，宋朝不許，國際政治原本就是爾虞我詐，只謀求本身利益，不過也從而可見東喀喇罕汗國與西夏之關係，時好時壞，但其商業經貿關係始終不斷。

四、結語

回紇是中國境內一支與華夏民族同樣源遠流長的古老民族，而回紇汗國與唐朝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西元 840 年回紇汗國被黠戛斯攻破後，回紇部落四處逃亡，部分逃入唐境，久之，自然融入唐人之中，其逃往甘州、西州者稱甘州、西州回紇，五代時向中原王朝進貢，或許屬實，但龐特勤所率之回紇進入天山以南各綠洲，更向今中亞發展，建立喀喇罕王朝，其時不論五代或北宋，在中國歷史上均屬弱勢朝代，能閉關自守，已屬不易，更別談開疆拓土、威服西域，因此喀喇罕汗國（或稱王朝）與北宋毫無隸屬關係，《宋史》所載于闐進貢之說，只是「史家虛榮心作祟，與史實不符。」

不過稍後，十二世紀初葉，遼朝被女真金朝攻滅後，有遼宗室耶律大石者，率少許部眾，到漠北原遼屬地徵集數萬兵馬，轉而經高昌回紇（即西州回紇）進入西域，建立西遼王朝（西方文獻均稱之為喀刺契丹），威服東、西喀喇罕王朝，將之納為版圖，按西遼乃遼朝之延續，《遼史》也

載有耶律大石事跡，其為中國史之一部分，應毋庸置疑。至於西喀刺罕王朝，則自始至今均與中國沒有隸屬關係，但由於西喀刺罕王朝之立國中亞，自是有許多回紇人進入中亞，遂形成跨境民族（或稱跨國、跨界民族），雖然與中國境內的維吾爾族同種同文同宗教信仰，但已不算是中國民族，在此要特別對「中國民族」作一說明：自從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一詞，孫中山採用作為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統稱後，「中華民族」就成為定稱，就人數居絕對多數的漢人而言，固然毫無疑問的接受了此一詞彙，而「中華」等同「華夏」，於是衍生出華夏乃炎黃之胄的說法，但據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五帝本紀》所載，黃帝之功勛時稱：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東至于海，…西至於空桐，…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對於上引「葷粥」一詞，歷代史家考定即是秦漢時之匈奴，是則匈奴之先實與黃帝同時存在之民族，此實無庸置疑者，匈奴之先既與黃帝之華夏族為同時代之民族，其不為華夏之胄，其理自明，而與匈奴同時生息於中國北方草原、森林地帶之丁零系（或作敕勒）、東胡系、肅慎系諸民族，同樣也不能成為炎黃之胄，此也不爭之實，換言之，秦、漢以後活躍於中國北境之匈奴、丁零、鮮卑、柔然、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各民族，均非華夏之族，今日中國東北、北部、西部之諸多民族如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其族源與上述諸民族在血胤上都有直接或間接關聯，強之為中華之族炎黃之胄，很難令其「欣然」接受，此也事所當然理所必然之事。況且自先秦時代即有「華夏」與「夷狄」（泛指非華夏之各民族）」對立的兩組名詞，有所謂：「夷狄入於華夏則華夏之，華夏入於夷狄則夷狄之」，顯見華夏與夷狄是兩組血源不同的民族，此乃史實，無需諱言，也無從否認。

不過華夏系民族（最初之華夏系民族，至少是華系與夏系兩個族群的融合體）具有很大的吸納性，對於民族的界定，認為文化重於血緣，所以才有「夷狄入於華夏則華夏之」的說法，所以秦漢之後，漢朝之人（也即最早期的漢人），已經含括了華夏系、東夷系、百越系及荊吳系四大族群（任何一本中國民族志或民族史之專著均作如此認定），越往後代所謂漢人，其內含越多元，其情況如下表，此也不爭之實：

歷代漢人內涵表

| 時代 | 漢族之內涵 |
|------|----------------------------|
| 秦及兩漢 | 華夏系東夷系荊吳系百越系。 |
| 隋唐時代 | 兩漢時之漢人、匈奴、羯、鮮卑、烏丸、少部分之氐、羌。 |
| 兩宋時代 | 隋唐時代之漢人、部分契丹、渤海、沙陀。 |
| 元明時代 | 兩宋時之漢人、契丹、女真、若干中亞之人、蒙古人。 |
| 清代至今 | 元明時之漢人、女真、若干維吾爾族。 |

今日漢人內含既然如此複雜，其中華夏成份已然少之又少，此乃無可爭議之事實，如仍強調其為華夏之族炎黃之胄，似有名實不符之嫌。

自西晉八王之亂後，北方胡族以匈奴之劉淵首掀胡族建立漢魏式政權之序幕，之後各胡族紛紛起而效尤，命王稱帝建元立號者，約有二十個之多，其國號仍以傳統方式為主，如自認系漢室外甥、繼承蜀漢而立國之匈奴族劉淵其國號即為漢（後其族子劉曜奪得帝位後，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此對劉淵而言，頗不公平，以稱漢趙較為妥適），其餘多以所處地理方位為國號，如前後趙，五個燕（前、後、北、西、南），三個秦、五個涼，以自認係夏后氏遺裔而號夏、立於代為代、立於故魏地（韓、趙、魏三家分晉之魏）號、立於蜀地者為成漢……均未脫傳統立號方式，從無以胡族名為國號，可見各胡族雖建立政權，仍以中國傳統建元立號，諸胡列國有為之君，莫不以統一中國為其奮鬥目標，如氐族前秦苻堅曾稱：

「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哺。」（見《晉書·苻堅載記下》）

且再看契丹族所建之遼朝（係我國正統王朝），遼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 年在位，當北宋仁宗，至徽宗）向往中國傳文化，曾「詔求乾文閣所缺經籍，命儒臣校讎」以及在位時頒《五經傳疏》（見《遼史·道宗、本紀》），其本人也聘請學者講論儒家經典，但學者每以夷、夏之虞、遇相關文句時，如「夷狄之有君，不如……」往往疾讀而不敢詮釋，相關文獻有如下之記載：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拱之，道宗曰：『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檢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³⁹

可見縱是胡族所建之政權或王朝，並不自外於中國，更以中國自居，且從另一面向看，從周秦、漢唐，以至兩宋元明清，乃至今日海峽兩岸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未以「中國」為正式國號，因此「中國」一詞，文化、歷史的含義遠大於政治含義，較之「中華」更為中性，也更能為邊疆少數民族所接受，此因「中國」不帶華夏、夷狄含義，邊疆地區少數民族既非華夏後裔，強稱之為中華民族，未必能使之心悅誠服地接受，但中國係境內各民族共建構而成，各民族都是中國國族構成之一份子，猶如美國境內之早住民族印地安人、歐裔、黑人、亞裔，今日統稱之為美國人，因此筆者在多篇文章中均主張易中華民族為中國民族，以增進國內各民族之和諧，並凝聚中國國族向心力。

³⁹ 見洪皓《松漠紀聞》，洪皓，宋時人，於南宋高宗趙構建炎三年（1129 年）出使女真金，被拘十五年始還，期間多據傳聞載錄金朝政事；於南宋高宗紹興間（1131~1162 年）由其長子洪適編刊，有正續二編；南宋孝宗趙昚乾道年間（1165~1173 年）其次子洪遵又增補所遺十一事，以洪皓所留之冷山為唐松漠都督府，故題為《松漠紀聞》。又晚出之葉隆禮《契丹國志》，也載有此事。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牛奶靠人擠出來，莊稼靠人種出來（維吾爾族）

馬、牧人的翅膀（柯爾克孜族）

管不好牛羶，喝不上酸奶（哈薩克族）

騎馬需要韁，捕魚需要釣竿（蒙古族）

善事可做，惡事莫為（壯族）

山不轉路轉，影不歪人歪（景頗族）

惡鳥不能當黃鸞，惡狼不能當家狗（壯族）

寒冬不凍勤勞人，五荒六月吃糯團（瑤族）

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壯族）

錢財不會生仔，汗水泡看全碗（哈尼族）

人懶雜草壯，人勤莊稼子（彝族）

要想長久富，不怕吃大苦（壯族）

如果沒有才德，位高只是羞恥（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略述唐代之胡樂與胡舞

章維淳

前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摘 要

國史上最開放的朝代，莫過於唐代，此或與其創建者李氏一族具胡漢混融血統有關，兼以太宗時威服突厥，於是心胸大開，對於外來文明多予接納，包括西域胡族、胡物、胡樂、胡舞、胡繪畫…等，莫不予接納，如一一詳述，非一部專書無法詳述，本文僅就唐代之胡樂與胡舞（僅限於西域部份）如康國樂、龜茲樂…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酌加敘述。

關鍵詞：胡樂、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

壹、李唐先世

李唐先世諸史冊如《冊府元龜》、兩《唐書》、《北史》及《晉書》均有記載，但若論詳細，則以《新唐書》卷七十上之《宗室世系》所載最為詳細，此表稱：

「（李）歆字士業，西涼後主。八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宣皇帝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祖光皇帝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日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周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次曰太祖（虎），次曰乞豆。」

上引《新唐書·宗室世系表》將李淵之祖先李虎向上直推至西涼後主李歆，兩《唐書·高祖記》在李熙「後魏金門鎮將」下稱「率豪傑鎮武川，因家焉。」李歆係李暕之次子。《北史》卷一〇〇《序傳》更將李暕一族世系向上推至漢初李廣，不僅如此，更將隴西李廣一系無限上推至遠古傳說時代之顓頊高陽氏¹，如此說可信，則《楚辭》屈原曾稱：「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是則李廣又與屈原同源共祖，頗難使人置信。

就兩《唐書》所載，姑認為不誤，則李淵之世系為：

李暕→李歆→李重耳→李熙→李天賜→李虎

李虎生八子，其季子曰李暕，李暕生四子，其長曰李淵，是李淵為李暕之八世孫（含李淵），此一世系經陳寅恪引《宋書》考證，李熙當即《宋書》所稱北魏太武帝拓拔燾（424～452 年在位）時任北魏弘農（因避北魏獻文帝拓拔弘名諱，改稱恆農）太守之李初古拔，其有子稱李買得²，此二人之名，均帶有「胡味」，後李買得為南朝宋軍攻北魏金門鄔時（李買得時為金門鄔戊主）被殺（李初古拔當不止李買得一子），時為 450 年（北魏太武帝拓拔燾太平真君十一年，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二十七年），李初古拔（即李熙，或許唐得天下之後，改去帶「胡味」初古拔，而名之為熙），陳寅恪氏甚至懷疑根本沒有李重耳其人³，另者兩《唐書》所載李氏世系，係「出自李唐皇室自撰之譜牒」（見前引陳著書頁 183），自稱李唐一族源自隴西，事實上李唐一族縱然本姓李氏，也非族出隴西，而是趙郡李氏弱族，考魏晉南北朝時，漢人庶姓冒稱華族，殊非罕見，如北齊創建者高歡（其是否漢人已有疑問）一族也冒稱渤海高氏（渤海高氏乃望族），縱若北方草原胡族，也往往冒稱華夏之胄，如匈奴劉淵自稱夏后氏之苗裔，鮮卑慕容廆冒稱高辛氏之遺胤等⁴，是則李唐一族之冒稱源自隴西望族李氏，藉以炫耀系出名門，不但攀上西涼武昭王李

¹ 今人周偉洲早年曾撰有《魏晉南北朝時隴西李暕一族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202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 2015 年 6 月，頁 1-18。

² 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局，2001 年，頁 184～189。按此書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合輯，實際為頁 1～6。

³ 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196。

⁴ 見崔鴻《十六國春秋》台北中華書局，1974 年，頁一正面。

鬲，更上追漢代名將李廣，也就不足為異，縱然時至今日全中國乃至旅（僑）居海外之李姓之人，其堂號仍多為「隴西堂」，李唐一族非源自隴西，已是定論，既非族出隴西，則其所列歷代世系，自李重耳（甚至並無此人）以上概屬不可信者，而李熙原姓名為李初古拔，完全是胡人之名，其孫李虎在北周（其時雖稱西魏，但實權已操諸鮮卑宇文氏之手）時，曾被賜姓「大野」氏，「大野」當係胡語之漢字音譯，其意已不可考。一般而言，帝王之賜姓，不外賜予帝王之姓，以示優寵，或恢復其原有之姓，如北周建立隋朝之楊堅姓「普六茹」氏，蓋鮮卑原有普六茹氏，但賜李虎姓「大野」氏，既非北周之國姓，而鮮卑並無大野氏，則此項賜姓頗有令人不可解者，或者李淵一族原非漢人，但冒姓李氏，而名則仍維持胡名「初古拔」，此種情形，常見於西域粟特胡族來華之後，也往往冒用漢姓，但其名往往仍用胡名，則李初古拔不無可能是北方草原某一胡族，故朱熹門生所著《朱子語類》卷一一六《歷代類》三就直指：

「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

朱熹係宋代大儒，作此論斷應不致憑空杜撰，必有所本；如再進一步看，李淵之母為獨孤氏，其為鮮卑族無疑，李世民之母（也即李淵之皇后）為竇氏，即鮮卑紇豆陵氏，《魏書·官氏志》稱「次南紇豆陵氏，後改為竇氏。」舊《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引《柳芳氏族論》也直指「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首之。」可知代北竇氏確為胡姓⁵，李世民之后，即高宗之母長孫氏也係鮮卑姓，因此陳寅恪稱：

「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⁶

陳寅恪此論是姑認李氏為漢人，而其所指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稍嫌攙統，直言之其女系母統均為鮮卑血胤，如是，李氏染有鮮卑族習俗，乃是極自然之事，但太宗初所立太子李承乾則染有濃烈之突厥習俗，其情況為：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又使戶奴數十百人習音聲，學胡人推

⁵ 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台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頁175。

⁶ 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183。

髻，剪綵為舞衣，…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選貌類胡者，披以羊裘，辮髮，五人建一落，張氈舍，造五狼頭纛，分戢為陣，繫幡旗，設穹廬自居，使諸部斂羊以烹，抽佩刀割肉相啗。承乾身作可汗死，使眾號哭勞面，奔馬環臨之，忽復起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貞觀十七年…廢為庶人，十九年死。」⁷

按李承乾之母長孫氏，祖母紇豆陵氏，曾祖母獨孤氏均為鮮卑族，李承乾之染有突厥風，應與其女系母統無關，而李承乾本身經歷也與突厥無涉，但其所為或所嚮往者完全是突厥生活模式，這種現象或許來自父系（其父、祖均已為人君，自然要避免任何胡族生活習俗，蓋所統天下乃以漢人為主體），或可成為返祖現象；上項引文中之「使眾勞面號哭」，這種勞面之俗又稱「殘破軀體」（Acrifaction），係源於塞種⁸之習俗，以塞種人分布於廣義之西域，與其相鄰之敕勒系（或作丁零、鐵勒）各民族（如突厥、高車、回紇…等）也染有此習。李承乾既無突厥經驗，何由得知此等突厥習俗，有理由懷疑其能操突厥語言、好突厥習俗等，是從家族中習得，至於引文中提到：「使我有天下，將數萬騎到金城，然後解髮，委身思摩，當一設…」，此處思摩，乃指阿史那思摩，按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派大將李靖攻滅東突厥後，置北寧、北撫、北安、化、順、豐等大河南北六羈縻州以為安置，至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廷改變對東突厥降部安置政策，冊立阿史那思摩為可汗，以統東突厥降眾返漠南，游牧自贍，而阿史那氏為創建突厥汗國之氏族，世娶阿史德氏族女子為可敦（可汗之妻稱可敦，此一稱號一直沿用到蒙古帝國），自此阿史那、阿史德氏族始終為突厥貴族。而「設」係突厥汗國之官名，其位僅次於小可汗或葉護，擁有統兵之權，地位重要，出任此職者，必須出身阿史那氏族

⁷ 見《新唐書》卷八十《常山王承乾傳》，台北鼎文書局，頁3564。台灣各書局所出版標點本二十五史，皆為北京中華書局所出而據以影印。

⁸ 塞種係中文史料之用詞，西方史料則稱之為薩迦（Saka），斯基泰（Skuthoi）或西敘亞（Scythia），屬高加索（即俗稱之白種）族分布於亞洲者，其中又分為許多民族，詳見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法人格魯塞著、魏英邦譯《草原帝國》，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書。

⁹，李承乾居然宣稱：使我有天下，委身（阿史那）思摩當一設，顧不快邪！，試想堂堂大唐太子，未來的君王，竟願委身屬國突厥當一設，可以想見其對突厥潛意識存有莫大嚮往，而此種嚮往應係由家族中傳來，但其女系母統既全為鮮卑，自不可能傳下突厥習俗與對突厥之嚮往，如是極可能來自父系，李虎曾被賜為「大野」氏，鮮卑並無「大野」氏族，但敕勒族十二部中有大連氏，「大野」不無可能為「大連」一詞之訛譯，如是則李唐一族可能源自敕勒族，突厥、回紇、黠戛斯、薛延陀…均屬敕勒系民族，語言、習俗均無差異，苟如是則李承乾之慕突厥風，可說是其來有自，當然此一看法只是筆者個人私心之見，尚缺乏任何有力之證據，不過李唐皇室雜有北方胡族血胤，則是無可爭議者，以是有唐一代對胡族文明向採開放態度，也為不爭之實。

貳、入唐胡樂

西域胡樂東傳來華，並非始於唐代，早在東漢西域胡樂已開始東傳來華，至隋唐而大盛，以隋祚短暫，通常以唐為代表，按龜茲向以優美之音樂為世所稱道，而廣義之西域（指今新疆以西錫爾河、阿姆河兩河一帶）昭武九姓諸國之粟特人皆好音樂，《新唐書·西域傳下》載：「（昭武諸國皆）好歌舞于道」，自北朝至隋唐有大量昭武九姓粟特人來華，其音樂也隨之東傳，如舊《唐書音樂志》載：

「後魏（按即北魏，也作拓拔魏、元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于商人，世傳其業，至其孫（曹）妙達，尤為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

「曹婆羅門」者，係指來自西域昭武九姓曹國，中國習慣對外國來人，以其國為姓，如來自曹國者姓曹，來自米國、康國、安國、何國、史國、石國…高句麗、高麗者姓米、康、安、何、史、石…高，其為大月氏人則以支為姓，來自天竺（即印度）以竺為姓，是可知曹婆羅門、曹妙達係來自西域昭武九姓之曹國。至北齊後主高緯時，其人更好西域胡樂，據《隋書·音樂志》載：

⁹ 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20～121。

「（北齊）後主唯賞胡戲戎樂，耽愛無已。于是樂多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

可見北齊時（550～577 年）對西域音樂之喜愛，及至隋代官方認定之九部樂中，屬於西域胡樂就有：西涼、龜茲、康國、疏勒、安國五部（其餘四部為：清樂、天竺、高麗及禮畢，其中天竺、高麗仍是外國音樂），及至唐代，更增加為十部，這十部為：

燕樂
清商樂
西涼樂
天竺樂
高麗樂
龜茲樂
安國樂
疏勒樂
高昌樂
康國樂

這十部之中，除了燕樂、清商樂是中國傳統音樂之外，其餘八部都是非中國傳統音樂，而來自西域的胡樂有六部之多，唐朝可以說是一片胡人的音樂。燕樂、清商樂雖為中國傳統的「雅樂」，所謂「雅樂」是指帝王祭祀天地、祖先以及朝廷舉大典或宴會時所奉的音樂，照道理說應該是樂壇中的「祭酒」，演奏者理應具有崇高地位，然而事實卻非如此，在唐時是以技術拙劣者演奏雅樂，據《新唐書·禮樂志》所載：

「（玄宗時）又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¹⁰，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

可見在唐玄宗時是以技術不佳的樂工（其實是演奏者，應稱樂師較為

¹⁰ 太常，官名，掌宗廟祭祀、禮樂及文化教育之官。秦時稱奉常，西漢景帝後改稱太常。

合適），從堂上的坐部伎降為堂下的立部伎，如果還不堪調教，則使之習雅樂，可見其時雅樂之衰微，這種情況令人感嘆，詩人白居易曾對此種情況頗不以為然，特以詩諷之曰：

「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¹¹

雅樂之所以衰微，與其節奏緩慢、單調有關，唐代講究快速多元，雅樂不能適應時代需要，只能趨於沒落，即使在宴會時所演奏的燕樂，也多以胡樂為主，飲宴時總是喜歡聽些輕鬆的曲子，肅穆凝重的雅樂向來只能用於祭祀的場域。因此胡樂遂成為唐代主流的音樂。

胡樂，尤其是來自西域的胡樂，既成為唐代的「國樂」據舊《唐書·樂志》所載其情況為：

「自周(指宇文氏之北周，551~581 年)隋(581~619 年)以來，管玄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皆時俗所知也。」

從此項記載，可知唐代的流行樂曲，都是西域胡樂。西涼一地約當今甘肅省武威一帶，古稱涼州，以其他處中國西部，故俗稱西涼，雖也算內地，但諸胡列國時（也即一般所稱之五胡十六國時代），曾經有五個以涼州為中心的政權，而且也以「涼」為國號，後代史家為了有所區隔，分別稱之為前涼、西涼、後涼、北涼及南涼，除前涼張氏、西涼李氏為漢人所建外，後涼為氐族呂光所建、北涼為瀘水胡沮渠蒙遜所建¹²、南涼為鮮卑秃髮部所建，且其勢力多及於西域，尤其後涼氐族呂光於征西域凱旋東返時，聞前秦苻堅已死，乃立國河西，其自西域東返時，帶回諸多西域音樂（含樂器、樂曲乃至樂師），因此西涼樂者雖以西涼為名，其內涵實以西域胡樂為主，此所以舊《唐書·音樂志》稱：

¹¹ 見白居易《立部伎》

¹² 一般史書多以沮渠氏為匈奴，實則不然，沮渠氏係瀘水胡，而此胡之族源與月氏族有關，漢初月氏西遷者，史稱大月氏，其仍留南山與群羌雜處者稱小月氏，沮渠氏與此部分有關，可參見劉學鈞《五胡史論》台北南天書局，2001 年，頁 66~73。

「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也。」

此處所謂「羌胡」，羌自指西羌而言，而「胡」則指西域胡，蓋自秦漢以來，「胡」乃專指匈奴而言，但自北魏(386~584年，之後分裂為東西魏)太武帝拓拔燾於431年(神䴥四年)攻滅匈奴赫連氏之夏後，「胡」字轉而專指西域各族而言，因此西涼樂幾乎就可以等同於西域胡樂，現在同樣據舊《唐書·音樂志》所載有關《西涼樂》的編制情況：

「《西涼樂》工人平巾幘(幘，音則，包頭之布)，緋褶(褶，音蝶，意為夾衣)。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缺。方舞四人，假髻，玉支紉，紫絲布褶，白大口褲，五彩接袖，烏皮鞋。樂用鐘一架、磬一架(磬，音磬，以石或玉製成之古樂器，其形曲折如矩。)、彈箏一、掐箏一、臥箏篴一、豎箏篴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貝一。編鐘今亡(編鐘已遺失)。」

同書對《龜茲樂》的編制則為：

「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褲。舞者四人，紅抹額，緋襖，白褲帑，烏皮靴。樂用豎箏篴一、琵琶一、五弦琵琶一、笙一、橫笛一、簫一、篳篥一、元員鼓一、都曇鼓一、答臘鼓一、腰鼓一、羯鼓一、雞婁鼓一、銅鈸一、貝一。毛員鼓今亡。」

從上引記載看，《西涼樂》與《龜茲樂》等西域胡樂，帶來了許多種西域樂器，如箏篴、琵琶、篳篥、羯鼓…等，豐富了中國音樂的內涵，當然這些西域樂器早在東漢時就開始陸續東傳，唐代集其大成，這些西域胡族樂器進入中國，使中國的音樂添增了更多元的色彩，姑以今日中國各地方戲劇(包括京劇)各種角色演唱時，主旋律都是「胡琴」，所謂「胡琴」就是胡人之琴，即此一點，就可想見胡樂對中國音樂、戲劇影響之大。

提到唐代的音樂，最負盛名者應是《霓裳羽衣曲》，此曲進入主調前先奏數遍純器樂的「散序」，此乃漢地傳統的清商大曲，之後的主調則是來自西域的《婆羅門曲》，具有鮮明之異域情調，至於此曲之來源，傳說

頗多，據《新唐書·禮樂志》曾稱：有道士羅公遠者，於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夜，于宮中賞月時，折下一支桂花向空中一拋，化為一道銀色長橋，唐玄宗與楊貴妃乃踏上銀橋步入月宮，但見仙女數百，披素雅長帶而舞，舞姿曼妙；據傳此舞就是《霓裳羽衣舞》，有音樂伴奏，唐玄宗精通音律，暗中將音律默記在心，返回後卻忘記其半，但仍使樂工就所記得之一半加以排練。之後，唐西涼(涼州)都督楊敬述雖為突厥墩欲谷所敗，但掠契必部得《婆羅門曲》獻於朝廷，其曲調與玄宗在「月宮」中所聽之「仙樂」相同，於是玄宗遂將其在「月宮」中所聽到者稱為《散序》，而把楊敬述所獻之《婆羅門曲》合而稱之為《霓裳羽衣舞曲》，此所以白居易曾有詩詠之：

「我者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千哥百舞不可數，
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
者顏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披步遙冠，細纓纍纍佩珊
瑚，娉婷似不任羅綺。…楊氏創聲君造譜…¹³」

詩中「楊氏創聲君造譜」，就是指楊敬述獻《婆羅門曲》一事；與白居易同時代之劉禹錫也有詩詠此事，其詩云：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
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
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¹⁴

這兩首詩給《霓裳羽衣舞曲》蒙上神秘色彩，實際上只是唐玄宗把自己創作的一部與楊敬述所獻的《婆羅門曲》融合起來的中西合璧的舞曲，《婆羅門曲》源出於天竺(即印度)，即廣義之西域(今中亞兩河地區)，唐

¹³ 見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列《全唐詩》頁 4970~4971，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詩中「元和」係唐憲宗李純年號共三年(825~827 年)。「步搖」，係婦女首飾之一種，上有垂珠，走動時則搖動，故稱步搖，初行於貴族婦女，後也流行於民間。

¹⁴ 見劉禹錫《三鄉驛樓伏觀玄宗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一詩，列《全唐詩》頁 3999，詩中開天子指唐玄宗「開元」為其第二個年號，共二十九年(713~741 年)。「三清」，係道家術語，認有人、天兩界之外，另有三清。又有二說，一為玉清、太清、上清，是神仙居住之仙境，一為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清微。也有老子微上清太上老君、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天上道君，是為三清。又佛教也有以如來之真身、法身、極身此三身作三清。

玄宗開元時再傳中土，日人遠藤實夫於其所著《長恨歌之研究》一書，曾指出《婆羅門曲》乃印度祀神舞餘香案鈎欄前之舞曲，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認為此項「相比擬或不致謬」¹⁵，不過文學作品求美似乎更甚於求真，留有帶神話的色彩，豈不添增想像空間，更具美感。唐代音樂之盛，據《新唐書，禮樂志》稱：

「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雜戶子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¹⁶

就今天來看，似乎還沒有一個國家的交響樂團、合唱團人數多達數萬人之多，可見盛唐國家經濟力之盛。再就《樂府雜錄》一書中，就曾記載不少音樂家，如「歌唱家」(即所謂音聲人)條列有載元和、長慶(係唐穆宗李恆年號共四年 821~824 年)以來有米嘉榮、何戡；俳優條(演員、舞者)載弄參軍有曹叔度，弄婆羅門有康迺、石寶山；枇杷條載員中元(德宗李適年號共二十一年 785~805 年)有康崑崙、曹保、子曹善才、其孫曹剛；咸通中(懿宗李瓘年號共十五年 860~874 年)有米嘉榮子米和；箏篳條載文中(宣宗李忱年號共十四年 847~860 年)以來在汴洲有史敬約等數人¹⁷，這些人都是來自西域(今中亞)昭武九姓諸國，當時大唐堪稱是世音樂之都，另《太平廣記》引《盧氏雜說》更載有：

「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元和中(元和，憲宗李純年號共十五年 806~820 年)，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陳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唱。」(轉引自陳海濤、劉惠琴所著書)

唐詩人劉禹錫對米嘉榮就讚賞有加，有《與歌者米嘉榮》一詩：

「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

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¹⁸

¹⁵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頁 24~25。

¹⁶ 見《新唐書》卷二十二《禮樂志十二》

¹⁷ 見《樂府雜錄》四庫本，子部，但此處係轉錄自陳海濤、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華粟特人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347。

¹⁸ 見《全唐詩》頁 4116~4117。

劉禹錫另有一首《與歌者何戡》詩：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

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¹⁹

上述曹保、曹善才、曹剛祖孫三代，均為操琵琶之高手，享有盛名，白居易於唐憲宗李純元和十年(815 年)左遷九江司馬，次年秋，送客湓浦口，至江邊正待話別時，忽聞船中有人夜彈琵琶，由是「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並「移船相近邀相見」，樂天為此作有《琵琶引》一詩(一般多稱之為《琵琶行》)，其中彈琵琶之女子：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

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

句中之「善才」應即指曹善才而言，曹氏係西域昭武九姓胡族，而此夜彈琵琶之女子，自言其家在京城(長安)，幼居蝦蟆陵下，據傳蝦蟆陵為漢董仲舒墓，其門人適此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後人訛為蝦蟆陵，或許為教坊中人之謬傳，因此這一位彈琵琶之女子，其為教坊中人，且善琵琶，或本為酒家中之胡姬，及至老大只得嫁為商人婦，很可能只是外室。至於曹善才，唐詩人李紳(?~846 年，元和進士，與元稹、李德裕合稱三俊)曾在曲江聆曹善才等二十人演奏琵琶等樂曲，之後曹善才歿，李紳追憶曹善才琴藝，而有《悲善才》一詩之作：

「穆王夜幸蓮池曲，金鑾殿開高秉燭。東頭弟子曹善才，

琵琶請進新翻曲。…銜花金鳳當承撥，轉腕攏弦促揮抹…聞到

善才成朽骨，空餘弟子奉音徽。…惆悵追懷萬事空，雍門感慨

徒為爾。」²⁰

至於唐代詩人詠西域的胡族樂師之詩作者頗多，如白居易《聽曹剛琵琶兼示重蓮》²¹，薛逢《聽曹剛彈琵琶》²²，元稹《琵琶歌》²³，劉禹錫

¹⁹ 見《全唐詩》頁 4118。

²⁰ 見《全唐詩》頁 5465~5466。

²¹ 見《全唐詩》頁 5060。

²² 見《全唐詩》頁 6334。

²³ 見《全唐詩》頁 4629。

《曹剛》²⁴等，都可在《全唐詩》尋得，此處不予一一引錄。

除上引這些來自西域昭武九姓胡族樂師外，另有一個也是西域胡人叫「何滿子」，不僅是人名，其人來自昭武九姓之何國²⁵，故以「何」為姓，「滿子」可能為「蠻子」的訛譯。而且也成為樂曲的名稱，元稹《何滿子歌》：

「何滿能歌能婉轉，天寶年中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
水調哀音歌憤滿。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成恩羈網破。便將何
滿為曲名，御譜親題樂府纂。…以下甚長，略」（見《全唐
詩》頁4632-4633）

宋郭茂倩所編輯《樂府詩集》曾收錄唐白居易《何滿子》一詩：

「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
從頭便是斷腸聲。」

白居易自題注釋：

「何滿子，開元中滄州歌者，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得
免。」

而《杜陽雜編》也稱：

「文宗時（李昂，827-840 年在位），宮人沈阿翹為帝舞
《何滿子》，調辭風態，率皆宛暢。」²⁶

從而可見《何滿子》不但是歌曲，同時也是舞曲。除此之外，還有善於婆羅門之米禾嫁、米萬槌、曹觸新；善歌唱者康洽；善箏策者安萬善；優伶何懿、曹贊、米都知、石野豬、安響新以及其名不詳之曹姓女樂師等²⁷，這些樂師從姓氏者，即可知其族源係來自西域昭武九姓米國、曹國、安國、何國、石國，可見唐代以開闊的心胸，接納外來的文化，本來文

²⁴ 見《全唐詩》頁4127。

²⁵ 見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匯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76-183。

²⁶ 見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八十，頁1133。

²⁷ 以上散見於《樂書》、《全唐詩》、《新唐書》、《因話錄》等書，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海濤、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唐代入華粟特人研究》一書，頁349。

學、藝術追求的是美，只要是合乎美的，理論上都應該接納，如果堅持所謂固有的、傳統的，最後必然落得抱殘守缺的下場。

叁、唐代胡舞

音樂與舞蹈類如連體嬰，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向來能歌善舞，而西域諸胡族尤其如此，中亞兩河地區（廣義之西域）粟特人或昭武九姓諸國，尤其位處印度、巴比倫、希臘、中國諸文明交匯地區，吸納各文明形成西域多元而絢麗的文明，西域音樂，就是以輕快的節奏，活潑的曲調，亮麗的歌聲，多元的樂器伴奏下，令中國人早已進入冬眠的音樂細胞甦醒，一時西域胡樂成了唐代的流行音樂。音樂與舞蹈就像雙胞胎一樣，當音樂（含歌聲）響起時，軀體自然隨著樂音的節奏而蠕動，這就是舞蹈的起始，舞蹈的動作快慢和幅度，往往隨著音樂的節奏而調整，但是有時音樂的節奏要配合舞蹈的律動，音樂和舞蹈始終是彼此互動，而且和諧、完美。上節所提到《霓裳羽衣舞曲》原就是舞曲，是以舞蹈為主，樂曲只是配合舞蹈，其後因舞蹈失傳，留下舞曲，所以今人多稱《霓裳羽衣曲》而漏掉了「舞」字²⁸。另外，上引《何滿子》也是既可唱也可舞的舞曲。

西域胡舞東傳來華，應早在東漢季世，據史傳所載：

「（東漢）靈帝（劉弘，168-189 年在位）好胡服、胡樂、胡飯、…京師（洛陽）貴人爭競為之。」

既有胡樂傳入，胡舞也必隨之而來，只是零星來華未能成為氣候，及至諸胡列國時（即五胡十六國，但以其時既不止五種胡族，其所建之政權，也不止十六國，稱諸胡列國較為周延），西域昭武九姓諸國人大量來華，音樂、舞蹈、宗教乃至飲食習慣也隨之東傳，至唐代達於鼎盛，最為世所習知者，則為《胡騰舞》、《胡旋舞》及《柘枝舞》，由於舞蹈乃是動態的藝術，古代沒有錄影設備，無法將其動態的舞蹈保存下來，只能依照繪畫保留其霎那間的姿態，詳細的舞姿則透過文人以文字描述始能知其梗概，但如想憑此等有限素材，想完全復原唐代從西域傳來胡舞的全貌，應係「不可能的任務」，不過在無可如何情況下，既有之文獻與圖像，或

²⁸ 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直指《霓裳羽衣曲》應有「舞」字為是。

多或少仍可探索出唐代西域胡舞之若干形貌，如詩人元稹《曹十九舞綠鈿》一詩（鈿，多指婦女首飾，如花鈿、金鈿）：

「急管清弄頻，舞衣饒攪結。含情獨搖手，雙袖參差列。
驪裏柳牽絲，炫轉風回雪。凝眄嬌不移，往往度繁節。」²⁹

詩中「驪裏」，「驪」音咬，「驪裏」意為千里馬、神馬。詩中以「含情獨搖手，雙袖參差列」來形容這位來自西域昭武九姓曹國名「十九」的女孩，她的曼妙舞姿，這位曹十九姑娘，陳寅恪先生懷疑可能是「曹九九」的誤植，並進一步認為曹九九是崔鶯鶯原名的諧音³⁰，如是，則元稹所撰《鶯鶯傳》的女主角竟是來自中亞昭武九姓的胡族女子，而且很可能是酒店的胡姬，關於這一部分，可參見陳寅恪之《讀鶯鶯傳》³¹，以陳氏之博學及治學之嚴謹，若無相當論據，當不致作此推測，果而陳氏之說可信，則元稹（此人原係鮮卑族，是北魏太武帝拓拔燾之第十一代孫）是個很早發生「異國戀」的例子（張騫、蘇武雖均曾娶胡族女子為妻，但那是娶妻生子，談不上戀愛），但由於曹九九出身微賤，而唐代社會講究門閥，元稹為仕途順遂，不得不始而亂之，終則棄之，為後代《西廂記》作了張本，關於崔鶯鶯為曹九九，又是西域胡族女子，想來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這位曹九九（崔鶯鶯）想必光艷照人而歌舞雙棲，因而使元稹流連忘返。當然這只是題外。

大唐有詩仙之譽的李白，對一位來自西域昭武九姓大國康國胡人的歌舞極為賞識，以一首《上雲樂》對他的歌舞做了近乎白描的敘述，全詩雖長，仍值得詳讀，因為李白讓西域胡舞透過文字躍然紙上，全詩如下：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戍削骨風。碧玉炁炁雙目瞳（炁，音窘，明亮之意），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不睹詭譎貌，豈知造化神。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

²⁹ 見《全唐詩》頁4638。

³⁰ 見葛承雍《唐韻胡音與外來文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4。

³¹ 該傳輯入陳著《元白詩箋證稿》頁100-109。

出谷，顧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頽洪荒，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四海動，紅濤為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唱。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或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傾萬歲杯。」³²

此詩完全不守格律平仄的約束，但是卻又渾然天成，末幾句似是展開一幅幅生動的舞蹈卷軸³³，舍詩仙能如此不遵格律，而又能讀來使人迴腸蕩氣。詩中「跪雙膝，立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呈現的是柘枝舞，胡旋舞的舞姿，前一首曹十九（或為曹九九或即崔鶯鶯）詩的「腰裏柳牽絲，炫轉風回雪」則很明顯的胡旋舞。一般人對唐代的胡舞多以胡旋舞、柘枝舞及胡騰舞為代表，茲分別介紹如次：

一、胡旋舞

胡旋舞，顧名思義是指西域胡人旋轉之舞蹈，這只是漢人就其舞姿給予的名稱，在昭武九姓諸國的粟特語裡稱為 *Xwcy*，音譯之為胡施，漢字同音的字很多，其舞重點在旋轉，所以音譯兼意譯之為「胡旋」，在粟特語中其本意為「漂亮、上佳」³⁴。關於胡旋舞，白居易有一首《胡旋女，戒近習也，天寶末康居國獻之》，說明此舞出之康居，按康居乃漢代之名，唐時據其地者乃昭武九姓之康國，考其地在今中亞薩馬爾罕一帶，雖然白居易詩稱，天寶末康居國獻胡旋女，事實上昭武九姓諸國都流行胡旋舞，白詩對此舞之舞姿有頗深入的描述：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迴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人間物

³² 見《全唐詩》頁 1687。

³³ 見陳海濤、劉惠琴《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頁 354。

³⁴ 見龔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科出版社，1998 年，頁 255。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海濤、劉惠琴所著書頁 357。

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胡旋者，鬥妙爭能爾不如，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帳下養為兒。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茲地軸大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轉，數唱此歌悟明主。」³⁵

與白居易交稱莫逆之元稹（微之），號稱「元白」，另有劉禹錫也與元、白交好，此三人之所以有特殊交情，極可能與其族源都為北方或西域胡族有關，白居易族出西域，至其父白季庚仍沿昭武九姓近親為婚之習，白季庚娶其姪女為妻（也即白居易之堂姊），生白居易；元稹係鮮卑拓跋燾之後人，而劉禹錫則為南匈奴之遺胤（南匈奴在東漢季世，其單于一係多改姓劉氏，如劉淵、劉曜，赫連勃勃原也姓劉，其父為劉衛辰，渠原姓名為劉勃勃，建立夏政權後，自認為「繫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³⁶歲改姓「赫連氏」，因而「赫連」並非匈奴語，仍為漢語），唐朝社會雖較任何時代都為開放，但對是否華夏之胄，仍頗重視，如創見唐朝之李淵一族，仍千方百計託稱為西涼王李暠之後，奠定北齊之高歡，也冒稱出身渤海高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為胡族之裔，為當時社會所習知者，想冒稱華裔貴胄，勢不可能。但此三人文學造詣，在當時都屬一時之選，但一談到民族血緣時，仍不免被漢人視為「非我族類」。因此元、白、劉三人自成一小團體，經常詩酒酬唱。元稹也有一首《胡旋女》：

「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胡旋之義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傳。蓬斷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盤大輪炫。驪珠併珥逐飛星，虹暈輕巾掣流電。潛鯨暗喻笪波海，回風亂舞當空霰。萬過其誰辨終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觀者相為言，承奉君恩在圓變。是非好惡隨君口，南北東西逐君眄。柔軟衣身著佩帶，裴回繞指同環

³⁵ 見《全唐詩》頁4692-4693。

³⁶ 見《晉書·赫連勃勃載記》，另崔鴻《十六國春秋·夏錄》也載有此語，台北中華書局，1974年，頁一背面。

釧。佞臣聞此心計回，焚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為鉤，君言好直舒為箭。巧隨清影觸處行，妙學春鶯百般轉。傾天側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見。翠華南幸萬里橋，玄宗使悟坤維轉。寄言旋目與旋心，有國有家當共譴。」³⁷

元、白這兩首《胡旋女》似乎把玄宗安史之亂歸咎於胡旋舞，這顯然是不正確的，玄宗以李林甫為相，李林甫欲久居相位，遂鼓動玄宗以胡族為地方邊將，宣稱胡族能征善戰，一旦擢為將帥，必會感恩圖報，忠心為國，按唐初以來多以文人為將帥，雖也用胡族為將，但皆非主帥，待主帥立功之後，則可入朝為相，此所謂出將入相，李林甫欲久居相位，乃建議以胡族為將帥，為邊地節度使，而胡族拙於翰墨，自不可能入朝為相，玄宗惑於開元盛世，遂採李林甫之議，一時之間大量起用胡將為邊地節度使，安祿山一時領四個節度使，天寶後之衰弱，實肇端於此，再加上寵幸楊貴妃，以其兄楊國忠為相，楊國忠又與安祿山不和，遂埋下安祿山謀叛之心，與胡旋舞毫無關聯，雖則以胡旋舞作為安史之亂之代罪羔羊，但在兩詩中仍可看出胡旋舞的舞姿，而且有弦、鼓這兩種樂器伴奏，當弦鼓響起時，舞者高舉雙袖，然後是不停的向左或者向右旋轉，似乎跳胡旋舞的多為女性，然而也有男子善於此舞，如白居易詩中有「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句。可見並非沒男子跳胡旋舞，白、元二人是從批判角度描述《胡旋舞》，雖也描述到此舞旋轉的姿態，但對此舞精采之處似未觸及，與白、元同一時代但稍早而有邊塞詩人之稱的岑參（715-770年），生經玄宗開天盛事與安史之亂，但他並沒有責怪胡旋舞，或許他觀賞胡旋舞時，尚未發生安史之亂，純粹以欣賞者立場描述此舞，他有一首《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鋌歌》，他所欣賞的舞顯然就是胡旋舞，且看岑參如何描述此舞：

「美人舞如蓮花旋，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滿地宏艷氈，試舞一曲天下舞。此曲胡人傳入漢，諸客見之驚且歎。慢臉嬌娥纖復穠，輕羅金縷花蔥蘢。回裾轉袖若飛雪，左鋌右鋌生旋風。琵琶橫笛和未匝，花門山頭黃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白

³⁷ 見《全唐詩》頁4618-4619。

草胡沙寒颯颯。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見回回新。始知諸曲不可比，采蓮落梅徒聒耳。世人學舞祇是舞，姿態豈能得如此。」³⁸

詩中對舞者舞姿讚譽有加，而且對伴奏的樂曲，更是誇讚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認為漢地傳統的名曲《采蓮》、《落梅》等，如與之相比，只會讓人覺得聒噪而已，岑參這首詩完全從正面描述胡旋舞，「輕羅金縷花蔥蘢，回裾轉袖若飛雪」對旋轉的舞姿作了生動的描述。在這首詩中提到舞者是在「高堂滿地宏氍毹」上跳。氍毹，就是毛毯之意，也就是說跳胡旋舞是在一塊毛毯上跳，據《新唐書·禮樂志》載：

「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轉如風。」（毯，同球，此處作圓形毛毯解。）

《新唐書》所載與岑參所見正相同，但其實況究竟如何，僅憑文字敘



述，終究不夠真切，所幸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二十窟壁畫有胡旋舞圖，雖是靜態，但已然等同看到胡旋舞「停格」實況，茲將該圖附錄如左，該圖係線描圖，係摘自陳海濤、劉惠琴所著《來自文明十字路口的民族》理合書明，並對該書作者表示謝意。

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二十窟開鑿年代，據考證約為唐初，該窟北壁藥師佛淨土變下方有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 年）供養人題記³⁹，北壁中央有四個舞伎起舞的經變圖，南壁樂舞圖中也有兩個舞伎，其型態舞姿基本無大差異，而且舞者都是女性，頭上或戴冠或束高髻。上身半裸或全裸、束腰，背着釧、頸戴項圈，手握長彩帶、赤足，從彩帶呈飛揚狀態可以想見

³⁸ 見《全唐詩》頁 2057。

³⁹ 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文物出版社，1986 年，頁 102，但此處係轉自陳海濤、劉惠琴所著書頁 361。

其身體正處於旋轉之中。雖說在既有文獻中，胡旋舞的舞者似乎都是女性，但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鹽池縣發掘一座可能是唐代何姓墳墓，以其墓葬形制，墓主應為來自西域，昭武九姓何國，墳墓中兩扇石墓門上有浮雕男子舞蹈圖像，以其舞姿研判，認為也是胡旋舞⁴⁰，這是較為罕見的。胡旋舞雖源出西域昭武九姓之康國，但傳入中土後，形式上有所改變，這是文化傳播或移植必不可免的自然現象，原來在康國或其他昭武九姓諸國的胡旋舞舞者多為二人，但傳入中土後，從既有唐人文獻中所載，似乎都是獨舞，不過楊貴妃與安祿山似曾共舞過胡旋舞。同時在伴奏的樂器上，也呈多元化，有弦樂器、管樂器以及打擊樂器。

二、胡騰舞

胡騰舞一如胡旋舞，是音譯兼意譯，據學者考證認為是粟特語 *rwtm* 之音譯，其本意為「後裔」（見龔方震，晏可佳《祿教史》），是耶非耶？仍有待進一步考究，胡騰舞顧名思義是以跳躍為主，唐詩人劉言史曾在友人王中丞(官名)府邸親睹胡騰舞，而寫下一首《王中丞夜宅觀胡騰》，對此舞作出詳細的描述，全詩如下：

「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
細氎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萄盞，西顧乎思鄉路遠。跳身轉
軋寶帶鳴，弄腳繽紛錦靴軟。四座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徧頭
促。亂騰新毯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
槿花面見殘月。」⁴¹

詩中石國，係昭武九姓之一，在今中亞塔什干一帶，而「塔什」其意即為「石」，而「干」係「城，鎮」之意，昭武九姓之多戴尖頂帽，詩中稱「蕃帽虛頂尖」，氎，音跌，細棉布。蒲萄，今作葡萄。從詩中可看出在起跳之前，舞者先飲一盞葡萄酒，然後拋下酒盞，開始騰跳並轉動身

⁴⁰ 見陳海濤、劉惠琴所著書頁 362。

⁴¹ 見《全唐詩》頁 5323~5324，劉言史，邯鄲人，今河北省邯鄲市，與李賀同時，也與孟郊善，其詩美麗恢瞻，自李賀外，世莫能比。王中丞即王武俊，王中丞奏為棗強令，辭不就，世稱劉棗強。棗強，今河北省衡水市棗強縣。

軀，兩腳交互騰跳，屬於運動量相當大的舞蹈。另詩人李端⁴²也有一首描述胡騰舞之詩《胡騰兒》：

「胡騰身是涼州兒，肌膚如玉鼻如錐。桐布輕衫前後卷，
葡萄長帶一邊垂。帳前跪作本音語，拾襟攪袖為君舞。安西舊
牧收淚看，洛下詞人抄曲與。楊眉動目踏花氍，紅汗交流珠帽
偏。醉卻東傾又西倒，雙靴柔弱滿燈前。環行急蹴皆應節，反
手叉腰如卻月。絲桐忽奏一曲終，鳴鳴畫角城頭發。胡騰兒、
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⁴³

詩中涼州係今甘肅武威，但在詩中泛指西域，因此「涼州兒」是指西域尤指昭武九姓胡，所以其面貌是「肌膚如玉鼻如錐」，在起跳知前先說一段胡語，其內容或許是說明舞蹈緣起，說完才開始跳。作中有唐安西舊官員含淚觀看，此蓋唐盛時在西域設有安西四鎮，但時置時廢，至唐玄宗時，高仙芝敗於坦拉什後，昭武九姓諸國完全被阿拉伯所佔領，唐朝力量遂全面退出今中亞地區，因此詩中安西舊牧看到涼州胡兒跳胡騰舞，緬懷往日光榮，不禁落淚。西域的丟失，流落中國的西域胡騰兒是否知道自己母國已經陷落了？所以發出了「胡騰兒、胡騰兒，故鄉路斷知不知？」之歎。李端其實不瞭解，昭武九姓胡從來不戀故土，唯利是計，史稱康國之人：

「行多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生子必以密食口中，以膠置手內，欲其成長口嘗甘言，持錢如膠之粘物。習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送他國，來過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至。」⁴⁴

昭武九姓諸國唯康國馬首是瞻，康國如此，其餘石、米、史、何、曹、安…等國人，也莫不如此，並無戀土情結，李端為之歸鄉無路而嘆息，顯係多餘。李端詩雖以胡騰兒為名，但述及胡騰舞姿者並不太多。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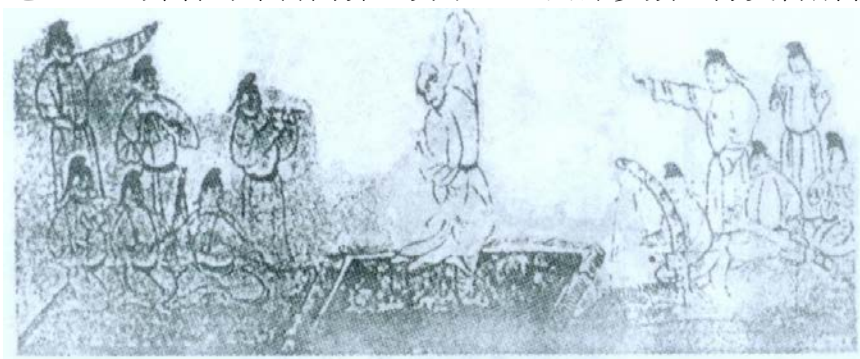
⁴² 李端，字正己，趙郡人，代宗李豫大曆五年(770年)進士，與吉中孚、錢起、苗發、盧綸、崔峒、司空曙、韓翃、夏侯審、耿瑋等詩文酬唱，號大曆十才子，官杭州司馬卒。

⁴³ 見《全唐詩》頁3238。

⁴⁴ 見宋玉溥《唐會要》卷九十九《康國條》，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1774。

騰舞以其動作激烈，舞者多為男子，從既有文獻尚未見到女子舞胡騰者。

除上引兩首唐詩描述到胡騰舞外，在唐代昭武九姓移民墓室中之壁畫，也有留下胡騰舞之圖像，今陝西省西安市東郊唐蘇思勗墓室有一幅樂舞壁畫(見附圖，摘錄陳海濤、劉惠琴所著書頁 365)，立於畫面中間部位地毯上之舞者為深目高鼻之男子，且面部多鬚，據史傳所載，西域昭武九



姓諸國男性之體質特徵為「深目高鼻多鬚」⁴⁵，其為西域九姓胡無疑，舞者頭

包布巾，身着長袖衫，袖長過手，左手高舉，腰繫黑帶，兩邊有九位樂師伴奏，左右各有一人伴唱(舉手臂者)，舞者似是跳躍後落地的狀態，據學者考證認為就是唐詩中所描述之胡騰舞。

從上引劉言史的夜觀胡騰詩開頭就說：「石國胡兒人見少，蹲舞尊前急如鳥。」，似是說明胡騰舞源於石國，石國即今中亞塔什干一帶地方。唐時(含以前)石國人都戴很高的尖頂帽，身穿細布窄袖的長袍，腳穿柔軟華麗的棉靴，為了跳舞時的需要，其衣袖加長了許多，而且在開跳前會以其母語作一段道白，記得上世紀末期，有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國家級藏族舞蹈應邀來台灣演出，在正式表演前，也由該團一位演員向觀眾以藏語說了一段話，與胡騰舞有其相似之處。

三、柘枝舞

柘枝舞，顧名思義出自柘枝，而柘枝就是石國，據《新唐書·西域傳下》所載：

「(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

按大宛，今費爾干那盆地，其北就是塔什干一帶，另對安國之記載則

⁴⁵ 見《晉書·石季龍載記》

有：

「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

西域昭武九姓諸國語文相同，柘羯乃是勇健之士，漢初匈奴盛時，曾入西域裹脅若干西域「柘羯」東返，集中為部落，簡稱之為「羯」，使之聚居今山西上党武鄉某地，遂號其地為「羯室」，後代史家不查，乃稱羯族為「匈奴別部羌渠之胄」⁴⁶，此實為倒果為因之說，實則諸胡列國時代之羯族(建有後趙)石氏，其族乃源乃西域昭武九姓之石國，也即柘枝。是則可知柘枝舞乃是來自柘枝(石)國，但宋人郭茂倩於其所編輯之《樂府詩集》《柘枝詞》小引中稱：

「一說曰：《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字後訛為柘枝。沈亞之賦云『昔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命佳人以繼態。』然則似是戎夷之舞。按今舞人衣冠類蠻服，疑初南蠻諸國也。」⁴⁷

按郭茂倩乃南宋時人(南宋 1127~1279 年)，去唐已遠，其所見之柘枝「舞人衣冠類蠻服」，乃宋時舞柘枝者之衣冠，不能據以推定唐(或以前)時柘枝舞者之衣冠也類蠻服，因此郭氏疑柘枝出南蠻諸國，乃是不可信者。另《圖書集成，樂律典》卷八十八《舞部》引又稱「柘枝」一詞，由(鮮卑)拓跋氏而得名，遂以為：

「舞柘枝之本出拓跋氏之國(拓跋氏建代及北魏)，流傳誤為柘枝也，其字相近耳。」⁴⁸

此說以拓跋、柘枝字相近，遂以柘枝本出拓跋，實純出臆測，「拓」與「柘」容或相近，「跋」與「枝」豈能混淆？且拓跋氏所建之北魏(或作拓跋魏、元魏、後魏)，其威名播於西域，由是西域(含今中亞)有以「拓跋」稱中國者，又將「拓跋氏」訛讀為「桃花石」，是以西域諸多文獻中之「桃花石」一詞均指中國而言⁴⁹，與柘枝毫無關聯。再看《樂府

⁴⁶ 見《晉書·石勒載記》

⁴⁷ 見《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818。

⁴⁸ 轉引自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98~99。

⁴⁹ 見邱處機門弟子李志常所述之《長春真人西遊記》，台北中華書局，1974年，頁十

詩集》輯有薛能《柘枝調》三首：

「同營三十萬，震鼓伐西羌。戰血黏秋草，征塵攬夕陽。歸來人不識，帝里獨戎裝。

懸軍征柘羯，內地隔蕭關。日色崑崙上，風聲朔漠間。何當千萬騎，颯颯貳師還。

意氣成功日，春風起絮天。樓臺新邸地，歌聲小嬋娟。擊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⁵⁰

從上引第二首「懸軍征柘羯」句，已經明白指出是西域的石國，何況末句「颯颯貳師還」中的「貳師」指的是漢武帝命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遠征西域大宛，欲得汗血馬，其所以封之為「貳師」將軍者，以大宛都於貳師城，意在必得大宛寶馬，因此「貳師」乃是音譯大宛語，與字面上的意義毫無關聯，可見柘枝舞源於西域，與南蠻無關。不過《樂府詩集》所稱「今舞人衣冠類蠻服」，可見柘枝舞傳入中國後，舞者衣冠已有所改變，此乃文化或文明傳播或移植過程中，必然產生之現象，何況南宋上距盛唐已有二個多世紀，舞柘枝者衣冠乃至舞姿之有所變化，都是無可避免者，但不可以宋代柘枝舞者之衣冠或舞姿，認定就是唐代的衣冠與舞姿。

現在且看唐代詩人劉禹錫⁵¹如何形容柘枝舞，詩題為《觀柘枝舞二首》：

「胡服何葳蕤，僊僊登綺墀。神飆獵紅葉，龍燭映金枝。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翹袖中繁鼓，傾眸遡華棖。燕秦有舊曲，淮南多冶詞。欲見傾城處，君看赴節時。山雞臨清鏡，石燕赴裊遙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華烟。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處，層波猶注人。」⁵²

詩中「葳蕤」意為：紛紛垂下。「僊僊」，僊音仙，僊僊意為舞時飛

背面「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調漢人也」。

⁵⁰ 見《樂府詩集》頁 818。

⁵¹ 劉禹錫（772-842 年），字夢得，彭城人，但實係匈奴遺胤，唐德宗李適貞元九年（793 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官至集賢殿學士，出任蘇州刺史，與白居易，元稹交稱莫逆，時相酬唱，有《劉夢得文集》傳世，兩《唐書》均有傳。

⁵² 見《全唐詩》頁 3972。

揚狀。詩中「垂帶覆纖腰，安鈿當嫵眉。」是說在女性舞者纖細腰肢繫上長長的腰帶（意為舞時將會隨舞飛揚），頭上插著安國的金花，益增嫵媚（安鈿，作安國之金花解，是否確切，有待指正），這也足以說明柘枝舞確實源於西域昭武九姓。

唐詩人張祜⁵³有四首有關柘枝的詩，茲以《周員外席上觀柘枝》：

「畫鼓拖環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金絲蹙霧紅衫薄，
銀蔓垂花紫帶長。鸞影乍迴頭並舉，鳳聲初歇翅齊張。一時歎
腕招殘拍，斜欽輕身拜玉郎，」⁵⁴（歎，音噓，忽然之意）

詩中「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指舞柘枝女子的衣著式樣，「紅衫薄」、「紫帶長」，可以想見一旦舞動起來是輕衫飄浮，紫帶飛揚，此等舞姿何其曼妙。白居易也有一首《柘枝詞》如下：

「柳闇長廊合，花深小院開。蒼頭鋪錦褥，皓腕捧銀杯。
繡帽珠稠綴，香衫袖窄裁。將軍拄毬杖，看按柘枝來。」⁵⁵

與白樂天交稱莫逆的劉禹錫對這首《柘枝詞》，以《和樂天柘枝》為題和了一首：

「柘枝本出楚王家，玉面添嬌舞態奢。鬆鬢改梳鸞鳳髻，
新衫別織鬥雞紗。鼓摧殘拍腰身軟，汗透羅衣雨點花。畫筵曲
罷辭歸去，便隨王母上煙霞。」⁵⁶

從劉禹錫詩中可見柘枝舞是以鼓聲為節奏，而且動作雖不似胡旋舞般激烈，但也有相當的運動量，所以才會「汗透羅衣雨點花」。從以上所引幾首唐人有關柘枝舞的詩中，可以發現舞柘枝者多是妙齡女子，所穿著的上衣多是薄衫，舞時隨著動作或半脫肩、或汗水滲透羅衫有如雨點花般，此情此景可說是風情萬種，唐長安青綺門外多胡姬酒店，店內除胡姬殷殷勸酒外，也應有胡姬表演柘枝舞，無怪乎唐代文人但凡阮囊尚豐，都會到胡姬酒店買醉並領略異域風情，李白似乎就常到胡姬酒店買醉，如他的一

⁵³ 張祜，字承吉，以宮詞得名，清河人。

⁵⁴ 見《全唐詩》，頁 5827。

⁵⁵ 見《全唐詩》，頁 5053。

⁵⁶ 見《全唐詩》頁 4067。

首《白鼻騮》：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⁵⁷

由於柘枝舞動作並不十分激烈，所以許多漢人女子也學著跳，一些豪門高官宅邸也豢養著柘枝舞伎，因此柘枝舞也在全國各地漸見流行，杭州也有舞柘枝者，如張祜有一首《觀杭州柘枝》：

「舞停歌罷鼓連催，軟骨仙娥暫起來。紅罨畫衫纏腕出，碧排方胯背腰來。旁收拍拍金玲擺，卻踏聲聲緊襖催。看著遍頭香袖褶，粉屏香帕又重隈。」⁵⁸

可見柘枝舞已經流行到江南了。至於柘枝舞舞姿究竟如何？盧肇於其《湖南觀雙柘枝舞賦》有頗詳細之描述：

「乍折旋以赴節，復婉約而含情。突如其來，翼爾而進。進每當節而必改，乍慘舒而復振。驚顧兮若嚴，進退兮若慎。……旁睨兮如慵，挽視兮如引。縹緲兮翔風，婉轉兮游龍。……歌扇兮才斂，鳴鞞兮更摧。將騰躍兮激電，赴迅速知驚雷。……來復來兮飛燕，去復去兮驚鴻。善睠睢眄，偃師之招周妓；輕軀動蕩，蔡姬之讐桓公。」⁵⁹

這一段文字以辭賦體敘述柘枝舞姿，就文字而言固然極美，但仍失之抽象，不過從上引文字中仍可看柘枝舞與胡旋舞有其不同之處，而且吸納了許多中國舞蹈的元素，因此廣受中國人士的喜愛，關於這一點，可從《全唐詩》中看出，詠柘枝舞者，遠多過詠胡旋舞或胡騰舞，其次舞胡騰者，幾乎都是西域昭武九姓男性胡人，舞胡旋者，雖多為西域胡族女子，但已經有中國女姓學跳胡旋舞，如前引白居易之詩稱：「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至於柘枝舞，則幾乎都是中國女子舞之，而且在

⁵⁷ 見《全唐詩》頁 1709。關於唐代文人與胡姬酒店，可參見劉學銑《胡姬酒店笑店笑春風，盛唐詩人勤走動》一文，該原刊《中國邊政》季刊，後輯入劉著《國史裡的杳見》，台北唐山出版社，2014 年，頁 227-246。

⁵⁸ 見《全唐詩》頁 5827。

⁵⁹ 見《圖書集成·樂律典》，但此處係轉引自陳海濤、劉惠琴所著書頁 372。

舞蹈之末，也都羅衫半袒，秋波引人。復次，柘枝舞既可獨舞，也可兩人對舞，謂之「雙柘枝」，柘枝舞一直流傳到宋代，如北宋寇準(961-1023年)就很喜愛柘枝舞，據有關文獻稱：

「寇萊公性豪奢，所臨鎮燕會(同宴會)，常至三十醞，必盛張樂，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連數醞；方畢，或謂之柘枝顛。」⁶⁰

當然宋代的柘枝舞與唐代之柘枝舞必然已有所不同，可能更徹底中國化了，據考證可能自五代十國時(907-979年)開始流行婦女裹腳，因此宋代的柘枝舞，其舞姿必然有所改變，兼以在思想上理學家(或作道學家)當道，講究天理人欲，柘枝舞曲終半袒以及臨去秋波可能也沒了。

唐代除了盛行上述三種西域胡舞外，當時民間還流行一種「脫渾舞」，此舞也是來自西域，舞者出場時，著彩色衣服，騎著高大的馬，各自拿著旗幟，當鼓聲響起後，這些舞者下馬，戴起面具，此時將衣服逐件脫下，直到赤裸為止，然後彼此往對方身上潑水，一方面要把水潑到對方身上，另一方面又要閃躲不讓對方把水潑到自己身上，形成彼此追逐、閃躲，而且這種遊戲都是在冬季舉行，所以又稱「乞寒」，又因表演者都是西域胡族，因此又叫「潑寒戲胡」。

脫渾舞舞時(也即彼此追逐、閃躲)，也配以音樂，稱之為「蘇幕遮」，唐中宗李顯就頗欣賞這種舞，曾在上元(正月十五，今稱元宵)親到宮城的門樓觀賞，如果站在力與美的角度看渾脫舞並無甚麼不妥，只是中國有些守舊的士大夫認為這種赤身裸體的舞蹈傷風敗俗，便上奏朝廷請加以禁絕，唐玄宗時確曾下令禁止，雖然如此，民間仍然私下在隆冬中進行這種舞蹈，可見西域胡族的舞蹈滲透到漢人社會中相當普遍。至於「蘇幕遮」樂曲，或作「蘇莫遮」、「颯磨遮」、「蘇摩遮」，原是梵語，從天竺傳回西域，再由西域傳入中土，後世引申為詞牌名，唐時由龜茲傳入，唐代詩人張說曾有詩標題就是《蘇摩遮》，從詩中可看此曲之由來，原詩共五首如下：

⁶⁰ 見《石林燕語》此處係引自陳海濤、劉惠琴之書頁 373，另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103 也載此事。

「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寶眼紫髯鬚。聞道皇恩遍宇宙，
來將歌舞助歡娛。
繡裝帕額寶花冠，夷歌騎舞借人看。自能激水成陰氣，不慮今年寒不寒。
臘月凝陰積帝臺，豪歌急舞送寒來。油囊取得天河水，將添上壽萬年杯。
寒氣宜人最可憐，故將寒水散庭前。惟願聖君無限壽，長取新年續舊年。
昭成皇后帝家親，榮樂諸人不比倫。往年霜前花委地，今年雪後樹逢春。」⁶¹

張說(667-730 年)，生於唐高宗乾封二年，經武則天的周、而中宗、溫王(李重茂，僅一年)、睿宗李旦而至玄宗，前後六主，也就是正當盛唐，蘇幕遮都在流行，也就脫渾舞也在流行，其後因唐宋理學家興起，以衛道為辭，此舞遂絕。現代日本還流行在冬季成年男子僅著丁字褲在冷水中嬉戲，祝賀成年，此俗是否由唐傳入日本，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按日本許多文化習俗都承襲自唐朝。

肆、結語

西方著名史家湯恩比於其巨著《歷史研究》中曾提出人類文明都依循：誕生、茁壯、成熟、死亡這四個階段發展，如以之衡量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印加文明、馬雅文明乃至希臘文明，都正確無誤，但如以之檢驗中國文明，則失去準頭，這並不表示湯恩比學說錯了，而是湯恩比不了解中國或中國民族是古往今來許多民族共同融合建構起來的民族聯合體，在融合的過程中，是彼此吸納互相包容形成不同時期的漢人越至晚近漢人的內涵越是多元，不像其他古文明民族(或國家)對不同民族採取趕盡殺絕徹底消滅方式，因此中國或中華文明也曾經面臨死亡階段，如：諸胡列國(五胡十六國或五胡亂華)、遼金西夏、蒙元、滿清這幾個時期，都憑其能包能容的精神，渡過死亡的危機，以新的面貌及更多元的內

⁶¹ 見《全唐詩》頁 982。

涵邁向未來，因此中國民族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這正是所謂：泰山不讓土乃能成高，河海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這一點是西方學者永遠不會瞭解的，此所以中國或中華文明不會墜入誕生、茁壯、成熟、死亡的歷史命定。

隋唐承諸胡列國、南北朝之後，北方漢人經過幾個世紀與胡族混融，以全新的面貌邁進七世紀，隋唐的創建者楊、李二族縱非源自北方胡族，也是胡化很深的漢人，這就如同近人劉大杰所說：

「自五胡亂華到隋唐統一的那幾百年(「五胡亂華」一詞頗不妥適，古今往來從無任何律法規定，中國大地必須由華夏為統治者，如有胡族命王稱帝建元立號，則稱之「亂華」，稱諸胡列國較為中性)，是漢胡民族血統大混流時代，…到了唐代，這種新民族算是醞釀形成，無論人民的氣質，藝術的風格，都呈現出一種新型態新力量來，把這種新民族的精力，反映於政治軍事或是文學各方面，自然都會產生出一種強烈的創造精神與動人的光彩。」⁶²

此所以唐代能以開闊的心胸吸納西域的胡樂、胡舞，使中國的音樂、舞蹈放出異彩，洗盡六朝的鉛華靡曼，參以伉爽健美，使唐代樂舞成為國史上最炫麗燦爛的時代，至今仍有部分保留在日本，想探尋唐代樂舞，似乎要到日本去「取經」，或許這也算是禮失求諸野吧。

⁶² 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台灣中華書局，1963年，頁276。

《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摘 要

〈寒字檔〉中有五十一頁的漢文敕諭，所記載全是清初建州女真建國時期的戰陣封賞記事。以往有學者認為其僅為滿文的「漢文翻譯」，致未能注意其實際含意。由該檔案的種種特徵觀察，所記述的內容相當古老原始，判斷這份敕諭檔的記事年代，應該發生於建州女真與扈倫四部戰爭時期，即早在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一年（己亥-癸丑，1599-1613）間，錄案時間長達十五年，而非《滿文原檔》目錄所標示的後金天命九年（甲子，1624）當年。所持理由有以下五點：一、用紙不同。該檔冊完全採用高麗箋紙，並未採用天命六至九年（辛酉、壬戌、癸亥、甲子，1621-1624）這四年間最常用的明朝公文舊紙。二、漢前滿後。敕諭文字違反滿文為主的慣例，而以漢文在前，滿文在後方式排列。推測係因漢文紀錄為原始母本，俟滿文發展實用後，藉機翻譯為滿文，以迎合當時政治、文化情勢。這類編排方式，在《滿文原檔》中可說絕無僅有。三、用語特殊。用詞有「占本身」、「五刃之錄」等罕用術語，頻頻出現。以「刃」代替銀「兩」，與滿文發音「兩 yan」十分相似，「錄」與滿文發音「罪 uile」相當接近，「占」字與滿文「吃錢糧」的「吃 jembi」字音義互通等，可看出其用語頗具民族性。四、地緣關係，有「中一箭」、「死了」、「刺二鎗」等戰損資料，地點遍及烏拉、哈達、輝發、葉赫等四部各個不同戰場，其細緻處，

似非事後於天命九年時僅憑記憶所能追記。五、同名異字。地名之中例如烏拉有記為兀喇、兀刺者，輝發有記為迴扒、迴法者，宜罕阿麟（ihan alin）城戰事都會標示地名「義哈阿里」或「亦哈阿嶺」等，同名、同音、異字，不一而足。從以上這五種現象可以推測，檔案的登載雖非長篇大論，卻也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能為，而是歷時十五年，經由多人集體創作後的成果。以致這份敕諭封賞資料的產生年代，僅以最早消滅哈達之戰發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來算，就比《滿文原檔》以滿文記錄史事的起始時間點明萬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1607年），還早了八年，說來相當珍貴。該漢文敕諭記事其實反映了，在滿文開發成熟前，建州女真極可能長期以漢字記事，而非目不識丁、僅憑腦力回憶的野人。惟女真漢文的語用、語法，皆有其獨特脈絡，不盡與漢人語言相同。因此要理解女真式漢語，尚需藉由滿文，反推其含義，始能免於費解。

關鍵字：〈寒字檔〉老滿文 敕諭 斷限 女真式漢語

壹、前言

《滿文原檔》中的〈寒字檔〉，是一份相當特殊的檔冊。頁面上除了具備豪邁奔放，灑脫亮麗的老滿文之外，還穿插了不少漢字。

這些漢字可說別具一格，讓人一眼就看得出來，字字出於清初滿人之手。因為這些字形外觀有筆法幼嫩、忽大忽小、上下不齊等明顯特徵，看來漢文造詣不高，甚至相當生澀，與當時《滿文原檔》記史時所採用明代遼東各衙門舊公文紙上，留存由漢人書吏所寫的工整小楷很難相比。

對於這些滿人撰寫的漢字，以往的研究不多。然由於這些漢字與同頁面書寫的滿文之間，有著對譯的關係。因此以往有學者判斷，說這些漢字是由滿文翻譯而來：

第九冊，原編寒字，故宮編第十六冊。自清太祖天命九年

(甲子)正月起，至同年六月止。(本冊中記事部分時間紊亂無序)內編九十九號，共計一百四十二頁。明代舊公文紙書寫，無圈點老滿文。(部分記事旁有漢文翻譯)，冊縱四七公分，橫三六·六公分。¹

以上這段文字，摘自廣祿、李學智所撰〈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一文項下，屬於「滿文原檔簡目」中的內容。文中認為老滿文的「部分記事旁有漢文翻譯」。意思是說，這些漢字是由撰寫滿文的巴克什，²嘗試著將老滿文翻譯成漢文時所為。也就是二者的主從關係，是以滿文為主，漢文為輔。

不過仔細觀察五十一頁全文多遍之後，就發覺廣祿、李學智所言，有些與事實不符。因為這些文字，毫無例外的，都是以漢前、滿後的次序編排。就是敕諭文字並未採用《滿文原檔》中滿文為主的慣例，反而將漢文安排在前，滿文跟隨在後的方式，看來相當特殊。根據一般慣例，翻譯時常常依先來後到順序，將原文放在前面，譯文擺在後方，才能方便對照閱讀。如果要將主從顛倒，那就得提醒讀者留意，加上特別註解才行，否則難免誤會。然而〈寒字檔〉並沒有在這方面做任何標示，因此廣祿、李學智的所言，是否確實為真，就需要詳加驗證了。

貳、實例考析

為了便於討論這個議題，現從〈寒字檔〉裡摘出了一些例子，來看看這些所謂的「漢文翻譯」，到底有什麼特徵：

例一

漢文、皇帝敕諭厄一都。³

滿文 1、○ han hendume, eidu baturu enculeme siulge bujan be gaiha, bardai hoton be gaiha, sakjiai niyalma cooha jibe be gidaha, nimalani boton de

¹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13。

² 巴克什（滿語 baksi）又譯為榜式、榜識、把式、榜什，出自蒙文，為清朝文臣、學者、大學士的稱呼。

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juleri gaifi afaha seme uju jergi amban obufi sumingguwan i hergen bufi ini beyei jalan jui jalan omoloi jalan ere ilan jalan de isitala tanggū niyalmai caliyān jembi, ulai amba guruni dain de geren coohai niyalma de anahakū ini beye morinci ebufi yafahan juleri gaifi afame, tere ulai coohabe gidafi amba gurunbe efulefi gajiha. ⁴

滿文 2、han hendume, eidu baturu, enculeme šulge bujan be gaiha, barda i hoton be gaiha, sakjai i niyalma cooha jibe be gidaha, nimalan i boton de juleri gaifi afaha seme uju jergi amban obufi, dzung bing guwan i hergen bufi, ini beyei jalan, jui i jalan, omolo i jalan, ere ilan jalan de isitala, tanggū niyalmai caliyān jembi, ula i amba gurun i dain de, geren coohai niyalma de anahakū ini beye morin ci ebufi, yafahan juleri gaifi afame, tere ula i cooha be gidafi, amba gurun be efulefi gajiha, 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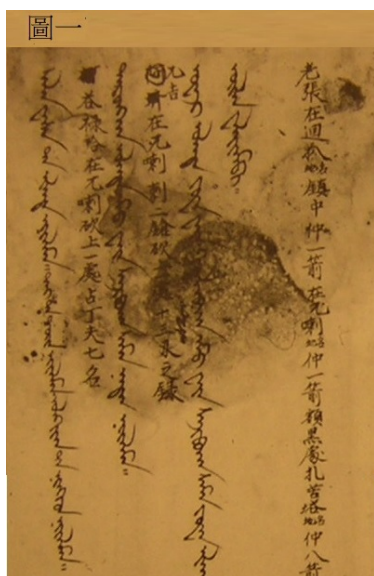
漢譯、汗曰：額亦都巴圖魯，獨取舒勒格布占、克巴爾達城，敗薩克寨之來兵，奮戰於尼瑪蘭城前，著為一等大臣，授總兵官之職，其本身及子孫三世，食百人之錢糧。同烏拉大國之戰中，身先士卒，下馬步行奮勇攻戰，擊敗烏拉兵，滅大國。⁶

例一位處〈寒字檔〉的開頭，只記下漢字七個：「皇帝敕諭厄一都」，緊接著就是約七十六字的滿文翻譯。這是〈寒字檔〉裡的特例。因為就一個翻譯來說，這種做法，比例失衡，很難理解其用意。本文之所以列作第一個例子，只是描述一下這個檔案開頭的風貌而已，當然要討論也得留在最後才會進行。接下來探討例二。在此之前，先將例二「〈寒字檔〉漢文敕諭影像」展示如圖一：

⁴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⁵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15-2816。

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2。



例二

漢文、答祿哈在兀喇砍上一處，占丁夫七名。⁷

滿文 1、darungga ulade emu feye sacibuha seme nadan niyalma.⁸

滿文 2、darungga, ula de emu feye sacibuha seme nadan niyalma.⁹

漢譯、達龍阿在烏拉被砍傷一處，賞七人。¹⁰

例二漢文摘自《滿文原檔》頁 100，是這冊〈寒字檔〉前段裡較為完整的案例。而所列的滿文 1 與滿文 2，則是從《滿文原檔》與《內閣藏本滿文老檔》上，各自擷出相對應的滿文文字。其中《滿文原檔》屬於努爾哈齊時代的原件，而《內閣藏本滿文老檔》則是乾隆年間，以《滿文原檔》為母本所複製的抄本，二者在文字上，幾乎全部相同。但是例二上方的漢文，卻與下方現代吳元豐等人所翻譯出來的文字，很不一樣。

例如例二上方漢文句子裡的主語「答祿哈」，現代譯語稱之為「達龍阿 darungga」，二者不同。不過這點倒還容易解釋，就是「答祿哈」有可

⁷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⁸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⁹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17。

¹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2。

能屬於早期口語，書吏耳聽手記，就寫下「答祿哈」。而「達龍阿」則是照著《內閣藏本滿文老檔》上留存的滿文所譯，反映出來的則是書面語的讀音。在滿語裡面，口語與書面語經常是略有不同的，¹¹稍有差別實不足為異。另外「兀喇」、「烏拉」，二者是同名異譯，也是無可挑剔的小區別。

只是「砍上一處 emu feye sacibuha」，跟現代翻譯「被砍傷一處」相比，前者語法的主動、被動、和受傷與否，都不大明顯。現代譯語加了一個「被」字，出於滿文「sacibuha 被砍了」，有畫龍點睛之效。對比之下，看得出努爾哈齊時代的原件，實在有些讓人摸不清頭緒，頗不似現代譯者的「被砍傷一處」，那麼直白易懂。

另外「占丁夫七名 nadan niyalma」，也同樣有主動、被動分不清楚的問題存在。因為「占」具有主動的含意，是臣子費力搶到或是因好運據有的，而「賞」卻有接受努爾哈齊恩典的意味，兩者明顯有些差異。以下再看一個例子：

例三

漢文、兀吉在兀喇刺二鎗、砍上一處，十三刃之錄。¹²

滿文 1、uweji ulade juwe feye gidalabuha emu feye sacibuha seme juwan ilan yan i uile waliyambi,¹³

滿文 2、weji, ula de juwe feye gidalabuha, emu feye sacibuha seme juwan ilan yan i weile waliyambi,¹⁴

漢譯、窩濟在烏拉被刺傷二處，砍傷一處，准折十三兩之罪。¹⁵

例三也是摘自《滿文原檔》頁 100，是緊跟著例二後的句子。其滿文

¹¹ 安俊，〈錫伯語言文字乃滿語滿文的繼續〉，《滿語研究》，（哈爾濱市：[滿語研究編輯部]，1985 年 01 期，創刊號），頁 45-47。

¹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¹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¹⁴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17。

¹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2。

1、滿文 2、漢譯等三個項目，來源與例二相同，這裡就當成慣例，不再一一說明來歷了。

例三漢文句子的主語「兀吉 uweji」，現在漢譯稱之為「窩濟 weji」，二者不只漢譯不同，滿文的寫法，也略有差異，需要解釋一下。漢譯的不同，可大致歸因於滿語口語與書面語的誤差，理由如同例二。而滿文的寫法不同，則是老滿文與新滿文間表現形式歧異的關係了。老滿文開頭的「uw」與新滿文「w」，寫法雖有些不同，實則只是表達方式的改變而已，本質並無變化，經常可以互通。例如老滿文的「uwehe 石」，新滿文作「wehe 石」，¹⁶就是類似的情形。又像是在例三的滿文 1 之中，老滿文「uile 罪」，滿文 2 的新滿文寫作「weile 罪」，¹⁷兩者也是本質不變，相互通用的。

然而例三的漢文卻有點複雜，不只有例二出現過的述語「砍上一處 emu feye sacibuha」，還另外跑出一個述語「刺二鎗 juwe feye gidalabuha」。這兩個述語，同樣都有主動、被動、受傷與否，十分含糊的問題，如果不細看滿文或是現代漢譯「被刺傷二處」，還真不曉得誰在砍誰、誰在刺誰。

另外「十三刃之錄 juwan ilan yan i uile waliyambi」，除了有主動、被動弄不清楚的疑點之外，更會讓人懷疑自己的中文程度有什麼問題，因為這段文字實在太讓人費解了。

對比現代譯者的詮釋「准折十三兩之罪」，淺顯易懂。那麼「十三刃之錄」這樣的句子，是不是在「舞文弄墨」，或故意在搞隱晦呢？

其實這個句子，只要稍微探索一下，就會發現其雖由漢字組成，而內容卻摻進太多女真語民族成分，與中文的關係不大。如果以閱讀日文的方式來解讀，或許會讓人更容易理解些。

日文的「僕、君」，在漢語來說就是「我、你」。由於日本人接受了

¹⁶ 廣祿，李學智同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 59[1970]），附錄（一），頁 2。

¹⁷ 廣祿，李學智同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 59[1970]），附錄（一），頁 1。

古代漢語，所以採用了中文的古代語意，例如「僕雖罷駑」¹⁸、「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¹⁹其中的「僕」、「君」字就是在說「我」、「你」。中文古代有這些案例，日文仿造沿用，出現時很容易就能理解。但是有些採用延伸含意的漢字，要明瞭其語意，就稍微有些困難了。像是日文的「切手(きって)」，以中文說就是「郵票」。「切」在中文是用刀把東西割斷、分開成幾部分。如：「切菜」、「切斷」等，日本卻是自古以來稱呼能已付了錢的字據紙條為「切手」，是大紙「切」為紙條的意思，「郵票」是切成小片的紙張，當然可稱為「切手」。這種解釋，雖繞了一下彎子，但意思還算淺顯好懂。日本漢字最難望文生義的，就屬於以音記字的部分了，像是稻妻(いな・ずま；inazuma)，意指閃電，跟「稻」、「妻」都沒關聯。丈夫(じょう・ぶ；jou bu) 是表示堅固、健壯，卻沒有中文的「男性配偶」的意義等等。

因此話說回來，要曉得建國前的女真人所記的「錄」是什麼意思，就得與其滿文對應字「罪 uile」來觀察才行。由於老滿文「uile 罪」，在新滿文寫作「weile 罪」，²⁰而「錄」就是取「罪 uile」的部分發音「le」。這麼一說，應該有豁然貫通的感覺，原來這字根本不是中文呢。當然或許會感覺「錄」的注音是「ㄌㄨˇ」、拼音為「lù」，跟「le」的發音不盡相同。但是如果考慮口語、方言的因素，這點小差異往往又可以略而不計了。「刃」字與此類似，下面還會繼續說明。因此文中所謂「十三刃之錄」，就是「十三刃之罪」。

然而「十三刃之罪」，若不曉得「刃」的含意，依然會讓人莫測高深，「刃」成了問題的另一個關鍵所在。不過有了「錄」的經驗，還是可考慮從滿文反推出其含義。

原來「刃」同「錄」一樣，也是一個記音字，源自滿文的銀「兩」。滿文發音「兩 yan」就是「刃」。中文字典上對「刃」這個字的解釋有

¹⁸ 《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¹⁹ 王維《送別》：「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²⁰ 廣祿，李學智同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 59[1970]），附錄（一），頁 1。

六：「1.刀口；刀劍等的鋒利部份。2.刀、劍等有鋒刃的兵器。3.殺。4.磨。5.滿。于省吾《新證》：「刃，滿也。經傳通作仞。」6.通「仞」。古代長度單位」等，卻並沒有銀「兩」的含意，因此要找出「刃」有銀「兩」的含意，就得往口語、方言方面去找，觀察其發音特徵才行。

以下是摘自袁家驊等著的《漢語方言概要》的「表一 日母字聲母各地方言調查表」，²¹主要是對比出北京的「日」字，在東北瀋陽有念「一」音的特點：

表一 日母字聲母各地方言調查表

| | 人 | 日 | 熱 | 如 | 軟 |
|----|------|-----|-----|-----|-------|
| 北京 | ʃzən | ʒl' | ʒʅ' | ʃzu | ʃzuan |
| 成都 | ʃzən | ʃzɿ | ʃze | ʃzu | ʃzuan |
| 當陽 | ʃən | ʃu | ʃu | ʃu | ʃuan |
| 揚州 | ʃləŋ | ləʔ | ləʔ | ʃlu | ʃlō |
| 沈陽 | ʃin | i' | ie' | ʃy | ʃyan |
| 濟南 | ʃzẽ | ʒl' | ʒə' | lu' | ʃluẽ |
| 漢口 | ʃnən | ʃʅ | ʃnʅ | ʃy | ʃyan |
| 西安 | ʃzẽ | ʃə | ʃzʅ | ʃvu | ʃvẽ |

在這個表一裡，北京音的「日」字，發音帶著捲舌的「ʒ」音，可念「日」字音。可是到了瀋陽，卻變成了「i」音，要念「一」字音。

因此「刃」字的發音，在北京是標準國語口音「rèn. ㄖㄣˋ」，可是在瀋陽卻變成了「yìn. 一ㄣˋ」，明顯的東北口音，與滿文發音「兩 yan」十分相似。因為建州女真人生活的蘇子河畔，就在瀋陽城附近。也就是說在這種語境之下，「刃」字讀如「印」，與滿文銀兩「兩 yan」字是相通的。把「兩 yan」記為「刃」，可說是理所當然。接著下面再舉一個案例例四，說一下其他問題。例四在《滿文原檔》上，與例二、例三的漢文文字是緊挨著的，其畫面可參考圖一。

例四

漢文、老張在迴扒（地名）鎮中仲一箭，在兀喇（地名）仲一箭，額

²¹ 袁家驊等著，《漢語方言概要》，（北京市：語文，2001，第2版），頁31-32。

黑處扎苦塔（地名）仲八箭，在兀喇（地名）仲一箭，每人七刃之錄。²²

滿文 1、looja hoifade emu feye ulade emu feye baha, ehecu jakūtade jakūn feye ulade emu feye baha seme nadata yan i uile waliyambi,²³

滿文 2、looja, hoifa de emu feye, ula de emu feye baha, ehecu, jakūta de jakūn feye, ula de emu feye baha seme nadata yan i weile waliyambi,²⁴

漢譯、勞札在輝發被傷一處，在烏拉被傷一處，額赫楚在扎庫塔被傷八處，在烏拉被傷一處，准各折七兩之罪。²⁵

例四的漢文與漢譯，老張、勞札，額黑處、額赫楚，發音皆相似，尚無疑義。值得注意的是，迴扒（地名）、兀喇（地名）、扎苦塔（地名）、兀喇（地名）等，在這些戰場的名稱下面，都以稍小的漢字加註了「地名」二字，這倒是例二、例三裡都看不到的現象。為什麼例四要多此一舉，在這些明明前面已經知道是「地名」的下面，還要加註小字呢？唯一的可能是，例四這份漢文敕諭檔，原本跟例二、例三並不是記在一塊的。也就是說，紀錄例四漢文的文員，與撰寫例二、例三的文員，並不是同一人，甚至不在同一時地。因為另一個特徵，也支持這種想法。就是文中的仲一箭、仲八箭等這種筆法，例四也與例二、例三不同。

前面曾評論過例二、例三的刺二鎗、砍上一處等，有主動、被動、受傷與否，含糊其辭的問題。可是例四的「仲一箭」，卻一舉解決了這方面的疑義，雖然「仲箭」的「仲」，有寫別字的嫌疑。但是顯然寫「仲一箭」的女真人，很能理解例二、例三在漢語語法上，有些缺陷的問題。所以例四特別以「仲」代替「中」，以強調這個破音字「仲」所具備的被動語法功能。由以上兩個特徵，即加了「地名」注記、以「仲」代替「中」來看，可知寫例四的譯者，與例二、例三的作者，並不相同。

又由於例二的主語「兀吉」、例三的主語「答祿哈」作戰受傷的地

²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101。

²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1。

²⁴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17-2818。

²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2。

點，都在兀喇一地，所以案情十分單純。不過例四卻出現了兩個主角，分別是「老張」與「額黑處」，且戰損的地點又各有兩處，一是「迴扒」與「兀喇」，二是「扎苦塔」與「兀喇」。因此結尾處說「每人七刃之錄」，多寫了「每人」，一方面是分配獎勵上，避免均分「七刃之錄」，使有功官兵吃虧。另一方面也顯示該執筆的書吏，漢文素養比前兩例進步一些。

地名中有「迴扒」者，所謂「迴扒」就是「輝發」，是扈倫四部中第二個被努爾哈齊所兼併的女真部落。排第二的原因，是因在輝發被滅之前，哈達已經被建州強力攻下了。

扈倫四部又名海西女真，早期也曾是女真中的四強，原本並不把建州女真放在眼裡。後來竟會不敵建州女真的攻勢，實因當時的形勢，轉變成對努爾哈齊較為有利的緣故：

明代的海西女真，以其初地海西，居處海西江即松花江地域而得名。海西女真支派紛繁，居住分散。後不斷地南移、兼併。至嘉靖年間，海西女真逐漸整合為四大部，而總稱之為扈倫四部，即哈達、輝發、烏拉、葉赫。扈倫四部的地域範圍，東臨東海女真、朝鮮，東南接建州女真，南界明開原、鐵嶺邊牆，西為漠南蒙古科爾沁部、郭爾羅斯部，北至混同江一帶，其俗種耕稼、善弛獵，有室廬、作山寨。這與樂住種、善緝紡，長騎射、喜治生的建州女真之俗，無大差異，自明成化以降，建州與海西的勢力，幾經曲折。此消彼長。但是，努爾哈赤在進兵海西之前，面臨著頗為有利的形勢。²⁶

這個歷史機遇的形成，大致上可由以下五點因素所構成，其中第一，蒙古部落受明朝打擊，內部互相征戰廝殺，力量削弱。第二，海西諸部內鬩廝殺，消耗部落軍事實力，改變了其同建州的力量對比。第三，明對海西殘酷襲殺，削弱南關哈達與北關葉赫的軍政實力，突出了建州女真的軍事地位。第四，明朝遼東主力進入朝鮮，進行援朝抗倭戰爭，鬆弛了對建

²⁶ 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赤》，（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頁47。

州的軍事遏制。第五，建州女真完成統一，利用全部整合力量，成為兼併扈倫四部內因。²⁷當然這第五點是最重要的因素，設若建州女真沒有統一，仍然以建州三衛的分裂形式出現，則任何有利於建州的歷史機遇都將無福消受，也就不大可能兼併扈倫四部了。

話說回來，輝發（迴扒），被建州消滅的時間是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九月。當時努爾哈齊宣稱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兩度兵助葉赫並違背誓約，並以此為由，親統大軍進攻輝發山，裡應外合，一舉攻克，俘殺了拜音達里父子，輝發就此滅亡。²⁸至於努爾哈齊如何安排「裡應外合」的，其作戰佈署的詳細情形如下述：

輝發部築城於輝發河畔的呼爾奇山上（今輝發縣城東北十七公里處），南距建州七、八天的路程。山城三面環江，斷崖絕壁，十分險要，易守難攻、努爾哈齊知道若強行攻打，困難必多，損失必重。他於是利用「買賣夷人」往來「居停」需要，先期派遣了一批軍隊，分組帶著貨物，喬裝為行商，潛入輝發城內。同年九月，當努爾哈齊率軍兵臨城下時，潛伏在城內的軍卒立刻響應，到處放火殺人，造成秩序大亂，努爾哈齊的大軍也在激戰後衝入城中，輝發城陷落，拜音達里一族也被誅殺一光，建州兵取得輝發的部眾、牲畜、財物後班師，輝發部至此滅亡。努爾哈齊也消除了直接通往烏喇的障礙。²⁹

由於當時戰役並未經過多少波折，輝發就被掃入歷史的灰燼中，以致時間也確定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九月，沒有任何誤差。因此「老張」到「迴扒」作戰負傷紀錄只記了「鎮中仲一箭」，即使沒寫下時間點，也可以推測出來，就是在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九月，不會再有其他時間點能進入混淆視聽了。

而「老張」接著到「兀喇」作戰再度負傷的狀況，就比較複雜一些。

²⁷ 姜相順編著，《大清太祖努爾哈齊》，（瀋陽市：瀋陽出版社，2004，第1版），頁22-23。

²⁸ 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齊》，（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頁47。

²⁹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92]，初版），頁67。

因為烏拉的領袖布占泰是一個「驍悍異常」的人物，努爾哈齊一直想要收服他，不惜「五次聯姻，七次盟誓」，卻都是以失敗收場，相當難堪：

烏喇部居住在烏喇河（今松花江上游）流域，治所為烏喇城，位於烏喇河東岸，與金州城隔河相望。部長布占泰是位善於弓馬，驍悍異常的人物。努爾哈齊在九部聯軍大戰中俘獲了他，不但沒有殺他，後來還護送他回烏喇為部長，並先後與他五次聯姻，七次盟誓，主要的是想布占泰聽命於他，成為努爾哈齊的麾下助手。但是布占泰非常自負，羞於與建州為伍，更不願屈服在努爾哈齊之下，他彼釋放回到烏喇之後，一面西聯蒙古，南結葉赫，希望能東山再起，與努爾哈齊爭雄；一面又竭力爭奪朝鮮會寧、鐘城、慶源、穩城等六鎮的「藩胡」，回歸烏喇，成為自己的力量，這當然又是與努爾哈齊相衝突的。³⁰

因此建州軍事力量與烏拉的衝突不斷。早期烏拉參與的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的「九部聯軍大戰」布占泰被俘，已如上述。後期從萬曆三十五年（1607）開始，烏拉布占泰又與建州努爾哈齊奮戰了七年，內容十分曲折。

萬曆三十五年（1607）春天，努爾哈齊應東海瓦爾喀部蜚悠城（今吉林省琿春縣三家子鄉高石城村）城主策穆特黑之請，派出舒爾哈齊、褚英、代善、費英東、揚古利、扈爾漢等，率兵三千前往護送其五百戶投誠建州。烏拉貝勒布占泰見對己不利，派兵萬人攔擊。扈爾漢以兵百人護五百戶，結寨烏碣岩山巔（圖們江畔鍾城附近），與烏拉對抗。接著大將揚古利以二百人擊退烏拉萬人的攻勢，貝勒褚英、代善各率兵五百分兩路占山奮擊，大敗烏拉兵，斬烏拉大將博克多父子，生擒貝勒常住父子及貝勒胡里布，殺敵三千級，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為打通貂、參之路，努爾哈齊命貝勒褚英、台吉阿敏率兵五千攻克烏拉宜罕阿麟城（今吉林市龍潭山城），斬殺千人，獲甲三百，俘獲大批降眾。布占泰為緩和關係，故意示好，又懇請努爾哈齊親女為婚，努

³⁰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68。

爾哈齊遂以親女穆庫什嫁之。但布占泰也因多次侵擾努爾哈齊所屬渥集虎爾哈路，又想娶葉赫美人布寨女，以鳴鏑箭射所娶努爾哈齊的女兒。因此萬曆四十年（1612 年）九月，努爾哈齊率兵討伐烏拉，大勝。布占泰及其弟喀爾喀瑪見損失慘重，在陣前請求努爾哈齊寬佑，努爾哈齊痛斥其欺蔑皇天后土、背七次盟言、擄人所屬、強娶人已聘之女、以鼔箭射人女等罪責，讓他們認罪並交出人質後凱旋。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正月，努爾哈齊以布占泰勾結葉赫再次親征烏拉，在伏爾哈城決戰，烏拉再次大敗，屍橫遍野，慘不忍睹。安費揚古率軍以雲梯攻下烏拉城，布占泰見大勢已去，僅以身免，投奔葉赫而去。烏拉所屬城池聞風歸附，努爾哈齊「分配俘虜，編成萬戶」帶回建州，烏拉滅亡。³¹

因此歸納上述建州消滅烏拉之戰，計有萬曆三十五年（1607）三月的烏碣岩戰事、萬曆三十六年（1608 年）三月宜罕阿麟城戰事、萬曆四十年（1612 年）九月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正月的烏拉城戰事等三場。前兩場可稱為烏碣岩戰事、宜罕阿麟城戰事等，只有最後一場才可稱為烏拉城戰事。

再看例四漢文「老張在迴扒（地名）鎮中仲一箭，在兀喇（地名）仲一箭」，輝發（迴扒）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九月發生的戰事，這就排除了烏碣岩戰事，至於宜罕阿麟城戰事，與烏拉城戰事，都屬於消滅烏拉戰役，但是《滿文原檔》裡對於宜罕阿麟（*ihan alin*）城戰事都會標示地名「義哈阿里」或「亦哈阿嶺」，³²因此還是不會與烏拉城戰事相混淆。於是老張「在兀喇（地名）仲一箭」只能發生在萬曆四十年（1612 年）九月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 年）正月的烏拉城戰事之中。

至於例四漢文「額黑處扎苦塔（地名）仲八箭，在兀喇（地名）仲一箭」，這裡面扎苦塔（地名）的發生時間，可以從以下資料中找到：

萬曆三十九年（1611）...同年十二月，派何利裡、額亦都、扈爾漢率兵二千，征伐東海虎爾哈部扎庫塔城。扎庫塔為

³¹ 姜相順編著，《大清太祖努爾哈赤》，（瀋陽市：瀋陽出版社，2004，第1版），頁24-25。

³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101、112。

滿文 jakūta 的對音，意為“各八”。扎庫塔城在圖們江北岸，琿春河、海蘭河之西，距琿春城一百二十裡。這次征討的原因，是扎庫塔城主對建州和烏拉採取中立政策。努爾哈赤要求東海女真各部，在建州與烏拉之間，只能倒向建州，不許有其他選擇。他發兵懲罰扎庫塔城主，兵到之後，圍城三天，遭到守城軍民的頑強抵抗。城陷後，“斬首一千，獲俘二千”，並招撫環近地區居民。³³

額黑處此人參與的第一場戰役，是在扎苦塔（扎庫塔）發生的，時間已經晚在萬曆三十九年（1611）十二月，所以他所能執行的第二場對烏拉之戰，只能是建州消滅烏拉之戰的最後第三場烏拉城決戰，而不可能是前兩場烏碣岩戰事、宜罕阿麟城戰事等。這麼看來，《滿文原檔》漢文資料所提到的「在兀喇（地名）仲一箭」，大致上範圍很清楚，就是指最後在烏拉城發生的大決戰，而非前兩場規模較小的戰役。

以下再舉一個例子，可與前面四例相互參照，就能看出所謂的「女真式」漢字的特點，甚至是否真有其事。

例五

漢文、卜郎台在哈答陣上中一箭，五兩之錄。³⁴

滿文 1、burantai hadade emu feye baha seme sunja yan i uile waliyambi,³⁵

滿文 2、burantai, hada de emu feye baha seme sunja yan i weile waliyambi,³⁶

漢譯、布蘭泰在哈達被傷一處，准折五兩之罪。³⁷

³³ 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赤》，（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頁 84-85。

³⁴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28。

³⁵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28。

³⁶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47。

³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2。

例五漢文的主語是「卜郎台」，現譯為「布蘭泰」，譯音相近，沒有問題。「哈答」、「哈達」，發音相同，也很正常。只是這個例句有三處特點，可以對照出「女真式」漢字的特徵，因此入選當作範例。

注意看例五漢文「陣上中一箭，五兩之錄」的「陣」、「中」、「兩」三個字，在例三「鎮中仲一箭」是寫作「鎮」、「仲」而不是「陣」、「中」，在例四漢文「十三刃之錄」是寫作「刃」而不是「兩」。當然「鎮」、「仲」兩個字可以算是別字，而「刃」卻不能算是別字，因為從例五的漢文就能夠看出，在早期女真人眼中，「刃」、「兩」二字確實是可以相通的。在《滿文原檔》的漢文中，「刃」佔了大多數，而「兩」只有寥寥可數幾個。可見檔案裡的女真人對「刃」比較有點感情，卻不大習慣使用「兩」，例五用了「兩」，反成特例。

早期女真人漢文水準不高，跟當時在努爾哈齊身邊的漢人有關。《建州紀程圖記》乃朝鮮官員申忠一於朝鮮宣祖二十八年（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奉命至建州努爾哈齊居城費阿拉察看情勢時所繪。書中說他看到有一個漢人名叫龔正陸，是浙江會稽紹興府人，粗通文墨，擔任努爾哈齊的家教兼秘書，頗獲重用，女真名字稱為歪乃。³⁸歪乃的漢文程度，據申忠一所說，卻並不高明：

歪乃本上國人，來于奴酋處，掌文書云，而文理不通。此人之外更無解文者，且無學習者。³⁹

龔正陸歪乃是「上國人」，上國是朝鮮官員對明朝的敬稱。申忠一的說法，歪乃把「餘」寫作「於」，「文理不通」，這點缺失是查有實據的，無庸置疑：

同時他也記了當時努爾哈齊屬下兵力已達一萬五千餘人，並有浙江人龔正陸為他掌理漢文文書，申忠一帶回去一件努爾哈齊致朝鮮國王李昞的回帖，文中有「我屢次學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於（餘）里邊疆」，這回帖就出自龔正陸的手筆，難

³⁸ 李守中作，《長城往事》，（臺北市：遠流，2010，第二版），頁408。

³⁹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臺北市：臺聯國風出版社清史資料·第三輯，開國史料(三)，1970），頁15。

怪朝鮮人說他「文理下通」。⁴⁰

但是申忠一所講「此人之外更無解文者，且無學習者」，那就有些言過其實了。因為努爾哈齊在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時，剛經過九部聯軍來犯的「古勒山」之戰，局面已經逐漸打開，早非吳下阿蒙了。

所謂「古勒山」之戰是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朱舍里、訥殷等九部三萬軍隊聯合起來，於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進攻建州之戰。雙方在古勒山（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上夾鄉古樓村西北）交戰，結果建州女真獲得勝利。努爾哈齊自此「軍威大震，遠邇懾服」，⁴¹大汗都城費阿拉還來了其他漢人，有名有姓，擔任「教師」。這些人不只懂得漢文，而且從職銜上看，就知道還在進行教學業務，哪可能會「無學習者」：

最後還有一點是努爾哈齊從經驗中得到的，就是要吸收與利用漢族人士，因為只有漢族人士的參與，建州在生產事業上、物質生活提升上，以及政府機構的組織完備上才能得到長足的進展。據當時到費阿拉與努爾哈齊洽談公事的人說：除了龔正陸以外，還有「唐人教師方孝忠、陳國用、陳忠」等人，這些漢人知識分子留居建州，對傳播先進文化、培養人才、治理國家都起重大的作用。⁴²

但是所謂名師出高徒。而龔正陸、方孝忠、陳國用、陳忠等人，都只是粗通文墨的師爺級人物，擔任教師教出的女真書記官，顯然也不可能會有多大能耐。因此，〈寒字檔〉中這五十一頁的漢文敕諭，有些夾雜了女真語言，又寫出一些漢字錯別字，弄得文章總是詞不達意，說來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除了萬曆二十三年（1595），龔正陸等人受聘在建州費阿拉城幫忙處

⁴⁰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48。

⁴¹ 姜相順編著，《大清太祖努爾哈赤》，（瀋陽市：瀋陽出版社，2004，第1版），頁18-19。

⁴²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61。

裡漢文文書之外，⁴³緊接著此後的第四年，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費阿拉城中又發生兩件大事，值得一提。一是消滅哈達之戰，二是滿文創製問世。先說哈達之戰如下：

萬曆二十七年（1599）九月，努爾哈赤統兵征哈達。其弟舒爾哈齊自請為先鋒，領兵一千做前隊，直抵哈達城下。哈達兵出城迎戰，舒爾哈齊見哈達城堅兵盛，按兵不戰，道：“彼兵出矣！”努爾哈赤怒道：“此來豈為城中無備耶”！說畢，親自帶兵沿城環攻。城上發矢投石，建州兵死傷很多。建州軍團團圍城，日夜猛攻。經過六晝夜的激戰，攻陷哈達城。揚古利也擒哈達貝勒孟格布祿。孟格布祿匍匐進見努爾哈赤，努爾哈赤將自己的貂帽和豹裘賜給孟格布祿，並把他帶回佛阿拉監養。哈達所屬城寨完全招服。建州對哈達的器械、財物、妻子秋毫無犯，降民編入戶籍，遷之以歸。⁴⁴

努爾哈齊雖然攻下了哈達，但是為顧及明朝的顏面，並不敢名目張膽的併吞。直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哈達發生大飢荒，向明乞糧，卻得不到回應，還要「以妻子、奴僕、牲畜易而食之」，十分淒慘。努爾哈齊這才乘機併其部眾，有其屯寨，收其牲畜，奪其敕書，一舉將哈達徹底給滅亡了。⁴⁵

再說滿文的創製。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的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與大臣額爾德尼、噶蓋等三人合力，借鏡蒙古文字，創製出滿文：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榜識厄兒得溺、剛蓋對曰：「我等習蒙古字，始知蒙古語，若以我國語編創譯書，我等實不能。」太祖曰：「漢人念漢字，學與不學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學與不學者亦知，我國之言寫蒙古之字，則不

⁴³ 明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努爾哈齊才遷居赫圖阿拉城。

⁴⁴ 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赤》，（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頁59。

⁴⁵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92]，初版），頁65。

習蒙古語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國言語編字為難，以習他國之言為易耶？剛蓋厄兒得溺對曰：「以我國之言編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編成句，吾等不能，故難耳。」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媽字，此非阿媽乎阿媽，父也？厄字下合一脈字，此非厄脈乎厄脈，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於是自將蒙古字編成國語頒行。創制滿洲文字，自太祖始。⁴⁶

也就是說，當年二月，新發明的滿文，最初只有兩個詞而已，就是清太祖努爾哈齊所構思的爸爸（阿媽）、媽媽（厄脈），至於其他的字詞，則建議「爾等試寫可也」。簡單的說，就是努爾哈齊只出了構想，卻留下一大片空白，還要等著額爾德尼、噶蓋這兩位榜識、學者，來逐步填補才行。

但是軍情緊急，九月，努爾哈齊不待滿文製作成熟，就統兵出征哈達城了，如上所述，還激戰六晝夜。布蘭泰（卜郎台）十分英勇，在哈達城下被箭射中一處，依例獎賞，准折五兩之罪。這份功勞，不容抹滅，得記錄下來。

然而該用新發明的滿文，還是師爺所傳授的漢字來寫呢？這個抉擇並不困難，答案也很單純，只能選用漢字。因為經過半年的開發，額爾德尼、噶蓋二名學者，即使已經快馬加鞭，完成一本具有滿蒙漢文的三體字典，類似成書於天聰九年（1635）的《滿洲實錄》格式一般，是一本滿蒙漢文三體對照的手冊。但是僅僅半年的時間，用於開發就已經讓人精疲力竭，根本沒有時間教學，傳授各路人馬學習閱讀及寫作。

於是女真書吏，只好以自己早已懂得的漢字記下「卜郎台在哈答陣上中一箭，五兩之錄。」這應該就是後來《滿文原檔》內〈寒字檔〉漢文敕諭的來源。不只如此，揣測早期的天命朝原始紀錄檔案，都是以漢文打底，而完全沒有滿文的容身之處。之所以能這麼推論，還是要從滿文教育談起。

在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那天，一場關係著滿文發展的教學運

⁴⁶ 國立故博物院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圖書季刊》，（臺北市：國立故博物院，1970[民 59]，第一卷第一期），卷 2 頁 1。榜識即滿文 *baksi*，意為學者，厄兒得溺（額爾德尼）、剛蓋（噶蓋）是不同的譯音。

動開始了。努爾哈齊下令，要在八旗中著手推行書文教育，《滿文原檔》上記載了這件看似瑣碎的芝麻小事：

han i bithe juwan emude wasimbuha, jontoi, bebuhei, sahaliyan, ubatai, yasingga, koboi, jahai, hondai, ere jakūn gūsai sefu seme tucibuhe, jakūn baksi, suweni fejile šabi dosimbuha juse be saikan kimcime bithe tacibufi šumbuci gung bure, kiceme tacirakū dosika juse bithe šunderakū oci weile arambi, dosimbuha šabisa kiceme tacirakkūci sefu si beise de habša, jakūn sefu be ai ai baita de daburakū,⁴⁷

十一日，汗諭曰：命准托依、博布黑、薩哈廉、烏巴泰、雅星阿、科貝、札海、渾岱八人為八旗之師傅，八位巴克什尚精心教習爾等門下及所收之弟子。教之通曉者賞之，弟子不勤學不通曉書文者罪之。門下弟子，如不勤學，爾等可告於諸貝勒。該八位師傅，無須涉足他事。⁴⁸

從上述的滿文資料看來，其中所謂「書文 bithe」，所指的就是滿文。而「八位巴克什 jakūn baksi」，不只名字准托依(jontoi)、薩哈廉(sahaliyan)像是滿人，而且通常巴克什(baksi)，就是指八旗中通曉滿、蒙文字的滿洲學者，與教導漢文的漢人生員是有所區別的。而傳授八旗旗學的教師，職稱為「八旗師傅 jakūn gūsai sefu」，讀如「瑟夫 sefu」。「瑟夫」也者，就是漢文「師傅」的滿文音譯，現在新疆錫伯族在平日口語中，學生還是「瑟夫」早安、「瑟夫」晚安這麼向老師問候的。

如果八位師傅各自為政，單傳門下八個弟子，那麼影響也就有限。然而根據《滿文原檔》，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條內的記載，

juwan uyunde emu nirui juwanta niyalma tucibufi dangse araha.⁴⁹

⁴⁷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147-148。

⁴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18。

⁴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

十九日，每牛录各派十人書寫檔子。⁵⁰

可知當時各牛录都接到命令攤派，規模並不算小。所謂牛录，為八旗的基本單位，早期的牛录結構，包括人民、軍隊和土地，是一個軍民合一的戰鬥體。這土地一項，入關後逐漸淡薄，有的甚至沒有。⁵¹但是根據《滿文原檔》記載，在天命六年（1621）閏二月時，後金全國八旗牛录統計起來共有 231 個之多，每個牛录都有土地，並且位置明確，其細目如下：

○ darhan hiyai gūsa de, niyamjui nadan niru emu hontoho, feideri de nadan niru, aisika siberi de sunja niru, ○ adum agei gūsa de deli wehede ilan tanggū nadanju uksin, hulei golode orin jakūn niru, toran janggide juwan nadan niru, ○ muhaliyan i gūsade jakūmu de juwan niru, dethe de ninggun niru, oho de sunja niru, ○ jirgalang agei gūsa de undehen de emu tanggū orin sunja uksin, boo uwehede nadan niru, fe ala de susai duin niru, ○ tanggūdai gūsa de jakdande juwe tanggū susai uksin, jakade uyun niru, hūwanta, looli jambigan hūlan de juwan ninggun niru, ○ borjin i gūsade fanaha de juwan niru, biyen de ninggun niru emu hontoho, hecemu hanggiya de juwan niru, ○ donggo efu i gūsade, hunehe yengge de sunja niru, boihon šancin de sunja niru, yirhū suwan de jakūn niru, šanggiya hada de juwe tanggū susai uksin, ○ abatai age i gūsade caihade sunja niru, muhu gioro de sunja niru, ordo hadade sunja niru;⁵²

達爾漢侍衛旗，在尼雅木椎者七個半牛录，其在菲德里者七牛录，在愛西喀、西伯裡者五牛录。阿敦阿哥旗，在德立石

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158。

⁵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221。

⁵¹ 瀛雲萍編著、翁福祥助理編註，《滿族史》，（臺北市：自行印刷出版，2006[民 95]），頁 251。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下轄的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錫伯族仍保有牛录地名，八個牛录相當於八個鄉。

⁵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二，頁 24-26。

者甲兵三百七十人口，在瑚勒路者二十八牛录，在托蘭，章吉者十七牛录。穆哈連旗，在札庫穆者十牛录，在德特赫者六牛录，在鄂豁者五牛录。濟爾哈朗阿哥旗，在溫德痕者甲兵一百二十五人，在包窩赫者七牛录，在費阿拉者五十四牛录。湯古岱旗，在紮克丹者甲兵二百五十人，在紮喀者九牛录，在歡塔、勞利、占比干、呼蘭等處十六牛录。博爾晉旗，在法納哈者十牛录，在避蔭者六個半牛录，在赫徹穆，杭嘉者十牛录。棟鄂額駙在渾河、英額者五牛录，在貝歡寨者五牛录，在雅爾古、蘇完者八牛录，在尚間崖者甲兵二百五十人。阿巴泰阿哥旗，在柴河者五牛录，在木虎覺羅者五牛录，在鄂爾多哈達者五牛录。⁵³

也就是說，即使天命六年（1621）七月時，每牛录只選派十人上課，學寫滿文檔子，以後金全部 231 個牛录來算，人數也高達 2,310 人了，等於成立了一所頗具規模的滿文研習學校了。

回頭觀察在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時，努爾哈齊手頭上只有一個紹興師爺龔正陸又名歪乃，擔任家教兼秘書，幫忙寫一些「文理不通」的書信。當年「古勒山」之戰打贏了，局面擴大，費阿拉城除了龔正陸以外，還又來了唐人教師方孝忠、陳國用、陳忠等人，幫忙傳播先進文化、培養人才。不過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朝鮮官員申忠一到訪時，只看到歪乃，並沒有發覺有其他人。可見那些漢人還處在政權外圍，根本無足輕重。當時的文化政策，是只能依靠漢文起草，再譯成蒙古文發出或公布：

努爾哈赤興起之後，建州與明朝、蒙古、朝鮮的公文，由漢人龔正陸用漢文書寫，「凡干文書，皆出於此人之手」。努爾哈赤通女真語，會蒙古文，又粗知漢文，唯獨缺少女真文字。所以，他在女真社會中的公文和政令，則先由龔正陸用漢文起草，再譯成蒙古文發出或公布；或用蒙古文發布。「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女

⁵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170-171。

真人講女真語，寫蒙古文，這種語言與文字的矛盾，已不能滿足女真社會發展的需要，更不能適應飛速發展軍事形勢的需要，甚至已經成為滿族共同體孕育、發展中的一個文化障礙。努爾哈赤為適應建州社會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遂倡議並主持創製作為記錄滿族語言的符號—滿文。⁵⁴

女真人書吏跟著歪乃這些師爺，學點文書，記下大事，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說來有諸多不便。或許「多少由於民族自尊心的驅使」，⁵⁵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執意按照蒙古文格式，創製滿文問世。

但是滿文的推展，由於戎馬倥傯，不斷受到延誤。直到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如前所述，努爾哈齊才選出教師准托依、博布黑、薩哈廉等八人，辦起學校。原因很簡單，因為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後金首先攻陷瀋陽城，接著二十二日，又下遼陽城。之後遼河以東七十餘城全部投降，金國國都也順勢遷置到了遼陽。⁵⁶當時遼陽是明朝遼東的首府，是東北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城池宏偉，比那時的瀋陽城還大上兩倍有餘。⁵⁷在這裡興辦滿文學校，當然是十分理想的事情。

如果認為努爾哈齊的這次興教之舉，僅是一時興起，未能延續很久，或誤以為清代文教之興，是另起於皇太極時代，那就與事實相違背了。因為《滿文原檔》在天聰六年（1633）十月二十一日記載了一份資料，由劉、邵兩位漢人生員老師口中，清楚的說明了從天命六年（1621）到天聰六年（1633）這十二年之間，旗學教育是有具體成果的：

orin emu de gulu suwayan i lio šusai, šoo šusai cembe fulu
 seme hūwakiyara jaka de, han de habšaha gisun, nikan bithe tacibure
 duin šusai, be juwe gūsai juse be tacibume juwan juwe aniya oho,
 meni tacibuha dumbai badun enggedei, ere ilan niyalma be gemu

⁵⁴ 閻崇年著，《清朝開國史》，（臺北市：聯經，2015[民 104]，初版），頁 277-278。

⁵⁵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 98。

⁵⁶ 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臺北市：中華書局，民 49[1960]，臺一版），上一，頁 130-131。

⁵⁷ 閻崇年著，《清朝開國史》，（臺北市：聯經，2015[民 104]，初版），頁 470。

jurgan de baitalaha, ice dosimbuha juwe gūsai ambasai juse be inu uhei tacibume jai aniya oho, ihan aniya šusai se be wara de han gosifi membe bithe tacibukini seme sonjofi ujiha, waha šusai boo i ai jaka be gemu mende buhe, jeku haji aniya jeku uđafi jefu seme menggun buhe, te han gosifi, bithe tacibure šusai se de juwete haha kamcibufi alban waliyabure jakade, gulu suwayan de šusai fulu seme damu dung šusai, hūwang šusai teile tacibu seme afabuha, liotai, šoo šusai meni juwe nofi be nakabufi alban de dosimbuha, kubube suwayan i fe ice juse be menci gamafi, kubuhe suwayan de ice šusai dosimbufi tacibumbi, meni juwan juwe aniya jobome tacibuha be han de alafi, juwete haha alban guwebuhe;⁵⁸

二十一日，正黃旗劉生員、邵生員，因超額被除名。彼遂告汗曰：“教習漢文之生員四人，我等教授兩旗子弟已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杜木拜、巴敦、恩額德依三人均被錄用。新入兩旗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兩年矣。丑年屠戮生員時，蒙汗眷顧，擇而養之，命我等教授漢文，並將被戮生員家中諸揚，悉賜我等。兇年賜銀命購糧而食。今又蒙汗眷顧，命教授漢文之生員等，各兼男丁二人，免徭役。而正黃旗因生員超額，僅命董生員、黃生員教習，而將劉泰及邵生員我等二人革除，充當差役。更將我等所教授之鑲黃旗新舊子弟，命鑲黃旗新進生員教授。今特將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報知於汗。”汗遂命二生員各免二丁徭役。⁵⁹

也就是說，劉、邵兩位漢人生員老師，因為超編，遭到八旗官學解職。他們憤憤不平，認為根本上抹煞其多年的辛勞。因為這十二年間所傳授的弟子之中，也不乏才幹之士，如杜木拜、巴敦、恩額德依等三人，都已通過審核錄用為檔案房的筆帖式，可見也有教學成果。皇太極為了安撫

⁵⁸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0。

⁵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1345-1346。

二人，就下令「各免二丁徭役」，弭平了這件聘雇糾紛。

不過從這兩位生員的口中所述，正好可以看出，當年努爾哈齊在為八旗子弟選派巴克什教授滿文的同時，還聘任了漢人生員，擔任漢文的教席，招收正黃旗、鑲黃旗子弟。這裡強調「同時」，是因為天聰六年（1633 年）倒算十二年，正好是天命六年（1621）。可以發現到，旗學教育在這十二年期間，片刻未停，進展得相當順利。

只是旗學教育的內容，何以要教漢文，實不免讓人起疑。若說期望子弟兵見識淵博，滿漢兼修，當然也有道理。可是上面《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不是明明說「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可見蒙古文是當地的通用文字，而不學必須習得的蒙古文，卻學起了漢文，這在道理上似乎有些不通。

但是看了〈寒字檔〉上的漢文敕諭之後，努爾哈齊興學的用意就很清楚了。八旗官學中之所以要學習漢文，正是為了解決歷次戰役所留下來的一大堆功勞簿，才會如此勞師動眾的。因為那些功勞簿都寫漢字，全有待翻譯為滿文。這也適當的說明，早期的滿文檔案，真的曾經採用過漢字當作佐證，而不是僅憑回憶就能撰寫出來的。

然而以往有學者認為，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以前，所有的記事，都是靠著額爾德尼巴克什的「聰明強記」，也就是憑回憶所寫的：

假若以上荒字檔與晟字檔所記為不誤，或可知清人最早有文字紀錄史事，應自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亦即是所謂：「清太祖建元天命」之前一個月，纔開始由額爾德尼巴克什紀錄太祖所行之「善政」。而此段老檔的記事，頗為重要，何以清太祖實錄未加收錄？當然，若收錄此一段史事，則對清太祖萬曆二十七年，初創滿文的紀錄，或即發生矛盾。因為既然於萬曆二十七年就創造了滿文，何以到了萬曆四十三年纔開始紀錄史事呢？或即基於這一矛盾無法自解，所以清太祖實錄裏，就將此段開始紀錄史事的記載，忍痛放棄。若是我們的推測不誤，那麼清太祖實錄裏所說的：「萬曆二十七年清太祖初創滿文」的說法，就絕對靠不住了。進而從現存老檔的記事繁簡證之？由建元天命三、四年開始記事的慢慢增加一點來觀察，清人最

早有文字紀錄史事，或亦不會早到天命建元以前太久吧。不過從以上荒字檔與晟字檔所載的一段史事看來，似乎確可證明兩件重要的史實。其一：假若以上兩冊老檔所記史實為不誤：最低限度可以證明，在萬曆四十三年以前，所有的記事，都是憑著額爾德尼巴克什的「聰明強記」所寫的，而且多有誇張。其二、由於此段紀錄的口氣證之，此晟字號的老檔，或可確定其為清太宗時所重抄。⁶⁰

這篇論述的作者廣祿、李學智，還認為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清太祖努爾哈齊額爾德尼、噶蓋等三人合力，借鏡蒙古文字，創製出滿文的時間點有問題。說是合理的時間點當為萬曆四十三年（1615），而在此之前的記事，是由額爾德尼靠著回憶事後所拼湊出來的。

以往看了這種論述，也只能將信將疑，因為也沒什麼證據好反駁的，只好假設其說為真。不過解讀過〈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之後，就覺得額爾德尼不可能完全靠著回憶寫歷史。較合理的方式則是以漢文敕諭之類資料為基礎，再自行添加一些後來蒐集到的紀錄，整合在一起，形成滿文檔案，像是例六、例七。

例六

漢文、翁哈代在扎苦塔陣上中一箭，在兀刺陣上中一箭，都拜兀刺陣上中二箭，每人九刃之錄。⁶¹

滿文 1、unggadai jakūtade emu feye, ulade emu feye, dumbai, ulade juwe feye baha seme uyute yan i uile waliyambi,⁶²

滿文 2、unggadai, jakūta de emu feye, ula de emu feye, dumbai, ula de juwe feye baha seme uyute yan i weile waliyambi,⁶³

⁶⁰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24。

⁶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38。

⁶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38。

⁶³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55-2856。

漢譯、翁噶岱在扎庫塔被傷一處，在烏拉被傷一處，都木拜在烏拉被傷二處，准各折九兩之罪。⁶⁴

例六有兩個人名，其中翁哈代（翁噶岱）不是要談論的對象，主要是在說都拜（都木拜）的事。都拜（都木拜）在烏拉打仗，被弓箭射傷兩次，准記九兩戰功。但是後來他犯了小過，抵銷掉一兩五錢，只剩下七兩五錢。〈寒字檔〉追蹤紀錄了下來，請看例七。

例七

漢文、（無）

滿文 1、dumbai de uyun yan bihe emu yan sunja jiha faitaha, nadan yan sunja jiha bi,⁶⁵

滿文 2、dumbai de uyun yan bihe, emu yan sunja jiha faitaha, nadan yan sunja jiha bi,⁶⁶

漢譯、都木拜原有九兩，銷一兩五錢，尚有七兩五錢。⁶⁷

例七是純粹的滿文檔案，所以漢文部分記了一個「（無）」。由於例六、例七都記在〈寒字檔〉上面，例六在前，例七在後。由這兩個案例可以很容易看出，兩者之間具備繼承關係。就是在前的例六為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七年（己亥-癸丑，1599-1619）間，與扈倫四部戰爭時期所留存的紀錄。這份紀錄是純粹漢文資料，一直累積到天命六年（1621）七月間，每牛录指派十人上課的八旗官學，也就是滿文研習學校成立了，大家齊心協力動手，才將舊功勞簿逐步翻譯為滿文。由於這份文件，形成於八旗官學，故完全採用了高麗箋紙，並未採用後金記史系統於天命六至九年（辛酉、壬戌、癸亥、甲子，1621-1624）這四年間，最常使用的明朝公文舊紙。〈寒字檔〉中第 99 至 149 頁那五十一頁的漢文敕諭，就是一個見證。這份資料後來又重新整理抄寫，略去了漢文敕諭，只剩下第 150 至

⁶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602。

⁶⁵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75。

⁶⁶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55-2856。

⁶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618。

175 頁共計二十六頁的純滿文檔案，例七就是其中之一。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中，則將此兩份檔案，另編為冊號六十二、六十三，⁶⁸該名稱在《滿文原檔》沒有，但可便於稱呼。接著例七之後，要安排一個關於葉赫的案例例八，因為前面所談，都沒有涉及葉赫，而葉赫與建州女真間的糾葛並不少。

例八

漢文、克車因差使往拽黑去死了，十五刃之錄。⁶⁹

滿文 1、kece, yehe deelcin genefi bucehe seme tofohon yan i uile waliyambi,⁷⁰

滿文 2、kece, yehe deelcin genefi bucehe seme tofohon yan i weile waliyambi,⁷¹

漢譯、克車出使葉赫而死，准折十五兩之罪。⁷²

建州女真與扈倫四部戰爭，從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七年（己亥-己未，1599-1619），以合併哈達開始，收服葉赫結束。萬曆四十一年（1613）建州三度遣使葉赫，攻張，卻都無功而返：

萬曆四十一年，烏喇被建州大軍消滅，布占泰逃亡到了葉赫，努爾哈齊三次遣使葉赫，要他們交出布占泰，但葉赫沒有依從。同年九月，努爾哈齊統兵四萬人征葉赫，攻克名叫張與吉當阿的二路，並納降了兀蘇城的守將山談、扈什木等人，後來發現葉赫兵有備，而努爾哈齊又認為自己「素無積儲，雖得人畜，何以為生？」乃焚廬舍、攜降民回師了。事實上，建州

⁶⁸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1版），頁2813-2918。冊號六十二天命九年（ninju juweci debtelin, abkai fulingga i uyunci aniya）、六十三天命九年（ninju ilaci debtelin, abkai fulingga i uyunci aniya）。

⁶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146。

⁷⁰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146。

⁷¹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1版），頁2864。

⁷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602。

奪取了兀蘇城之後，明兵得到了消息，隨即派出游擊馬時楠、周大歧率兵千人來援，並攜帶火器，這可能是建州退兵的另一主要原因。⁷³

從例八可以看出，「克車因差使往拽黑去死了」，正是萬曆四十一年（1613）三度出使葉赫中的實況寫照。所謂「兩軍交戰，不斬來使」，似乎只是一句戲言，葉赫人可不管這一套。

現代戰爭中除了不斬來使以外，還有不殺俘虜、不殺醫護、不殺老弱婦孺等默契，以體現現代社會文明人道的一面，同時也是瓦解敵方的抵抗力，樹立己方「正義之師」形象的好方法。不過萬曆四十七年（1619）努爾哈齊卻「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付葉赫，隨手縊殺了出降的葉赫首領布揚古：

葉赫東城被拿下，西城軍心瓦解，布寨胞弟吳達哈帶老婆孩子開城投降。八旗兵包圍了布揚古住所，代善勸降保證不殺他。但布揚古出降後見努爾哈赤不跪拜，努爾哈赤以其不服縊殺之。葉赫各屬城紛紛歸降，努爾哈赤將全體葉赫官民編入滿洲八旗，遷入建州居住，將傳了八世十一貝勒的葉赫吞滅。⁷⁴

只是在〈寒字檔〉冊號六十二範圍裡面，並沒有縊殺布揚古這一場大戰的紀錄。僅記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攻張路的那一段，歷史就已經停格了。請看下例：

例九

漢文、黑勒虎失土，在虎其哈里陣上中一箭，又在哈答陣上中一箭，又在張陣上中一箭，又在副兒家哈陣上中一箭，又在兀刺陣上刺二鎗，九刃之錄。⁷⁵

滿文 1、hele hūsitun hūcihari de emu feye, hadade emu feye, jang de

⁷³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 75-76。

⁷⁴ 姜相順編著，《大清太祖努爾哈赤》，（瀋陽市：瀋陽出版社，2004，第 1 版），頁 45。

⁷⁵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17。

emu feye, fulgiyaha de emu feye, ulade juwe feye gidalabuha seme uyun yan i uile waliyambi,⁷⁶

滿文 2、hele, hūsitun, hūcihari de emu feye, hada de emu feye, jang de emu feye, fulgiyaha de emu feye, ula de juwe feye gidalabuha seme uyun yan i weile waliyambi,⁷⁷

漢譯、賀樂、胡希吞在呼齊哈里被傷一處，在哈達被傷一處，在瑯地被傷一處，在福勒甲哈被傷一處，在烏拉被刺傷二處，准折九兩之罪。⁷⁸

例九出現一個人名「黑勒虎失土」，在中國第一歷史檔譯註的《滿文老檔》中，認為是兩個人「賀樂、胡希吞」，中間以頓號隔開。不過在東洋文庫譯註的《滿文老檔》索引裡，卻說這是一個人，可以查到「hele hūsitun 922 943」這份資料為證。⁷⁹其實看《滿文原檔》的漢文，也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人，因為「黑勒虎失土」的寫法不是「黑勒 虎失土」，中間既沒有空格，就表示那是一個人的名字。還有滿文沒有出現「各九兩 uyunte yan」，而是寫成「九兩 uyun yan」，也可以看出只有一個人。

例九裡面有「在瑯地被傷一處 jang de emu feye」的記載。而前面說過，萬曆四十一年，烏喇被建州大軍消滅後，其首領布占泰逃亡到了葉赫。努爾哈齊三次遣使葉赫，要他們交出布占泰。但從例八的記載中可以看到，葉赫不只沒有依從，還把建州派去的使臣克車給殺了。同年九月，努爾哈齊統兵四萬人征葉赫，攻下名叫張與吉當阿的二路。⁸⁰因此例九出現黑勒虎失土，「在張陣上中一箭」的紀錄。

由於〈寒字檔〉冊號六十二範圍裡面，只記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攻張路的事例，而缺乏萬曆四十七年（1619）努爾哈齊吞滅葉赫的一段。

⁷⁶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17。

⁷⁷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36。

⁷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7。

⁷⁹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昭和 30[1955]），索引，頁 22。

⁸⁰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 92]，初版），頁 75-76。

因此判斷這份敕諭檔的記事年代，應該發生於建州女真與扈倫四部戰爭時期，即早在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一年（己亥-癸丑，1599-1613）間，錄案時間長達十五年，而非僅只《滿文原檔》目錄所標示的後金天命九年（甲子，1624）當年。

不過對照〈寒字檔〉冊號六十二與冊號六十三的資料，發現二者大同小異，只是冊號六十二中有漢文敕諭及滿文翻譯，而冊號六十三之中，沒有漢字，卻又增補了少許滿文資料。

從這種現象可以推測，冊號六十二的漢文敕諭資料是建州女真與扈倫四部戰爭期間，所留下的原始紀錄。而在天命六年（1621）八旗官學成立之後，方才逐步翻譯成滿文。其方式是先抄錄漢文敕諭，再進行翻譯。形成漢文在前，滿文在後的局面。接著冊號六十三則是將冊號六十二的滿文，添加一些新增的紀錄，綜合在一起抄錄。這就是冊號六十二與冊號六十三，二者大同小異，而冊號六十二有古老漢字，而冊號六十三有更新紀錄的原因。

由於冊號六十二的檔案，與冊號六十三的檔案，有相互因襲的關係。照理說冊號六十三抄錄完成之後，冊號六十二的檔案就可以直接銷毀，不必再留存了。然而現在這兩份類似的檔案，卻都完整的留下，又是什麼緣故呢？可能的解釋應該有三，即是：

一、抄錄不全。以自冊號六十二中摘出的例六來說，「都拜（都木拜）兀刺陣上中二箭」，戰功清楚。而在冊號六十三的例七中卻只說「都木拜原有九兩」，因公受傷的事蹟，不翼而飛。逼得只能保留原件備查。

二、漢名獨特。冊號六十二的漢字記名法，有其獨特性，同音字也可以採用不同漢字，加以區分。以例九的虎失土（胡希吞 hūsitun）一名來說，在東洋文庫譯註的《滿文老檔》索引裡，就可以查到「hūsitun（1）、hūsitun（2）、hūsitun（3）」等三人。⁸¹若是以漢字來寫，就沒有這個問題。因此就一個簡約的功賞簿檔案來說，留存獨特的漢字記名，可避免同名的爭議。

三、翻譯欠妥。以例四的老張（勞札）當成例子來說，原文「在迴扒

⁸¹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昭和 30[1955]），索引，頁 24。

（地名）鎮中仲一箭，在兀喇（地名）仲一箭」，先由八旗官學的新手在冊號六十二翻成滿文，再添枝加葉潤飾到冊號六十三成文。結果發現現代回譯為漢字後，卻變成勞札「在輝發被傷一處，在烏拉被傷一處 looja hoifade emu feye ulade emu feye baha,」，那個「箭」字的意思，早被翻譯得不見了，容易產生誤會。因為到底是射傷、砍傷、摔傷...都變得模模糊糊。實際上，冊號六十二中有人是翻對了滿文的，可當作範例，然卻並未一體採行，如下：

例十

漢文、賴答在兀喇（地名）仲一箭。⁸²

滿文 1、laida ulade emu feye gabtabuha,⁸³

滿文 2、laida, ulade emu feye gabtabuha,⁸⁴

漢譯、賴達在烏拉被射傷一處。⁸⁵

在例十裡面，動詞採用「中箭了 gabtabuha」，再加上「一傷 emu feye」，就把「仲一箭」的意思完整表達出來了。然而在例四的案例裡，老張（勞札）「在兀喇（地名）仲一箭」，所用的動詞卻是「得了 baha」，配合上「一傷 emu feye」，意思就成了「得傷一處 emu feye baha」，滿文沒有盡責把漢文的意思，完整翻出。因而留下原始漢文紀錄，就變得有其需要了。

除了以上三點之外，八旗官學的新手，不只翻成的滿文有問題，另外對於高階人員的處理，也有其為難之處。這就要回頭談到例一了。例一的漢文：「皇帝敕諭厄一都」，寫著寫著，就沒了下文。原因也許很單純，就是額亦都（厄一都）是清初開國五大臣之一，⁸⁶位高權重，⁸⁷實在不是

⁸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2。

⁸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2。

⁸⁴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19。

⁸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4。

⁸⁶ 清初開國五大臣指的是瓜爾佳信男公費英東、鈕祜祿宏毅公額亦都、董鄂溫順公何和理、佟忠烈公扈爾漢、覺羅公安費揚古五人。

⁸⁷ 閻崇年著，《清朝開國史》，（臺北市：聯經，2015[民 104]，初版），頁 351。

八旗官學中的書吏所膽敢論及的。因此抄著抄著，就寫不下去了。由此判斷，當時顯然有許多額亦都的漢文資料，但是新手不敢抄錄與翻譯，於是形成只寫了一個「厄一都」，以下一片空白，然而卻出現滿文翻譯的奇怪現象。額亦都名下的滿文來源，研判是請示努爾哈齊後，真正按照所發下的口諭寫成，與滿漢文翻譯無關。

由此可知，《滿文原檔》的形成，處處反映出政治意涵的陰影，是一份相當寫實的檔案。尤其這類人事資料，牽涉到八旗子弟的利益分配，是以以後評斷爭議時的重要依據。以致清人入關後，即使到了康熙朝都還有人查閱，當時稱之為《無圈點檔》。

原來康熙朝時有一個閒散宗室叫做佛格，為了與布爾賽互爭佐領，控告布爾賽等不法，說「滿丕、和理、布爾賽等，原倚仗索額圖欺侮我等，將吏、戶、兵三部檔案毀匿，將內閣檔案之字塗註一案。」根據《康熙起居注》漢文本康熙五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條中，有如下的記載：

又覆請兵部覆原任郎中布爾賽等互爭佐領控告。又閒散宗室佛格等控告滿丕、和理、布爾賽等，原倚仗索額圖欺侮我等，將吏、戶、兵三部檔案毀匿，將內閣檔案之字塗註一案。查無圈點檔案所寫係卓科塔，並無朱胡達之名。布爾賽等稱，朱胡達為伊曾祖，取供時又稱係伊伯曾祖，不合。應將布爾賽等各罰俸一年。佛格等所稱滿丕、和理等，原倚仗索額圖欺侮伊等之處，當時即應控告。乃當時不曾控告，今歲月已久，証據俱無，應無庸議一疏，並以和理所奏原摺覆請。⁸⁸

對於佛格的這份控訴，宗人府衙門及兵部所回覆的看法，康熙皇帝顯然並不認同。因為就宗人府所說，已經查過了無圈點檔案《無圈點檔》，上面所寫的明明是「卓科塔」，卻並沒有「朱胡達」的名字。布爾賽等卻說，朱胡達是他們的曾祖，取供時又改稱朱胡達是他們的伯曾祖，前言不搭後語，宗人府擬議將布爾賽等各罰俸一年。至於兵部所答覆的，佛格等所稱滿丕、和理、布爾賽等倚仗索額圖欺侮佛格等人，當時就應該控告。

⁸⁸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第1版），冊29，頁B014605-B014609。

等到事過境遷才告，証據都沒了，應不予起訴。康熙皇帝在《起居注冊》中發下話來，將宗人府及兵部嚴厲斥責了一番：

上曰：宗人府衙門及該部所議，俱偏向矣。卿安即興安，隋分、興安是一處。無圈點檔案寫卓科塔，卓科塔即是朱胡達。此即與稱遵化為蘇那哈、總兵官為蘇明公等，是一而已，無有二也。今子孫稱伊祖父曾為蘇明公，謂非總兵官，可乎？稱蘇那哈效力，謂非遵化，可乎？即今各部奏疏內遺漏圈點者甚多，朕亦有硃筆改正之處，俱以為非，可乎？原任尚書杭愛為管佐領爭辯時，宗室厄奇執黃帶言曰：我雖庸懦，我係誰之子孫，將此黃帶俱不算，可乎？然杭愛等雖係厄奇所屬，伊曾管過佐領，朕仍著伊子管領，公阿靈阿、福善佐領下人所生之女，俱係伊查看。此佐領下亦有為大臣者，今謂此等非伊佐領下人，可乎？

89

康熙所訓斥的對象，主要是宗人府衙門。這個衙門的官員，顯然是清廷中極為少數，能夠看到《無圈點檔》的特殊份子。但是，這些人不知什麼緣故，看到檔案後，卻做出錯誤的結論，讓皇帝十分惱火。康熙一下問出五個「可乎」，這五個「可乎」裡，前三個是關於文字的，後兩個則是與宗族有關。將宗人府及兵部所做的「以偏概全」、「見風轉舵」的投機作法，明白的批駁了一番。

經查這份關鍵檔案的原貌如下，雖非〈寒字檔〉範圍，屬於〈黃字檔〉，但是記錄的事項與〈寒字檔〉頗為類似，還記了「免一次死罪 emu jergi bucere uile(weile) be guwebumbi」，由此也可見保留這類人事檔案的必要性：

jokota(juhūda), hingkan goloi amban bihe, ba be waliyafi(b)
baime jihe gung, jai afabuha uile(weile) be mutembi, joriha jurgan
be jurcerakū seme beiguwan obuha, emu jergi bucere uile be
guwebumbi, juse omosi jalan halame gosire doro be ume lshalara.

⁸⁹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第1版），冊29，頁B014605-B014609。

朱戶達，原係興喀路之大臣，因棄地來歸有功，復克盡厥職，不違指令，著為有備禦，免一次死罪，子孫世代勿絕恤典。⁹¹

在〈寒字檔〉上也有「免一次死罪 emu jergi bucere uile be guwebumbi」的類似講法，為「占本身 beyei teile」如下例：

例十一

漢文、牙海外郎占本身。⁹²

滿文 1、yahai be baksi seme beyei teile.⁹³

滿文 2、yahai be baksi seme beyei teile.⁹⁴

漢譯、雅海係巴克什，僅免其身。⁹⁵

前面說過「占」字具有主動的含意，是費力所得，與滿文「吃錢糧」的「吃 jembi」音義互通。⁹⁶反映出如額亦都（厄一都）等清初開國五大臣位高權重時期，部將與努爾哈齊是戰略夥伴關係，得到戰功鮮少有接受努爾哈齊恩典的意味，而是自己拿命換來的，漢字「占」即充分反映了這種現實。

探討了以上十一個例子，應該對〈寒字檔〉冊號六十二範圍內的漢字檔案，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了。

⁹⁰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 4，頁 359。

⁹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第 1 版），頁 655。

⁹²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47。

⁹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47。

⁹⁴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頁 2865。

⁹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4。

⁹⁶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1。即「占丁夫十名 juwan niyalmai caliyan jembi。」

就此來檢視當初《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述「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⁹⁷，這段話的真實性，並稍加討論。

所謂「滿洲未有文字」，如果只是講沒有滿洲字，倒還合理，因為當時確實還沒發明滿文。但如果指的是連漢字都沒有，那就有些誇張了。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人贊成這種可能性，就是誤以為連漢字都沒有。否則廣祿、李學智怎麼會在文章中說早期滿文資料，是「靠著額爾德尼巴克什的『聰明強記』」，也就是憑回憶所寫的呢？

還有「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也要看看，是否有類似蒙文檔案留下，躲在《滿文原檔》之中。

檢視《滿文原檔》，現代出版的共計十冊。不過早在民國二十年（1931）整理故宮內閣大庫檔案時，看到這種檔案有三十七冊，就加以編號，稱為「原編」。後來民國二十四年（1935）又找到了三冊，合計起來有四十冊，就重新給了編號，稱為「新編」。清乾隆六年（1741）裝裱整理檔案，採用了千字文作為編號，從「天」到「露」，⁹⁸由於要避諱清聖祖玄燁的名字，所以沒有「玄字檔」。檔案相當原始，有時會因使用目的不同，發生因複製備份而重複的情形，也照樣保存。像是與來字檔就與張字檔重複，宙字檔就與列、盈重複。而宙字檔的重複，還與所謂「秘密記事檔」有關。本文前面說過，〈寒字檔〉中編為冊號六十二、六十三的也算重複。至於蒙文，〈盈字檔〉中出現了部分蒙文，這是當時與蒙古人交往時，所留下的紀錄。後來乾隆在重新整理時，都翻譯成了滿文，要瞭解這份盈字檔的含意，只要對照《內閣藏本滿文老檔》一書，⁹⁹即使不懂蒙文，也能大致清楚盈字檔在寫些什麼。先看《滿文原檔》裡書寫滿蒙漢文情形，¹⁰⁰詳見表二：

⁹⁷ 國立故博物院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故宮圖書季刊》，（臺北市：國立故博物院，1970[民 59]，第一卷第一期），卷 2 頁 1。

⁹⁸ 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張 寒來暑往 秋收冬藏 閏餘成歲 律呂調陽 雲騰致雨 露結為霜。三十七冊檔案中包括有一冊太祖朝殘檔，沒有千字文編號，故宮原編號則為 35 號。

⁹⁹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 1 版）。

¹⁰⁰ 廣祿、李學智，〈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 60[1971]），附錄（一），頁

表二 《滿文原檔》書寫滿蒙漢文情形

| 故宮編號 | | | 出版 | 期間 | 內編 | | 用紙 | 內涵 | | 備註 |
|------|----|----|----|------------------------|-----|-----|----|----|-----|--------|
| 檔名 | 新編 | 原編 | 冊號 | 起始-結束 | 號數 | 頁數 | 兩式 | 書寫 | 滿文 | |
| 荒 | 1 | 7 | 1 | 萬曆 35 年 3 月-天命 4 年 3 月 | 146 | 211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炆 | 2 | 11 | 1 | 萬曆 43 年 6 月-天命 5 年 9 月 | 139 | 270 | 高麗 | 書寫 | 老 | 與荒字檔重複 |
| 張 | 3 | 15 | 2 | 天命 6 年 2 月-天命 7 年 4 月 | 550 | 560 | 公文 | 書寫 | 老 | |
| 來 | 4 | 17 | 3 | 天命 6 年 7 月-天命 6 年 11 月 | 52 | 98 | 公文 | 書寫 | 老 | 與張字檔重複 |
| 辰 | 5 | 12 | 3 | 天命 7 年 6 月-天命 7 年 6 月 | 54 | 57 | 公文 | 書寫 | 老 | |
| 列 | 6 | 14 | 3 | 天命 8 年 1 月-天命 8 年 5 月 | 219 | 219 | 公文 | 書寫 | 老 | |
| 冬 | 7 | 20 | 3 | 天命 8 年 1 月-天命 8 年 5 月 | 44 | 83 | 高麗 | 書寫 | 新、老 | |

| 故宮編號 | | | 出版 | 期間 | 內編 | | 用紙 | 內涵 | | 備註 |
|------|----|----|----|----------------------------|-----|-----|----|----|-----|--------|
| 檔名 | 新編 | 原編 | 冊號 | 起始-結束 | 號數 | 頁數 | 兩式 | 書寫 | 滿文 | |
| 盈 | 8 | 10 | 4 | 天命 8 年 5 月-天命 8 年 7 月 | 98 | 98 | 公文 | 書寫 | 老 | 部分蒙文 |
| 寒 | 9 | 16 | 4 | 天命 9 年 1 月-天命 9 年 6 月 | 99 | 142 | 公文 | 書寫 | 老 | 部分漢譯 |
| 收 | 10 | 34 | 4 | 天命 10 年 1 月-天命 10 年 11 月 | 56 | 106 | 高麗 | 書寫 | 新、老 | |
| 滿附一 | 11 | - | 5 | 天命 9 年 1、3 月-天命 11 年 7、8 月 | - | 31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黃 | 12 | 3 | 4 | 天命 11 年 | 42 | 82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宙 | 13 | 5 | 5 | 天命 7 年-天命 11 年 | 88 | 95 | 公文 | 書寫 | 老 | 與列、盈重複 |
| 往 | 14 | 19 | 5 | 無 | 53 | 59 | 公文 | 書寫 | 老 | 誓書、敕書 |
| 宿 | 15 | 13 | 5 | 無 | 42 | 48 | 公文 | 印刷 | 老 | 敕書 |
| 致 | 17 | 36 | 5 | 無 | 35 | 35 | 公文 | 書寫 | 老 | |
| 洪 | 18 | 6 | 5 | 無 | 113 | 115 | 兩式 | 書寫 | 新、老 | 太祖、太宗朝 |
| 殘檔 | 19 | 35 | 5 | 無 | - | 32 | 兩式 | 書寫 | 老 | 太祖朝殘檔 |
| 藏 | 20 | 21 | 5 | 天命 8 年 | 27 | 33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故宮編號 | | | 出版 | 期間 | 內編 | | 用紙 | 內涵 | | 備註 |
|------|----|----|----|--|----|-----|----|----|-----|-------|
| 檔名 | 新編 | 原編 | 冊號 | 起始-結束 | 號數 | 頁數 | 兩式 | 書寫 | 滿文 | |
| 天 | 21 | 1 | 6 | 天聰 1 年 1 月-天聰 1 年 12 月 | 82 | 161 | 高麗 | 書寫 | 新、老 | |
| 歲 | 22 | 25 | 6 | 天聰 2 年 1 月-4 月 | 33 | 65 | 高麗 | 書寫 | 新、老 | |
| 閏 | 23 | 22 | 6 | 天聰 2 年 1-12 月 | 38 | 71 | 高麗 | 書寫 | 新、老 | |
| 成 | 24 | 24 | 8 | 天聰 3 年 1-6 月、天聰 4 年 7-11 月、天聰 5 年 1、2、閏 11 月 | 26 | 48 | 高麗 | 書寫 | 老 | 致明朝書信 |
| 陽 | 25 | 29 | 6 | 天聰 3 年 1、2、閏 4 月 | 3 | 4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秋 | 26 | 37 | 6 | 天聰 3 年 10-12 月 | 44 | 85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月 | 27 | 9 | 7 | 天聰 4 年 1-5 月 | 68 | 119 | 高麗 | 書寫 | 老 | 有蒙文 |
| 調 | 28 | 28 | 6 | 天聰 4 年 2-4 月 | 55 | 96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兩 | 29 | 32 | 7 | 天聰 4 年 2-5 月 | 16 | 29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騰 | 30 | 31 | 7 | 天聰 4 年 3-5 月 | 9 | 15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故宮編號 | | | 出版 | 期間 | 內編 | | 用紙 | 內涵 | | 備註 |
|------|----|----|----|----------------------------|-----|-----|----|----|-----|-------|
| 檔名 | 新編 | 原編 | 冊號 | 起始-結束 | 號數 | 頁數 | 兩式 | 書寫 | 滿文 | |
| 呂 | 31 | 27 | 7 | 天聰 4 年 4-6 月 | 66 | 130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雲 | 32 | 30 | 7 | 天聰 4 年 | 4 | 7 | 高麗 | 書寫 | 老 | 有蒙文 |
| 暑 | 33 | 18 | 7 | 天聰 5 年 1-12 月 | 50 | 93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餘 | 34 | 33 | 7 | 天聰 5 年 7-9 月 | 45 | 87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律 | 35 | 26 | 7 | 天聰 5 年 10 月 | 17 | 29 | 高麗 | 書寫 | 老 | |
| 地 | 36 | 2 | 8 | 天聰 6 年 1-12 月 | 129 | 245 | 高麗 | 書寫 | 新、老 | |
| 滿附二 | 37 | - | 8 | 天聰 6 年 1-12 月 | - | 151 | 高麗 | 書寫 | 新 | 有蒙文 |
| 滿附三 | 38 | - | 9 | 天聰 9 年 1-12 月 | - | 486 | 高麗 | 書寫 | 新 | 紙寬窄不一 |
| 日 | 39 | 8 | 10 | 天聰 10 年 1-4 月，崇德 1 年 5-8 月 | 221 | 400 | 高麗 | 書寫 | 新 | |
| 宇 | 40 | 4 | 10 | 崇德 1 年 9-12 月 | 170 | 320 | 高麗 | 書寫 | 新 | |

再看〈盈字檔〉中出現的部分蒙文情形。原來這是一份誓詞，算是當時與蒙古人交往時，所留下的原始紀錄，現摘錄部分譯文：

初四日，蒙古兀魯特諸貝勒之誓詞曰：“聞英明汗之名，見惡於察哈爾汗，為仰賴英明汗而來，來之即蒙汗憐憫如子，倘不思汗之眷養，我等蒙古諸貝勒，懷有邪惡之心，則其懷邪惡之心之貝勒，必為上天鑒察，以致禍患及身。若思令汗之眷

愛，秉以忠心，則上天眷憫，共用太平之福也。”¹⁰¹

但是看得出來，這份出於天命八年（1623）七月的紀錄，並不比《滿文原檔》記事起始時間點明萬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1607 年）為早。而〈寒字檔〉中編為冊號六十二敕諭檔的記事年代，明確發生於建州女真與扈倫四部戰爭時期，即早在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一年（己亥-癸丑，1599-1613）之間，可追溯至滿文初創年代。兩者的古舊程度，可說已經高下立判。

叁、結語

《滿文原檔》第四冊中〈寒字檔〉冊號六十二部分，是一份相當特別的滿文檔案，穿插了不少漢字。

該批檔冊，全文五十一頁，顯然是為了從漢文翻譯為滿文，而重新抄寫的檔案。因此該批文字，毫無例外的都是以漢字為前、滿文在後次序編排。

本文摘出了十一個例句，逐個分析其語法結構及所述時間。研判其紀錄成檔的形成時間，從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至後金天命九年（1624），長達二十六年，過程曲折，可大致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一、純粹漢字期。其原始紀錄時間，從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至萬曆四十一年（1613），期間約十五年。其文字全為漢字，間雜以女真文借詞，即以「刃」代替銀「兩 yan」，「錄」代替「罪 uile」、「占」字與滿文「吃錢糧」的「吃 jembi」字音義互通等。又因記載烏拉有為兀喇、兀刺者，輝發有為迴扒、迴法者，可知記事書吏非一人、一時、一地所為。且由於人、事、時、地、物都十分清晰，可以推測，這段期間建州女真，記事皆以漢文為主。不過這類文件原件並未保存於《滿文原檔》中，僅有以抄件形式出現於〈寒字檔〉冊號六十二的文件裡。

二、滿漢合璧期。其紀錄成檔的形成時間，從天命六年（1621）七月至天命九年（1624）一月。由於努爾哈齊佔領了遼陽城，適於推展民族文字，初創八旗官學，教育子弟學習滿漢文字，逐步將建州女真大戰扈倫四

¹⁰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36。

部的功績簿，由漢字翻譯為滿文，寫成〈寒字檔〉冊號六十二的文件。該文件顯然有許多不足之處，如：抄錄不全、漢名獨特、翻譯欠妥等缺陷，但是反而因此得以保留原件，留存備查。

三、純粹滿文期。其檔案以〈寒字檔〉冊號六十三的文件為代表。其形成時間，研判約為天命九年（1624）一至六月。該檔案捨棄冊號六十二文件中的漢字，只留滿文。並在重抄時添加補充資料，使紀錄得以更新。

另關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所述「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聲語通之」，這段話的真實性，本文也順便加以部分檢視。發現《滿文原檔》中蒙文紀錄僅有天命八年（1623）七月的「蒙古兀魯特諸貝勒之誓詞」較早，屬於當時部族間盟誓，與〈寒字檔〉冊號六十二文件相比，實不足以證實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前後，建州女真曾以蒙文記事。故該說法的真實性，尚無法藉此求證。反而對比出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前後，建州女真以漢字記事的史實，鐵證如山，毋庸置疑。

（本文於 2017 年 12 月投稿，於 2018 年 3 月審查通過）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廿九）—毛南族食品「水煮牛肉」

華華

壹、前言

2018 年 4 月 21-22 日在台北市士林區銘傳大學基河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辦的兩岸「少數民族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是海峽兩岸少數民族學界的一項盛會。

會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西藏智庫研究員」方素梅女士，報告「易地扶貧搬遷與民族地區現代化：基於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個案考察」，內容深入，見解精闢，獲得來賓熱烈的掌聲。據了解方素梅女士正是毛南族一員，對本民族的個案考察，有著天時、地利、人和等三大優勢，難怪所論卓爾不群，獲得共鳴。

方女士秀外慧中，家世顯赫，出身於毛南傳統望族。會後有幸陪同南下參觀考察屏東排灣族部落、原住民文化園區等處，一路上旁敲側擊，從其口中，瞭解了許多毛南族飲食文化上的特點，尤其是「水煮牛肉」，很受方女士推崇，算是標準的毛南美食。因此本文就要介紹一下這道毛南佳餚，以饗讀者。

不過在說吃食之前，還是循例談一點毛南族的背景資料，讓大家認識一下美女的故鄉。毛南族是一個人口數不多的少數民族。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大陸的人口普查統計，毛南族人口數僅有 101,192 人。然而早在 1982 年第三次全大陸的人口普查統計時，毛南族人口數還更少，只有 38,000 人，¹誰也預測不到，就在不到三十年時間裡，毛南族人口竟然增殖變成三倍，這份迎頭趕上的活力，著實令人驚訝。

毛南族有八成人口，居住在方素梅研究員所考察過的廣西環江毛南族

¹ 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編，《廣西仫佬族毛南族社會歷史調查》，（北京市：民族，2009，第 1 版），頁 1。

自治縣裡。在自治縣的西半邊，有上南、中南、下南三個地點，俗稱「三南」，更是毛南族的集中居住地。素有「毛南山鄉」之稱。²

毛南族一向自稱「阿南」或「毛南」，意為「當地人」。唐代以前的「僚」，宋、元、明時代的「伶」，與毛南人的先祖都有著淵源。史籍中曾先後出現過「茅灘」、「茆灘」、「茅難」、「冒南」、「毛難」、「毛南」等同音異寫的名稱。³

從毛南族的口傳古歌與創世神話中可知，創世神是盤和古，由於兄妹同眠，才有後代繁衍。毛南人家家戶戶，虔誠供奉著生育神「婆王」，因為婆王掌管人類生男育女，馬虎不得。⁴

毛南人普遍信「儺」，而儺，是一種中國古老的傳統民間信仰文化，與巫術有關。儺音讀ㄋㄨㄛˊ (nuo)，意思是藉著迎神賽會樂舞驅逐疫鬼，以保佑平安。儺舞表面看起來是一種舞蹈，其實是一種驅鬼儀式。當儀式在舉行的時候，巫師要戴著面具跳舞，由不同的面具，代表著不同的神祇，神靈附身之後，才能發揮所需要的各種法力。毛南族保有著豐沛的儺文化資源，無論是木雕面具，或是驅鬼儺舞，都有其可觀之處。而在毛南族儺神裡，有兩個神祇更是他們所獨有的，一是瑤王，一是三界公。

相傳瑤王是外族人，曾經幫助毛南人度過苦難，所以毛南族十分感念，後人便把瑤王與其他儺神一起排列在儺壇上，享受供奉與拜祭，展現出毛南族寬大的胸襟。

而三界公是毛南人，也是毛南族飼養菜牛的創始人。他從小就沒了父母，靠著幫別人放牛為生。不過神奇的是，三界公具有圈地為欄的本事，就是到山裡牧牛時，只需用鞭子在地上畫個圈，牛隻會自動待在圈裡吃草，不會亂跑，而任由他上山砍柴，再多賺一點外快。有一天，三界公又上山砍柴，看到樹下有人下棋，不知不覺就天黑了。等趕回山下時，發現牛隻已經繁衍成群了，這才驚覺遇到仙人，因為仙界一天，等於人間一

² 蒙國榮，譚貽生，過偉編著，《毛南族風俗志》，（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1988，第1版），頁1。

³ 蒙國榮，譚貽生，過偉編著，《毛南族風俗志》，（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1988，第1版），頁1。

⁴ 李甜芬著，《本色毛南：毛南族卷》，（南寧市：廣西民族，2010，第1版），頁11-12。。

年。

後來，三界公覺得那些摔傷的牛和退役的老牛總是長不大，拖累業績，很傷腦筋，就想出一種在家圈槽裡飼養傷牛、老牛的辦法，最終養成了細肉菜牛。從此竟讓毛南山鄉成為著名的「菜牛之鄉」，而逐漸富裕起來。因此三界公在毛南人的心目中，就是救苦救難的活神仙，繼而成為儼神之一。⁵

毛南族飼養菜牛有成，於是因牛而成的食品「水煮牛肉」，就成為訪問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必嚐佳餚了。接著來介紹一下，這種美味可口的毛南族食品「水煮牛肉」。

貳、毛南族食品「水煮牛肉」

「水煮牛肉」也叫做「涮菜牛」、「打邊爐」等，名稱雖有不同，卻是一種吃毛南菜牛肉的主要方法。「水煮牛肉」與北方的「涮羊肉」十分相似，但是又不盡相同，下面就略加區別比較。

例如北京的涮羊肉，食材除了羊肉之外，還有白菜、豆腐、粉絲、香菇等其他食材。而「水煮牛肉」只放薑絲、大蒜、和番茄三味材料。這三種食材既是主菜，也是配料。因為「水煮牛肉」的佐料，只是將辣椒、鹽巴、加水調成的「鹽碟」而已，十分簡單。不像北京涮羊肉，所備的佐料裡面有芝麻醬、韭菜花、醬豆腐、蔥花、香菜、芝麻香油、醬油、碎辣椒末等，包羅萬象，非常豐富。

從這裡就已經大致可以看出，毛南「水煮牛肉」著重於品嚐牛肉的原味，希望從極簡的風格裡，吃出菜牛肉的不膾不膩，脆嫩清甜味道。而北京涮羊肉則不乏以重口味佐料，壓制羊肉的腥膻，以取其味覺平衡的用意。僅從食材和佐料來評判，毛南「水煮牛肉」的風格，是比北京涮羊肉還略勝一籌的。

至於毛南「水煮牛肉」的吃法，就跟北京涮羊肉大致相同了。要吃「水煮牛肉」，首先要選擇放牧後再進牛棚肥育的毛南菜牛，也就是毛南儼神三界公所發明的飼養方法。將這種約二歲大的牛，屠宰後所得的肉

⁵ 李甜芬著，《本色毛南：毛南族卷》，（南寧市：廣西民族，2010，第1版），頁88-89。。

品。這種牛肉，油花均勻，肥瘦適宜，可視個人需要，選擇肩肉、腿肉、里肌肉、毛肚等，再將牛肉切成薄片，在桌上火鍋湯沸水裡涮幾下，看到牛肉由紅轉為灰白色，就以筷子及時夾出，蘸著「鹽碟」，入口食用。

前面說過，毛南「水煮牛肉」的湯底，是由薑絲、大蒜、和番茄三味食材燉煮而成，因此要品嚐出牛肉的原味，可說毫不困難。肉質好壞，立竿見影，完全無法藉佐料掩飾。

而毛南菜牛能通過歷次的考驗，其爽口味美的秘密，就在於肥育菜牛的方法。原來牛隻到了飼養後期，毛南人有「攻膘」之法，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讓肉質升級。就是在上市前兩個月，除了給長了骨架的大牛，繼續吃大量的幼嫩青草之外，還得講究營養，加餵泡過水的小米及黃豆漿，使牛隻的背上脊椎骨的肉厚膘肥，虎虎生風。這種牛隻養成後，即使走在路上，背上再放上一個木盆，也能穩穩的掉不下來，可見牛隻的健壯結實。⁶因此將菜牛屠宰後產生的牛肉，只能說是肉中極品，細緻滑嫩，為當地待客的首選佳肴。

另外「水煮牛肉」還流行一種涮、烤兩吃的方式。就是在火鍋中燒湯少許，趁鍋邊灼紅時，把牛肉貼到鍋邊上炙熟。只要幾秒鐘，看到牛肉捲曲如木耳狀時，就及時夾出蘸「鹽碟」食用，味道也很不錯。吃這道菜時，若是佐以毛南低濃度米酒，敬酒行令，更保證能賓主盡歡，不醉不歸。

叁、結語

享用毛南「水煮牛肉」的時機，除了有貴賓光臨之外，通常是在入冬以後。這時山間氣候冰冷，為抵擋刺骨寒風，每天用餐時，就想到要開始「打邊爐」，也就是吃火鍋了。有的家庭用鐵製的「三腳灶」，上面架上炒鍋，下面燒乾柴，邊煮邊吃。有的人則用「風爐」，爐內燒木炭，爐上放著炒鍋，一道菜一道菜的放進鍋裡，也是邊煮邊吃。當然最後的高潮，就是端上切片毛南「水煮牛肉」的時候了。配上簡單的「鹽碟」，一口下肚，那種渾身暖意，真是妙不可言，滋味無窮呢。

⁶ 蒙國榮，譚貽生，過偉編著，《毛南族風俗志》，（北京市：中央民族學院，1988，第1版），頁40。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毛南飼牛終年忙，冬風蕭蕭得肉嚐，感念界公賞美味，圍爐下筷寒氣擋。」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鈔。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劉學鈺

主編：劉學鈺

電話：0921-883325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141號4樓之6

電話：2314-142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